

XIN WEN JIE

2021 年第09期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Monthly

新闻界



9

2021

ISSN 1007-2438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

四川省人文社科重点资助期刊
CSSCI来源期刊
中国新闻核心期刊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控股的大邑安仁老公馆

- 1 老街全景图
- 2 陈月生公馆门楼
- 3 同庆会馆大门
- 4 刘元璋公馆一进院
- 5 明轩书栈
- 6 陈月生公馆主楼



欢迎订阅

《新闻界》杂志

思想影响传播 媒介推动文明

240元/年(12期)

《新闻界》近年荣誉

- 中国新闻核心期刊
- 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 2014年中国新闻奖, 四川新闻奖一等奖
- 2014年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 2014年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期刊
- 2015年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期刊
- 2015年四川省新闻二等奖、三等奖
- 2016年四川新闻奖一等奖
- 2017年四川新闻奖一等奖
- 2018年中国新闻奖二等奖, 四川新闻奖一等奖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1007-2438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51-1046/G2

编辑部电话: 028-86968866

电子邮箱: xinwenjie66@163.com

刊期: 月刊(每月10日出版)

邮编: 610012

Contents

数字新闻学·理论脉络与发展趋势

P₄ / 数字新闻学研究主题发现及其演化分析：基于 Web of Science 文献的考察
文 | 巢乃鹏 韩少卿 吴兴桐

传播学研究

P₁₄ / “民族”与“传播”：一种概念层面的辨析
文 | 郭建斌 苏涛

P₂₆ / 理论意图、内涵转换与语言限制
——凯瑞“传播的仪式观”再审视
文 | 戴长征 罗金玉

传播与社会

P₃₄ / 在“他”与“她”之间：网络游戏玩家的性别转换与身份展演策略研究
文 | 黄典林 张子萌 苏际聪

P₄₄ / 故乡何处是：短视频平台上的农民工社群建构与乡土记忆
——对抖音“福建村”的考察
文 | 于晶 谢泽杭

编委会主任 李 鹏
编委会副主任 廖 翥
总编辑 邓树明
执行副主编 李韵奕
编委 王炎龙 /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张志安 /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
刘海龙 /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展 江 /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常 江 /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特聘教授
曹 晋 /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冯建三 / 台湾政治大学传播政治经济学教授

李天铎 / 昆山科技大学文化创意产业讲座教授
李金铨 / 香港城市大学传播学教授
Christian Huchs / 希腊雅典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
Graham Murdock / 英国拉夫堡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Jlises Mejias / 纽约州立大学奥斯威戈分校传播政治经济学副教授
Vincen Mosco / 加拿大皇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栏目主持 常江：数字新闻学 蒋晓丽：博士生新论
学术顾问 尹 鸿 李良荣 陈力丹 杜骏飞 郑保卫 童 兵 喻国明 蒋晓丽

P₅₈ /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传播共治与村民政治参与
——以成都市郫都区战旗村为例
文 | 田烨

传播法与伦理

P₆₅ / 刑法介入网络信息治理的背景、路径与边界
文 | 冯建华

博士生新论

P₇₅ / 早期中国互联网的技术隐喻与话语实践（1987-2003）
文 | 陈彦蓉 曹铖

全球视野

P₈₆ / 从“世纪专访”到世纪丑闻
——BBC 骗访戴妃事件的组织文化与制度分析
文 | 刘亚娟 展江

编辑出版 《新闻界》编辑部
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红星路二段 70 号
电话 (028) 86968866
电子邮箱 xinwenjie66@163.com
邮编 610012
刊名题写 甘惜分
投稿渠道 www.xinwenjie.com
刊号 ISSN1007-2438 CN51-1046/G2
发地 国内外公开发行
订阅 全国各邮局（所）
邮发代码 62-334
广告许可证 川工商广字 002 号
印刷 成都鑫达彩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日期 2021 年 9 月 10 日

定价 20 元/期
法律顾问 曾兴圣 [四川广力律师事务所 (020) 85350935]

版权声明

凡本刊所刊登稿件，即视为作者授权本刊拥有网络传播、图书出版等再使用权，本刊有权决定是否以某种纸质出版或互联网出版形式进行二次出版。作者对此有异议者，须在来稿时特别说明；未经本刊允许，其他刊物或网络不得转载本刊作品；获本刊允许转载者，须注明转自《新闻界》。



数字新闻学研究主题发现及其演化分析： 基于 Web of Science 文献的考察¹⁾

巢乃鹏 韩少卿 吴兴桐

摘要 数字新闻学正在成为新闻学的主流范畴，研究文献也与日俱增，时至今日，有必要对数字新闻学的整体发展状况和知识脉络进行梳理、总结与反思。本研究以 Web of Science 核心数据集作为数据来源，借助 Python 工具训练 LDA 主题模型，使用困惑度评价指标确定主题数量，并使用主题强度分析研究热点和变化趋势。具体来说，本研究根据主题-词项概率分布，对获得的 1325 条文献摘要进行主题标识，抽取出了数字新闻学研究在 1998-2021 年的 18 个重要研究主题；根据文档-主题概率分布，引入时间维度计算主题强度分布。研究发现，包括数字技术的角色、新闻用户的主动行为、传统新闻理念的变迁、新闻学科发展等研究主题都保持了相对稳定和上升的趋势，新闻职业身份、新闻学研究方法等少量主题呈下降趋势，但也仅仅是一种弱下降。具体而言，有 7 个主题的主题强度呈上升趋势，有 5 个主题的主题强度呈弱下降趋势，有 6 个主题的主题强度趋于平稳状态。数字新闻学在 2021 年及未来的研究中正呈现出主题越来越综合化的趋势。

关键词 数字新闻学；LDA 主题模型；研究主题；主题演化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巢乃鹏，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院长，广东深圳 518060；韩少卿，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 210023；吴兴桐，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深圳 518060

一、引言

数字新闻学是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及在新闻实践中的应用而诞生的，其最初的目的更多是为了应对和探索传统新闻业在数字时代面临的危机与挑战。但随着整个新闻业呈现出显著的数字化转型之后，数字新闻学所需要回应的并不仅仅是传统新闻业数字化转型的问题，而是在人类迈入数字化时代之后，承载人类知识教育、文化传播、社会治理的新闻业是否会在社会系统中扮演新的角色，由此是否会对数字时代的人类社会产生新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必然带来数字时代新闻学研究整体上的范式转型。

从新闻学学术发展的角度看，对数字新闻学的系统研究在过去十年间逐渐从一个新奇的前沿范畴，渐渐转化为新闻学的主流范畴。^[1]作为一个具有革新意义的学术领域，充分认识数字新闻学的研究进展能够为后续研究提供指示方向。有研究者通过质性分析中国数字新闻 CSCI 研究文献，对中国数字新闻研究的主要议题、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总结，以此描绘了当前中国数字新闻研究的现状^[2]；也

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数据时代计算传播学的理论、方法与应用研究”（19ZDA324）；深圳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成果。

有学者基于《数字新闻学》(Digital Journalism)这一专门性期刊进行了统计分析,呈现了“数字新闻学研究是什么样子的”^[3]。

虽然上述研究或多或少都对数字新闻学的整体研究态势和理论进展等进行了探讨,但囿于文献选择的有限性、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未能全面地展示出数字新闻学自产生以来发展的脉络。基于此,本研究将尽可能获取更全面的“数字新闻学”相关研究文献,通过 LDA 主题模型等计算传播研究方法,揭示数字新闻学具体的研究主题,以及这些主题的演化变迁,以期对数字新闻学的整体发展状况进行梳理、总结与反思。对于正在迈入主流范畴的数字新闻学而言,这一考察显然具有其独特意义,而且也有其紧迫性。具体而言,本文将尝试回答以下研究问题:第一,二十余年来,数字新闻学研究有哪些具体研究主题?这些研究主题的关注度如何?第二,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研究主题的关注度是否存在着变化?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使用 LDA 主题模型进行数字新闻学研究的主题发现和演化趋势分析。(图 1) 隐含狄利克雷分布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LDA) 是基于概率图的非参层次贝叶斯模型,已成为当下主流的主题模型之一,被广泛应用于文本挖掘等计算研究之中。作为一种非监督机器学习方法, LDA 能够对文本中潜在的主题信息进行准确有效地挖掘,帮助研究者发现大规模文本信息中的潜在主题。同时, LDA 主题模型还发展出了主题演化概念 (Topic Over Time)^[4],用于分析主题随时间变化的趋势。也即,通过对文本数据集按照时间窗口进行划分,并通过潜在语义分析计算得到不同时间窗口内的主题概率和强度,能够实现对文本主题演化趋势的纵向分析。

相比于传统的关键词等统计分析, LDA 主题模型不是通过单一的共现词对聚类来刻画,而是通过概率方法生成与该主题相关的一系列词项来刻画,深度挖掘主题语义信息,并通过量化的方式度量主题的强度以及主题之间的关联,能够更加准确地研判学科领域的发展趋势。^[5]在本研究

中,我们首先从数字新闻学研究文献记录中抽取与所有文档相关的一系列主题,其次根据主题强度和研究需要,最终确定、标识了 18 个研究主题,并对这些主题的演化趋势进行进一步分析。这一技术路线对于发现数字新闻学的研究主题和演化趋势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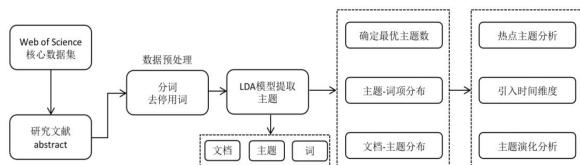


图 1 研究框架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以 Web of Science (简称 WoS) 作为数据来源,在 WoS 数据库选择“核心数据集”,以“digitaljournalism”为关键词进行主题检索。检索结果返回后,选择文献类型为“Article”、语言为“English”进行检索结果精炼,共获得有效文献 1325 篇,时间跨度为 1998–2021 年。(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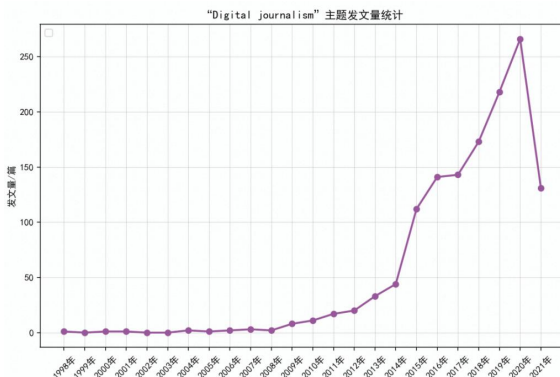


图 2 Digital Journalism 主题的发文量统计

从发文数量的分布情况来看,在英文学界,数字新闻学研究的发展可以分为几个阶段:1.蛰伏期,数字新闻学在 2009 年之前一直处于缓慢发展的蛰伏状态;2.成长期,在 2009–2014 年期间,数字新闻学开始被一些研究者采纳,2010 年前后“数字新闻学”开始被一些学者作为新闻学的“第五范式”进行讨论^[6];3.爆发期:2014 年以后,数字新闻学研究热度迅速上升,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SSCI 期刊《数字新闻学》也正是在此前的 2013 年正式创刊,成为了国际数字新闻学研究的



重要学术平台之一。

将以上数据结果的文献全记录导出,包括 author、title、keywords、source and abstract 等字段信息。数据检索、下载时间为 2021 年 7 月。本文将使用文献记录的摘要 (abstract) 部分组成语料库,进行数字新闻研究的主题模型分析。摘要作为文献内容的精炼浓缩,展现了文献内容的梗概。^[7]相比于关键词 (keywords) 和文献的摘要 (abstract) 具有更加详细的信息,能够更全面、准确反映数字新闻学的研究内容。

(二) 数据处理

本研究使用 Python 等工具进行数据处理。首先采用 NLTK 进行词性分析、词形还原,并对所获得的数据进行分词、去停用词等预处理,得到包含 1325 行数据的文本语料库;其次进行主题抽取,为了提升主题建模的准确性,采用了单词先验的 Guided LDA (Guided Topic modeling with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8]模型来进行主题划分。

(三) 模型训练

本研究采用困惑度 (Perplexity) 这一评价指标来确定主题数量^[9],得到如图 3 所示的困惑度变化情况。困惑度表示文档所属的主题的不确定性(信息熵),当困惑度下降趋势不再明显或处于拐点处时,此时的 k 值为最优主题数。在本研究中,当主题数目为 18 时,文本集合的 LDA 模型困惑度较小,且困惑度的值变化保持稳定,不再随着主题数量的增多而明显下降,同时具有较好的理论性和可解释性。因此,本研究设定最优主题个数为 K=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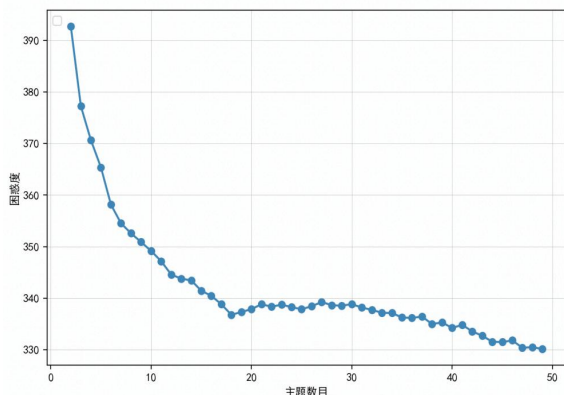


图 3 不同 topic 数目下困惑度的变化趋势

关于超参数设置,使用 Collapsed Gibbs-Sampling (CGS) 来推断主题的分布和词的分布。其中,迭代次数为 2000 次, $\alpha=50/k$, k = 主题数, $\beta=0.01$ 。最终抽取各主题下概率最大的 20 个词,按照词频从大到小输出,并选取每个 Topic 下的概率前 5 左右的词汇作为该 Topic 含义的代表,以此为基础核心词汇进行主题标识。

三、研究发现

(一) 数据结果

经过 LDA 模型训练和主题抽取等分析过程,最终选择确定了 k=18 个最优主题。按照每个主题下各词项概率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抽取各主题下高概率的词汇,并依据高概率词项含义,查阅相关文献和咨询专家对主题进行人工标识,得到主题-词项分布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Digital Journalism 文献的主题-词项分布

	主题标识	词项 (与主题相关的高概率词)
Topic1	实践应用	practice,immersive,paywalls,digitalnews,interactive
Topic2	理论工具	diffusion,discourse,gatekeepers,field theory,affordances
Topic3	研究方法	survey,experimental,ethnography,interviews,content analysis
Topic4	数字技术	computational,algorithm,intelligence (AI) ,digital,automatic
Topic5	数据使用	dataprocessing,sources,data visualization,big data,content
Topic6	媒体平台	online,mobile,social media,multimedia,newspapers
Topic7	职业身份	freelance,journalistic,correspondents,publishers,editors
Topic8	政策制度	policy,law,institution,legal,government
Topic9	用户群体	storytelling,immigrant,users,bloggers
Topic10	数字经济	financial,economic,capital,advertising,business
Topic11	地理区域	national,local,hyperlocal,transnational,global
Topic12	内容生产	newsroom,curation,professional,personalization,citizen journalism
Topic13	新闻类型	longform,data journalism,narratives,virtual reality,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Topic14	新闻真实	truth,accuracy,disinformation,verification
Topic15	价值理念	meaning,transparency,objectivity,quality,ethical
Topic16	情感转向	affective,negative,emotion,positive,post-truth
Topic17	转型创新	shift,innovation,change,transformation,revolution
Topic18	学科建设	boundary,discipline,subject,journalistic field,interdisciplinary

根据文档-主题概率分布得到每一篇文档从

属于不同主题的概率,从而可以计算出每个主题的主题强度。主题强度的大小就是主题在某一个时间窗口内受到的关注程度,即在某一时间窗口上某主题的主题强度与包含该主题的文档数目成正比,主题强度越大越有可能被认为是热点主题。主题及其对应强度如表2所示。

表2 1998—2021年 Digital Journalism 研究主题及强度分布

主题	强度	主题	强度
政策制度	0.067992909	内容生产	0.049860821
职业身份	0.063906547	媒体平台	0.049215711
新闻类型	0.06288298	数字技术	0.048559974
用户群体	0.060844957	研究方法	0.04834759
学科建设	0.057775647	理论工具	0.04813053
价值理念	0.053261086	地理区域	0.048128125
数字经济	0.053113453	转型创新	0.048127079
数据使用	0.052440639	实践应用	0.048126107
新闻真实	0.051162389	情感转向	0.048123455

(二) 热点主题

参见表2中的主题强度,可以看到在数字新闻学研究中存在一些被重点关注的热点主题,这里只对以下6个热点主题进行详细分析。

1.政策制度。随着数字新闻发展的不断深入,关于数字新闻的政策(policy)和制度问题越来越突出,成为数字新闻学实践和研究中的热门主题。目前,世界范围内对数字平台的监管政策在国家 and 政府(government)政策议程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尤其是对于平台垄断和平台竞争问题。^[10]比如,以Facebook等为代表的数字新闻平台常因对经济、社会和民主等施加不正当影响而受到强烈批评,因此需要建立“新一代互联网监管”(a new generation of internet regulation)^[11]。同时,数字新闻的发展不仅是媒体机构的自主发展问题,也需要来自政府的政策保障,近年来媒体不断呼吁能够制定新的政策以支持新闻业的数字化转型。^[12]

2.职业身份。这一主题对数字新闻生产过程中的多种身份转变进行了探讨,包括新闻编辑(editors)、职业记者(journalists)等,对于自由记者(freelance)这一参与数字新闻生产的新职业身份也进行了较多研究。数字新闻的发展不仅依赖于职业记者,还依赖于自由记者、评论员等多种渠

道。^[13]但按照传统记者的定义,数字记者和自由记者被排除在新闻记者的群体之外,造成了严格的身份界限和模糊的新闻实践并存的局面^[14],进而塑造了一种处于尴尬位置的电子连接的自由记者(e-lancer)^[15]。关于自由记者等非职业记者参与数字新闻生产的研究还发现,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专业新闻记者借助数字技术更好地完成了数字新闻报道,另一个方面则是数字化时代新闻记者的劳动时间被进一步延长,报道数量进一步增加,并不拥有自由记者的自由空间。^[16]这些都是这一研究主题重点关注的问题。

3.新闻类型。在数字新闻时代,数字技术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制作工具,使得不同媒体都具有了实施资源密集型的新闻生产的能力^[17],比如融媒体新闻、多媒体叙事、调查性新闻(investigative journalism)、数据新闻(data journalism)、虚拟现实新闻(virtual reality)等基于数字技术的多态化新闻类型。同时,在碎片化阅读时代,数字长篇故事(digital longform stories)新闻同样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也增加了数字新闻创新的动力。^[18]数字长篇故事可被视为是包含了丰富文本和多媒体元素的复杂新闻项目,一定程度上它是对当前快速、即时新闻趋势的“逆向发展”^[19]。因此,数字媒介技术和数字新闻形态都在不断变化,关于新的新闻类型的研究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关注度。

4.用户群体。在数字新闻时代,新闻出现了产消者合一的趋势,打破了专业记者新闻生产的垄断地位。用户既是新闻生产者,又是信息消费者,用户群体从新闻受众转变为社交新闻发布者、微播客主播、新闻故事讲述者等信息生产者。同时,他们也更青睐于消费数字新闻,尤其是新生代的新闻消费者,构成了数字新闻原生一代(digital natives),出现了youtuber、blogger等新兴职业。^[20]另一方面,随着数字化的发展,传统新闻原住民也已经向数字化平台完成了大规模迁移,成为新平台使用的数字移民。在这一主题中,不同形态和组织方式的数字新闻对于用户传播效果的影响和差异也是被重点关注的研究问题,比如在向用户传达信息时可视化统计图表的作用和效果等。^[21]

5.学科建设。在数字新闻媒体环境中,影响数



字新闻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对于认识数字新闻应当秉承跨越学科边界的整合视角,探索多元方法和框架。^[23]比如有研究者将新闻学和语言学结合在一起,并借助计算机文本分析(computer-based text analysis)和词共现可视化(visualisation of word co-occurrence)等技术,从而以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研究的方式来探讨新闻价值的话语维度。^[23]还有研究者从文化研究、数字技术等跨学科的视角对自动化新闻进行了探究,以揭示数字技术对新闻流程的再造意义。^[24]通过这些学科问题的研究可以看到,数字新闻学在努力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同时,也在不断与其他学科之间发生着交叉融合,数字新闻学不再是传统的单一人文学科研究领域,而是在不断打破学科的边界(boundaries)。

6.价值理念。不管数字新闻业如何发展,新闻基本的核心价值理念始终是新闻学研究中最重要主题之一。比如,目前数据新闻仍是新闻编辑部正在扩张的一个领域,研究者基于305家新闻机构对数据新闻生产中数据的透明度(transparency)进行了研究,并坚信数据新闻有能力让新闻业变得更加透明。^[25]还有研究者通过对30位记者的深度访谈,探讨了记者作为真相讲述者的角色,揭示了数字新闻时代真相的复杂性,对于新闻客观性构成了巨大挑战。^[26]同时,由于数字新闻的情感转向和后真相时代的影响,相比传统新闻业,新闻客观性被一些学者置于相对次要的位置。同时,还有一些标题党新闻(clickbait)、虚假/错误信息(fake/misinformation)等广泛传播,研究者期望建立基于算法和机器学习自动化解决方案(automation, education and regulation)来应对这些价值伦理问题。^[27]

(三) 演化分析

将文档-主题概率分布按年进行计算,获得各个主题在不同且连续的时间窗口内的主题强度分布。根据不同时间窗口内的主题强度的变化情况,能够分析研究主题随时间变化的演化趋势。由于早期关于数字新闻学的研究文献较少,导致主题强度波动较大、缺乏规律性,而随着文献数量的不断增加开始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因此,这里主要分析2012-2021年这十年间数字新闻学

研究主题强度的演化趋势;需要说明的是:因为2021年数据统计不完整,所以其变化趋势只作为分析时的参考。根据不同时间窗口内主题强度的变化趋势可以发现,虽然在不同时间节点每个主题的主题强度变化都有一定的波动,亦有少量主题呈现下降趋势,但也仅仅是一种弱下降。整体而言,近10年来数字新闻学正在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一门显学,大部分研究主题都保持着相对稳定和上升的趋势。为便于分析,本文仍将数字新闻学研究主题的演化趋势分为三类:有7个主题的主题强度呈上升趋势,有5个主题的主题强度呈弱下降趋势,有6个主题的主题强度变化呈平稳趋势。

1.呈上升趋势的主题。

图4展示了2012-2021年间呈上升趋势的主题,包括topic4数字技术、topic8政策制度、topic9用户群体、topic10数字经济、topic13新闻类型、topic15价值理念和topic18学科建设。对应于表2主题强度分布,可以发现topic8政策制度、topic9用户群体、topic13新闻类型、topic15价值理念和topic18学科建设这5个主题的主题强度都位居所有18个主题强度的前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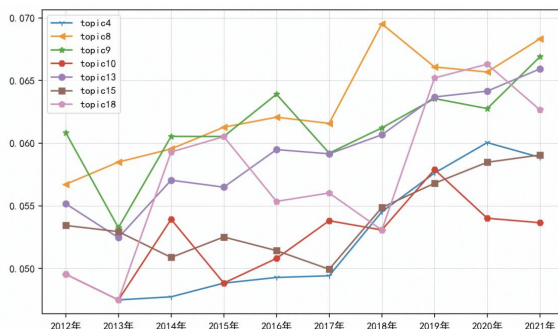


图4 呈上升趋势的主题

(1) topic4数字技术虽然不是强度最大的主题之一,但该主题的主题强度整体上逐年上升。数字新闻研究是伴随着数字新闻这一新闻实践产生的,而数字新闻本身即是由数字技术发展催生的,因此数字新闻研究与数字技术也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数字技术对新闻业的影响是全球新闻学研究过去十余年间的核心议题。^[28]在数字技术的强烈冲击下,新闻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29],新的技术逻辑不断解构着传统的新闻逻辑,

数字技术在数字新闻中的作用不断被放大。未来对于数字技术的研究还会逐年上升,并将从技术应用转向对技术逻辑和价值等方面的探讨。

(2) Topic 8 政策制度不仅呈现出了持续上升的趋势,而且其主题强度一直处于各主题的前列。如前述分析,关于数字新闻和数字平台的监管治理等日益成为新闻业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对与之相关的政策制度相关问题的探讨正在逐年上升。这是由于数字新闻逐渐成为了一个影响力的应用和研究领域,与之相伴的便是各类不规范现象的产生,需要完善的制度、法律(law)等治理体系来应对解决。

(3) Topic 9 用户群体主题强度除了在 2017 年稍有下降,整体上一一直处于上升的趋势。随着数字媒介环境的变化,数字新闻用户结构与功能也处于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之中,不再是被动的新闻消费者,而是发展出了多种身份和多元化角色。研究处于变化中的用户群体,对于数字新闻生产模式创新和传播效果提升等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能够帮助媒体机构打造出更具吸引力的数字新闻项目,以及更好地满足用户生产新闻、消费新闻的需求。

(4) topic 10 数字经济主题在 2015 年经历了短暂下降之后,转而整体上开始逐渐上升。数字新闻的产消问题是一个经济问题,当前由大型投资者、风险资本等支持的盈利性数字新闻公司在新闻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30],数字广告营销、媒体品牌打造和经济资本引入等都是媒体实现数字化经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力量的介入对于数字原生新闻的发展具有强大的促进作用^[31],但数字平台的资本化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它超越了数字通信本身的技术赋能潜力,导致了新闻消费的过度娱乐化等问题^[32],新闻作为产品的经济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新闻作为公器的社会价值。另外,尽管数字原生新闻的媒体的发展日益成熟,但传统新闻品牌仍然占据了最受欢迎新闻网站的大部分,其原因是传统新闻品牌由于其规模和资本优势而具有较大的结构性优势^[33],这也是数字新闻发展过程中仍然需要面对的问题。

(5) topic 13 新闻类型揭示了当前数字新闻生产中丰富的新闻形态,包括 VR/AR 新闻、数据新闻(datajournalism)、可视化(visual)新闻、叙事性

新闻(narratives)、长篇多媒体融合新闻(longform)等,以及数字新闻时代数字工具在调查性新闻报道中的潜力和新闻记者如何利用数字创新进行调查性新闻报道的操作实践。^[34]从内容形态上来说,数字新闻也在经历着不断的变化,从最早的文字新闻,到图片新闻、视频新闻,再到如今的直播新闻和短视频新闻等,这些都构成了这一主题丰富的研究内容。

(6) topic 15 价值理念在 2017 年以前稍微有所下降,之后开始明显上升。该主题反映的是传统新闻学的基本价值理念在数字新闻时代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数字新闻学对传统新闻学客观性(objectivity)、透明性(transparency)等核心理念的重构。在数字新闻时代,由于标题党(clickbait)的存在、新闻把关的缺失以及对流量的追求,导致对新闻质量(quality)和社会意义(meaning)的下降,出现了一系列挑战新闻伦理的新闻事件。因此,关于数字新闻的价值理念等方面的探讨在未来还将继续。

(7) topic 18 学科建设主题在 2016–2018 年有所下降,之后开始明显上升。该主题讨论的则是数字新闻学随着数字新闻的发展作为一个独立的、全新的学科逐渐建立的过程,它是对传统新闻学科的重构,研究对象、问题和理论都在发生变化。同时,数字新闻学具有学科交叉的性质,融合了数据科学、计算机科学、可视化技术等多个学科知识,打破了学科之间的边界。目前数字新闻学研究尚未发展成为一个十分完善的学科体系,因此对于这一主题研究的热度还将继续上升。

2. 呈弱下降趋势的主题

图 5 展示了 2012–2021 年间呈弱下降趋势的主题,包括 topic 3 研究方法、topic 6 媒体平台、topic 7 职业身份、topic 12 内容生产和 topic 14 新闻真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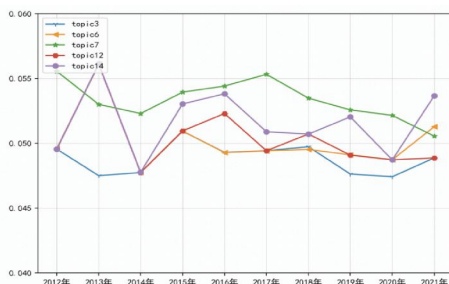


图 5 呈下降趋势的主题

(1) Topic 3 研究方法的主题强度在经历一段时间的上升之后,整体上强度有所下降。这可能是囿于数字新闻学研究方法的有限性。目前使用较多的研究方法有调查(survey)、实验(experimental)、访谈(interviews)、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和民族志(ethnography)等方法,在量化或者计算研究方面还比较少,数字新闻学研究可能还没有探索出更加丰富、完善的研究方法体系。

(2) Topic 6 媒体平台主题在 2015 年短暂上升,之后开始缓慢降温。2015 年正处于新旧数字平台迭代的交替时期,手机移动媒体(mobile)、多媒体(multimedia)、社交媒体(socialmedia)已经占据了主流,而报纸(newspaper)、广播和传统互联网新闻平台都受到了较大的影响。整体来看,媒体平台主题强度并不十分高,强度值基本上处于 0.05 之下。

(3) Topic 7 职业身份主题虽然是所有主题中关注强度最高的主题之一(表 2 显示,在所有主题中,其强度仅次于政策制度位居第二位),但其研究关注度在最近几年中却呈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这可能与下述原因相关:在数字新闻发展早期,新闻记者的角色定位开始出现了分化,传统新闻记者出现了自我身份认知模糊的现象,也面临着数字化转型的痛苦和探索;此外,作为非职业记者的普通用户也在逐渐形成了自由记者、公民记者等新的用户角色,这些问题极具研究和探讨的实践意义。但是随着数字新闻业的快速发展,无论是专业记者还是社会公众,对数字化时代新闻从业者的多元化身份格局认知似乎正在形成共识,因此研究者的关注度也有所转移。

(4) Topic 12 内容生产主题在 2014-2016 年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上升,之后强度开始逐渐下降。与新闻记者职业身份主题类似,早期新闻信息生产方式处于剧烈的转变之中,在传统新闻采编形式的基础上,出现了个性化新闻(personalization)、策展新闻(curation)、公民新闻(citizenjournalism)等新形式,形成了新的新闻编辑室(newsroom)模式。随着这些新闻生产方式的不断完善,新的新闻内容生产方式的探索仍在不断探索中,理所当然,新闻内容生产的研究和思考也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5) Topic 14 新闻真实的主题一直处于相对波动的状态,但整体上呈现出了弱下降的趋势。新闻真实的问题是新闻价值理念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学界始终关注的重要争议性问题之一。随着媒介环境、传播技术和新闻样态的变化,每个时期新闻真实主题都会出现不同的新问题,这可能是导致主题强度不断波动的原因。到了 2021 年新闻真实的问题又开始上升,再次吸引了学界的关注,这一主题又具有了新的想象和探索空间。

3.呈稳定趋势的主题。图 6 展示了 2012-2021 年间呈稳定趋势的主题,包括 topic 1 实践应用、topic 2 理论工具、topic 5 数据使用、topic 11 地理区域、topic 16 情感转向和 topic 17 转型创新。整体上看,这些主题的变化趋势不大,且强度值不高,主题强度值一般处于 0.045-0.050 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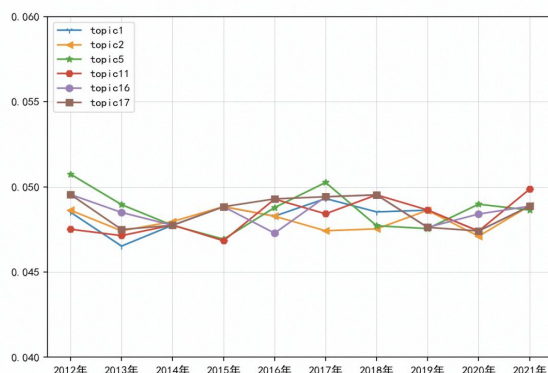


图 6 呈稳定趋势的主题

(1) Topic 1 实践应用主题在 2017 年前后有短暂上升,整体上趋于平稳。数字新闻实践应用主要围绕着数字新闻(digitalnews)、数字实践(practice)等问题展开,对数字付费墙(paywalls)、沉浸式(immersive)新闻、可视化(visualization)新闻、交互式(interactive)新闻等数字新闻技术应用进行了探讨。

(2) Topic 2 学术理论主题中所指向的是数字新闻学研究中主要使用的理论,包括信息扩散理论(diffusion)、元话语分析(discourse)、把关人理论(gatekeepers)、场域理论(fieldtheory)以及技术可供性(affordances)理论的探讨。数字新闻学研究中对于场域理论等经典理论进行了新的拓展性应用,用以解释数字新闻研究中的新问题,但是更多的依然是对于传统新闻学理论的应用和继承,还未发展出

数字新闻学原生的新理论。

(3) Topic 5 数据使用主题包括两方面的研究,一方面是数字新闻学研究中所使用的数据,比如质性数据(qualitativedata)、公开数据(publicdata)、用户数据(audience data)等;另一方面是数字新闻生产实践中对于数据的使用,比如大规模媒体数据(mediadata)、数据新闻、数据可视化等数据。同时,研究者还对新闻生产者如何使用数据进行新闻生产,比如数据使用方式和规范等^[39]进行了较多关注。但数据作为数字新闻实践中的核心要素之一,显然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程度还不太够。

(4) Topic 11 地理区域主题探讨的是地方性(local)数字新闻转型、超地域性(hyperlocal)信息服务和跨地域性数字新闻等问题。数字新闻的特点之一就是打破了传统新闻时代发行地域和传播范围的物理限制,能够实现全球性(global)、全国性(national)和跨地域性(transnational)传播。

(5) Topic 16 情感转向问题是数字新闻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之一,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关注。相比于传统新闻时代,情感在数字新闻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这被称为数字新闻的“情感转向”(emotionaltum)。与此同时,伴随着情绪在信息传播中的渗透,也出现后真相(post-truth)式的传播问题。对于这一日益突出的问题,需要学界给予更多的关注。

(6) Topic 17 转型创新主题探讨的是传统新闻业向数字新闻业转型发展的问题。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新闻业的数字化(digitization)实践不断深入,开启了新闻生产、消费和传播的全方位转型(transformation)。数字新闻业对传统新闻业进行了革命性(revolution)地重构,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创新(innovation)。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借助 LDA 主题模型的计算方法,对国际学界关于数字新闻学的研究主题和演化趋势进行了计算分析。

首先,本研究揭示出了数字新闻学研究所涉及的众多研究主题,既有数字新闻转型创新、新闻样态、新闻用户、内容生产、职业身份、媒

体平台、数字经济等新闻实践领域的研究主题,又有关于数字新闻的价值理念、新闻真实、政策制度、学科建设等学科和理论的研究主题,还有关于数字新闻学研究的理论工具、研究方法和数据使用等研究框架的探讨。这些研究主题基本上反映了当前数字新闻学主要关注的研究对象和问题。

其次,本研究通过对这些主题强度的计算,发现在诸多研究议题中,政策制度、职业身份、新闻类型、用户群体、学科建设和价值理念等是强度较高的热点研究主题。同样也有研究者曾对数字新闻学的研究主题进行过文献分析。例如,S. Steensen 等人在对《数字新闻学》这本期刊在 2013 至 2018 年间发表的论文进行分析时指出,数字新闻学研究重点关注的主题有“技术”“平台”“受众(用户)”“方法”“理论”等^[40];而白红义等则通过对中国数字新闻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后发现,在中国当前的数字新闻研究中,“转型”与“创新”是中国数字新闻研究的关键议题,主要包括新闻从业者与新闻组织的转型,基于新闻机构的机制体制创新和新闻产品创新等。^[47]这其中,“受众(用户)”“新闻从业者”“体制机制创新”等热点主题都与本研究的结果一致,但是“技术”“平台”“方法”等却与本研究的结果有所差异,这可能是由于不同研究选取的文献存在差异所导致。

再次,本研究揭示出各研究主题强度随着时间推移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呈现出不同的演化趋势。这一方面显示出数字新闻应用和实践的媒介环境变化,另一方面则体现出了数字新闻学研究领域研究者关注议题的变迁。从主题演化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到,不同研究主题强度呈现出了上升、弱下降和平稳三种演化趋势。事实上,由于近 10 年来数字新闻学正在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一门显学,所以大部分的主题都保持着相对稳定和上升的趋势,只有少量主题呈下降趋势,而且也仅仅是弱下降。另外,由于 2021 年文献数量有限,虽然只是作为演化趋势分析的参照,但仍可以看出,进入 2021 年大部分主题强度都有所上升,即便是强度呈现下降趋势的几个主题也是如此。由于 LDA 主题模型是一种概率分布,在计



算主题强度时是假定每个文档（基本上）包含所有的主题，只是每个主题在文档中的概率不同，因此这或许也可以说明，数字新闻学在2021年及未来的研究中正呈现出主题越来越综合化的趋势。

参考文献

- [1][28]常江,田浩.数字新闻学的理念再造与范式革新——基于在三个国家展开的研究[J].东岳论丛,2021,42(06):171-180+192.
- [2][37]白红义,张恬,李拓.中国数字新闻研究的议题、理论与方法[J].新闻与写作,2021(01):46-53.
- [3][36]Steensen, S. et al. What Does Digital Journalism Studies Look Like?[J]. Digital Journalism, 2019, 7(3), 320-342.
- [4]Wang, X.&McCallum, A.Topic Over Time:A Non - Markov Continuous -Time Model of TopicalTrends [C]// Proceedings of the 12th ACM SIGKD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Knowledge Discovery and Data Mining.Philadelphia,2006:424-433.
- [5]关鹏,王曰芬.基于 LDA 主题模型和生命周期理论的科学文献主题挖掘[J].情报学报,2015,34(03):286-299.
- [6]Steensen, S. &Ahva, L. Theories of Journalism in a Digital Age:An Exploration and Introduction [J].Digital Journalism, 2015,3(1):1-18.
- [7]关鹏,王曰芬.科技情报分析中 LDA 主题模型最优主题数确定方法研究[J].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16(9):42-50.
- [8]Jagaramudi, J., Daumé III, H. & Udupa, R. Incorporating Lexical Priors into Topic Models [C]. //Proceedings of the 13th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Chapter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2012: 204-213.
- [9]Blei, D.,Ng, Y. and Jordan, M.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J].The Journal of Machine Learning Research, 2003 (3): 993-1022.
- [10]Flew, T. et al. Return of the Regulatory State: A Stakeholder Analysis of Australia's Digital Platforms Inquiry and Online News Policy [J].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021, 37 (1):1-25.
- [11]Winseck, D. Vampire Squids, "the Broken Internet" and Platform Regulation [J]. Journal of Digital Media & Policy, 2020, 11(3):241-282.
- [12]Wilczek, B. et al. Un -Locking Strategic Lock -Ins of Local Media: An Investigation of Local Media's Preferences towards Public Support for Strategic Innovation [J]. Digital Journalism, 2021, 9(10):276-299.
- [13]Hagar, N., Wachs, J. andHorvát, E. Writer Movements between News Outlets Reflect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Media[J]. New Media & Society, Published online: June 30, 2021.
- [14]Badr, H. The Egyptian Syndicate and (Digital) Journalism's Unresolved Boundary Struggle [J], Digital Journalism, Published Online: Aug 06, 2020.
- [15]Salamon, E. E -Lancer Resistance: Precarious Freelance

- Journalists Use Digital Communications to Refuse Rights -gabbing Contracts[J]. Digital Journalism, 2016, 4(8):1-21.
- [16]Hayes, K. The Networked Newsroom: Navigating New Boundaries of Work.Journalism Practice[J]. Published Online: Jul. 9, 2021.
- [17]Planer, R., Wolf, C. & Godulla, A. Digital Storytelling beyond Flagship Projects: Exploring Multimedia Work Routines in Higher Education Practical Training [J]. Journalism Practice, Published Online: Oct. 19, 2020.
- [18]Esther, G. & Boomgaarden, H. Simply Bells and Whistles?[J]. Digital Journalism, 2018, 7(2):1-21.
- [19]Planer, R. & Godulla, A. Longform Journalism in the USA and Germany: Patterns in Award-Winning Digital Storytelling Productions[J]. Journalism Practice, 2021,15(4), 566-582.
- [20]Lichtenstein, D., Herbers, M.&Bause, H. Journalistic YouTubers and Their Role Orientations, Strategies, and Professionalization Tendencies [J]. Journalism Studies, 2021, 22(9): 1103-1122.
- [21]Martínez, R., Turró, M. & Saltiveri, T. Methodology for Heuristic Evaluation of theAccessibility of Statistical Charts for People with Low Vision and Color Vision Deficiency [EB/OL]. Research Square, <https://www.researchsquare.com/article/rs-156959/v1>.
- [22]Mast, J. &Temmerman, M. What's (the) News? Re-assessing "News Values" as a Concept and Methodology in the Digital Age[J]. Journalism Studies, 2021, 22(6):689-701.
- [23]Bednarek, M., Caple, H. & Huan, C. Computer-based Analysis of News Values: A Case Study on National Day Reporting[J]. Journalism Studies, 2020, 22(6):702-722.
- [24]Dierickx, L. News Automation, Materialities, and the Remix of an Editorial Process [J]. Journalism, Published Online: Jun. 14, 2021.
- [25]Beiler, M., Irmer, F. & Breda, A. Data Journalism at German Newspapers and Public Broadcasters: A Quantitative Survey of Structures, Contents and Perceptions[J]. Journalism Studies, 2020, 21(11):1571-1589.
- [26]Canella, G. Journalistic Power: Constructing the "Truth" and the Economics of Objectivity. Journalism Practice. Published Online: Apr. 16, 2021.
- [27]Rubin, V. Disinformation and Misinformation Triangle: A Conceptual Model for 'Fake News'Epidemic, Causal Factors and Interventions [J]. The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19, 75(5):1013-1034.
- [29]Karlsson, M.&Sjovaag, H. Introduction:Research Methods in an Age of Digital Journalism [J].Digital Journalism, 2016,4(1): 1-7.
- [30]Carlson.M. & Usher, N.News Startups as Agents of Innovation[J]. Digital Journalism. 2015, 4(5): 1-19.
- [31]Joyce, V. & Harlow, S. Seeking Transnational, Digital-native News From Latin America: An Audience Analysis Through the Lens of Social Capital [J]. Journalism Studies, 2020, 21(2):1-20.
- [32]Tong, J. The Taming of Critical Journalism in China: A Combination of Political,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Forces[J]. Journalism Studies, 2017, 20(4):1-18.

[33]Buschow, C. Why Do Digital Native News Media Fail? An Investigation of Failure in the Early Start-Up Phase[J].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2020, 8(2): 51–61.

[34]Franks, S. et al. Using Computational Tools to Support Journalists' Creativity [J]. Journalism, Published Online: Apr.

21, 2021.

[35]Alieva, I. How American Media Framed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Using Data Visualization: The Case Study of the New York Times and the Washington Post [J]. Journalism Practice, Published Online: May 21, 2021.

Topic Discovery and Evolution Analysis of Digital Journalism: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f Web of Science

Chao Naipeng, Han Shaoqing, Wu Xingtong

Abstract: Digital journalism is becoming the mainstream of journalism, and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is increasing rapidly. It is necessary to sort out, summarize and reflect on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digital journalism. This study used the core data set of Web of Science as the data source, and the LDA topic model was trained with Python to analyze the research hotspot and changing trend. Based on the topic-word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the study identifies 1325 abstracts and extracts 18 important topics of digital journalism research from 1998 to 2021. According to the document-topic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the time dimension is introduced to calculate the topic intensity distribution. It is found that most of the research topics have maintained a relatively stable and rising trend, although a small number of topics have a downward trend, but it is only a weak decline. Specifically, the strength of 7 topics showed an upward trend, 5 topics showed a weak downward trend, and 6 topics tended to be stable.

Keywords: digital journalism; LDA topic model; research topic; topic evolution

Authors: Chao Naipeng, Schoo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henzhen University. Han Shaoqi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Wu Xingtong, Schoo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henzhen University.

“民族”与“传播”：一种概念层面的辨析¹⁾

郭建斌 苏涛

摘要 “民族”与“传播”，是两个具有很多内在关联的概念，本文对“民族”与“传播”的各自含义、两个概念以及相应的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具体的关联理论，以及“民族”与“传播”关联性的又一种理论表达（“共同体想象”）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这样的梳理，对于更好地促进“民族”与“传播”研究的学科交叉，进而推动理论上的进步，均有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 “民族”；“传播”；概念辨析；“共同体想象”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郭建斌，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昆明 650091；苏涛，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云南昆明 650504

“民族”与“传播”，乍看起来似乎是两个没有太多关系的概念，但是作者在多年从事相关研究以及阅读这两类文献的过程中，发现这两个概念之间有很多的相通之处，并不像从表面看起来那样的没有关系。在国内传播研究中，的确也有过“民族传播”“民族传播学”“民族志传播（研究）”“传播民族学”等等不同的表述，在这些表述中，如“民族志传播”或“民族志传播研究”，主要是从方法或研究取向的方面来讲的，严格说起来，和“民族”并无直接关系（尽管“民族志”的表述与“民族”有关）。其他几个表述，或许是看到了“民族”与“传播”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或许也并未看到这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只是一种随意的说法。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至少在目前的中文传播研究中，还没有人对“民族”与“传播”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做过较为深入的讨论。在我们看来，那种“拉郎配”式拼贴出来的概念（或术语），除了能够制造出一种繁荣的“假象”，对于学术的发展、理论的进步不仅毫无益处，反而有害。因为如果不从概念的内涵上打通概念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那种拼贴式的概念（或是说法），一方面因难以深究（或是不敢深究）过一段时间就不得不“改头换面”，另一方面，这样的“投机”的学术研究不但不能促进理论或知识的进步，反而会对良好的学术风气带来危害。

基于此，本文将聚焦于“民族”与“传播”两个概念，并围绕如下问题来展开：“民族”与“传播”各自的含义是什么？“民族”与“传播”的观念以及相关的学术话语是如何形成的？从它们所产生的背景来看两者又具有怎样的联系？在既往的讨论中，哪些理论话语已经表明了这两者是相通的？其相通的关键节点又是什么？

1) 基金项目：云南大学一流大学“民族传播研究与媒体人类学”创新团队项目(C1762402002)。

一、何谓“民族”?何谓“传播”?

关于“民族”与“传播”的含义,在各自的学科中均有过不少的讨论,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要重复这些讨论,而是在别人相关讨论的基础上,对其含义做一个简要说明,便于展开本文后面问题的讨论。

(一)何谓“民族”?

何谓“民族”?简单地来说,就是指一个特定的人类群体。当然这不是一种学术化的表达。关于这样一种特定的群体观念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在下文中将会做详细说明,在这里主要对“民族”概念的含义做一个粗略的梳理。

既往关于“民族”的讨论,主要是在两个方面来展开的,一个是文化维度,一个是政治维度。但是,在我们看来,其实还应该有一个维度,这一维度在既往的研究中也有涉及,并且与当下出现的某些新的研究领域相关,我们称其为科学维度。下面分别进行说明。

1.文化维度。当我们在谈论“民族”时,有时是从文化维度来理解的,因而民族学也称为“文化人类学”。正如凌纯声所说的,“因为民族学的研究对象为文化,故又称‘文化人类学’。”^①关于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关系,林惠祥曾做过详细的说明,他这样写道:

英美所谓人类学是广义的,其中分为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与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二部分。欧陆所谓人类学是狭义的,等于英美的体质人类学,而民族学则等于文化人类学。但民族学一名在英美也很盛行,其意义与欧陆无别,而与文化人类学可以通用。在英美文化人类学又别称为“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体质人类学又别称为“人体学”(Somatology)。^②

哈维兰从学科的角度所进行的说明似乎更为简明,他这些写道:“在传统上,人类学被划分为四个领域:体质人类学和三个文化人类学分支学科:考古学、语言人类学和民族学。”^③我们在这

里并不是要对学科名称进行讨论,而是因为谈及相关问题时不少人并不清楚上述不同名称之间的关系,因此做一个说明。简单地说,当我们从文化维度来理解“民族”这一概念时,它与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的意思几乎就是完全相同的。当然,这里又引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即何谓“文化”?雷蒙·威廉斯把“文化”(Culture)称为英文里“两三个比较复杂的词”^④之一。“文化”概念的复杂性,也意味着当我们从文化的维度来理解“民族”时,其含义也是十分复杂的。在此,我们倾向于从赵仲牧先生关于文化的总体构造的观点来理解文化。赵先生把文化区分为三个层面,即实物层面、行为层面、观念层面,在实物层面中,又包含了劳动产品(食物、器物、工具、武器、工艺品等)、观念化的自然物(有固定象征意义的自然物);在行为层面中,又包括生产-技术行为(生产实践、技术操作、交换行为等)、语言符号行为(语言传达行为、其他符号传达行为)、伦理-行政行为(道德行为、伦理行为、政治行为、管理行为等);在观念层面中,又包括实证知识、观念价值【实用观念、生产-交换观念(经济观念)、求知-爱智观念(科学观念、真知观念)、伦理观念(道德观念、法律观念)、信仰-宗教观念(自然崇拜、巫术观念、宗教观念)、审美-艺术观念(娱乐观念、审美观念等)】。^⑤赵先生特别说明,这样一种文化的总体构成,包含人类文化、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上述这样一种文化构成,几乎完全囊括了我们在讨论文化时的所有方面,同时,也囊括了当我们从文化维度来理解“民族”时的所有方面。因此,当我们从文化维度来讨论“民族”时,两者的含义基本上是相同的。套用我们在此部分开头的说法,所谓民族,指的就是具有某种特定文化的一群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学的研究也就等同于人的研究,也正因如此,才有哲学家曾对人类学做出过如此的美誉:“人类学是所有学科中最具解放性的。它不仅纠正种族和文化优越性的

① 凌纯声.民族学与现代文化[N].国立中央大学日刊,1932(873):12-21.此处转引自: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5.

谬误,而且致力于研究任何地方、任何时代的
所有民族,它对人的本质的阐明超过哲人的所有反
思或实验科学家的所有研究。”^①这里所说的民族,
其实也是泛指所有的人。但是,人类学对于人的
理解,又不是抽象的,而是具有特定的文化构成
的,同时,这里又引入了一个时间维度(历史),
正是由于上述文化构成在某些方面存在的差异,
以及相应的历史变迁,导致了作为人的“民族”
的复杂性。因此,从文化维度来理解民族,民族
即文化,民族即人。^②

或许有人觉得这样理解“民族”过于宽泛,
这是因为没有理解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
“民族”的含义所致。人类学意义的“民族”,包
含了人类历史及当下所有的人。这一方面表明了
人类学的开放性,同时,这也应该成为当下我们
理解人类学的一种基本共识。如果此时民族学还
要与人类学具有相同的意义,对于“民族”的理
解也应当具备这样的一种视野。用一个公式表示:
民族=文化=人。从这三个词所对应的观念产生
的时间来看,人是最先的,文化其次,民族第
三。

2.政治维度。当我们在谈论“民族”时,有
时又是从政治维度来理解的,甚至有时候这一维
度成为了我们理解“民族”的唯一维度。尽管
“民族”的含义在很多时候可能是这一维度上的,
但是若仅仅把“民族”的理解局限于这一维度,
忽视了前文所说的文化维度,对于“民族”的认
识和理解是不完整的。人类学意义上民族研究也
无从谈起。

林耀华曾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的
“民族”一词的丰富含义进行过较为系统地梳理,
具体明确为四重含义,分别以民族1、民族2、民
族3、民族4指代,林先生这样写道: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总括的说:民族1

(этнос——Völker——народы)指的是最一般最广
义的人们共同体的意义,它包括从原始时代一直
到社会主义时代的共同体。民族2(Nation——
Nationalität——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指的是较广泛的
人们共同体的意义,它包括从阶级社会产生以后
的各个时代的共同体。民族3(нация)指的是现
代民族,也就是资本主义上升以后具有的四个特
征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民族4(народность——
Völkerschaft)是在 нация 确定专指现代民族之后,
逐渐被用来指明奴隶制和封建制时代的人们共同
体,但是在苏联也指明那些在十月革命时没有来
得及经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共同
体。^③

林先生此处总结的马克思、列宁经典文献中
的“民族”的四重含义,应该说主要是从政治维
度来理解民族的,这里所说的共同体(国家也是
政治共同体的一种形态),更倾向于政治共同体的
意义,而不是文化或社会意义上的“共同体”。对
于这两类“共同体”的差别,本文后面还会讲到。

正是基于“民族”政治维度的理解,丹克沃
特·A·拉斯托才这样写道:

民族思想的普及要归功于两个历史运动:首
先,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的战争,使得这个思想从
法国传播到其他欧洲国家,尤其是传播到德国、
意大利、西班牙和俄国;其次,20世纪反殖民主
义运动,使得这个思想广泛传播到亚洲、非洲和
其他大陆。^④

在这里,拉斯托讲到民族主义思想起源于法
国,并传播到欧洲其他国家以及亚非大陆。这属
于本文所讲的“传播”的一个方面,后文还会做
详细说明。

3.科学维度。在这里,我们把并不属于传统的
(或狭义的)民族学研究范畴的体质人类学、语言
人类学,以及当代引入基因技术对某些特定人群

①此话是格拉斯·德·拉古纳在她1941年就任美国哲学协会东方分部主席演说时的陈述。转引自哈维兰的《文化人类学》一书。

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不少学者对“民族志”的翻译提出异议,认为应该翻译为“文化志”(张小军,木合塔尔·阿皮孜.走向“文化志”的人类学:传统“民族志”概念反思[J].民族研究,2014(04):49-57+124.)、“互经验文化志”(刘海涛.主体民族志与当代民族志的走向[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8(04):2-6.)、“人志”(朱炳祥.事·叙事·元叙事:“主体民族志”叙事的本体论考察[J].民族研究,2018(02):40-53+124.)等。在我们看来,这当然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但是强化对于“民族”概念的文化维度的意义的理解,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解决问题的又一种方法。

的研究,如“分子人类学”^①等等称之为“民族”的科学维度。之所以要提这样一个维度,一方面是诸如已经存在的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等,在相当程度上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进行研究的,并且也涉及了前面所讲到的“民族”的两个维度;另一方面,最近出现的像“分子人类学”,甚至还有采用大数据、地理信息系统等来对“民族”进行研究的。凡此种种,均表明“民族”其实还存在这样的一个科学维度。从这一维度来界定民族,可以做如此表述:所谓民族,指的是由某些科学证据(包括体质、心理、生物遗传等)证明属于某个群体的一群人。关于这一点,或许有读者会有疑问。但这是我们结合当下学科交叉(或是所谓“新文科”)的现状及趋势做出的一种理解,不妥之处,也希望读者提出批评。

文化维度和政治维度的“民族”,其观念、思想均是源自西方。关于西方“民族”概念进入中国,有不少学者做过讨论,在此不再重复那些讨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中文语境中,对于“民族”的理解,更主要还集中在政治维度。这与新中国建立之后国内的民族识别及制度层面的民族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这样一种对于“民族”的理解或许存在某些问题,因此,国内从1980年代开始围绕“民族”概念进行过不少的讨论^②,由

于篇幅所限,在此不对这些讨论进行展开说明。所谓这些讨论,其中一个重要的分歧就在于前面讲到的文化维度和政治维度的侧重点的差别。虽然这样的讨论对于“民族”的理解尚未达成共识,但是,这样的讨论,的确拓宽了我们对于“民族”的理解和认识,改变了既往对于“民族”的单一维度的理解。

(二) 何谓“传播”?

正如余也鲁所说的:“传的活动像空气,无所不在;也像空气,太普遍反而未能有意识地觉得它的重要。”^③较之民族学,传播学无论是在西方国家出现以及进入中国,均要晚得多。如果从1970年代末期传播学正式进入中国大陆算起,至今也只有40余年。在过去40多年的时间里,通过数量不菲的外文著作的翻译,国人对于“传播”的含义的理解,也不断地深入、完整。尤其是随着现代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中国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一样进入了“全球化”“媒介化社会”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传播”的重要性,并且,随着人们对于“传播”的含义的理解的不断深入、完整,人们意识到所谓“传播”,也并不仅仅是一种信息的传递,或者说是前文所说到的民族思想从法国向欧洲各国,乃至亚非大陆的“扩散”。

①参见:盛桂莲,赖旭龙,王颖.分子人类学与现代人的起源[J].遗传,2004(05):721-728.李辉.分子人类学所见历史上闽越族群的消失[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2):42-47.纳日碧力戈.民族与民族概念辨正[J].民族研究,1990(05):11-17+38.纳日碧力戈.民族与民族概念再辨正[J].民族研究,1995(03):9-16.杨庆堃.民族的概念和定义[J].民族研究,1990(06):17.王逸舟.民族主义概念的现代思考[J].战略与管理,1994(03):7-12.周旭芳.“1998年‘民族’概念暨相关理论问题专题讨论会”综述[J].世界民族,1999(01):3-5.马戎.关于“民族”定义[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01):5-13.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6):122-133.李红杰.论民族概念的政治属性——从欧洲委员会的相关文件看“民族”与“族群”[J].民族研究,2002(04):11-20+106-107.周传斌.论中国特色的民族概念[J].广西民族研究,2003(04):19-30.王东明.关于“民族”与“族群”概念之争的综述[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2):89-97.乌小花.再论“民族”概念与民族问题理论[J].青海民族研究,2005(02):13-17.龚永辉.民族概念:话语权与学理性——中央“12条”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研究之一[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01):34-38.卢义.民族概念的理论探讨[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4):23-28.崔明德.中国民族思想的概念及发展脉络[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04):21-32+147.潘蛟.“族群”与民族概念的互补还是颠覆[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6(01):22-28.何叔涛.汉语“民族”概念的特点与中国民族研究的话语权——兼谈“中华民族”“中国各民族”与当前流行的“族群”概念[J].民族研究,2009(02):11-20+108.高永久,秦伟江.“民族”概念的演变[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6):126-136.文明超.政治斗争中的民族话语——兼谈“族群”与“民族”概念之争[J].开放时代,2010(06):53-66.郝亚明.试论民族概念界定的困境与转向[J].民族研究,2011(02):1-9+107.金炳镐,毕跃光,韩艳伟.民族与族群:是概念的互补还是颠覆?——民族理论前沿研究系列论文之二[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02):4-15.

②参见:敬东.关于“民族”一词的概念问题[J].民族研究,1980(04):7-12.何叔涛.民族概念的含义与民族研究[J].民族研究,1988(05):17-24.

③引自:余也鲁为宣伟伯(施拉姆)《传学概论》中译本所写的代序。参见:宣伟伯著,余也鲁译.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入[M].香港:海天书楼,1983:IX.

与“文化”概念有些类似,无论是在中文还是英文中,“传播”均是一个含义十分丰富的词汇。在中文语境中,“传播”有“传送或散布”(如“传播知识”)、“传染”(如“传播疾病”)、“广泛散布”(如“负责传播书籍的图书馆员及出版者”)、“使普遍知道”(如“传播关于最新科学发明的情报”)^①等含义。当然,这样的词典含义与作为学术概念的含义并非同一回事,因此,对于传播研究中“传播”一词的讨论,不能从各自文化词源的角度去进行讨论。在中文传播研究中,是有王怡红、宋昭勋等学者对“传播”的含义进行过讨论,但是这样的讨论,主要还是从英文“communication”^②一词的意义上来讲的。

在英文文献对于 communication 的讨论中,克劳斯·克里蓬朵夫(Klaus Krippendorff)对于 communication 的隐喻的讨论,是十分具有启发意义的,然而这样的讨论,在既往关于“传播”的讨论中较少被提及。克里蓬朵夫把 communication 的隐喻区分为“容器隐喻”(The Container Metaphor)、“导体隐喻”(The Conduit Metaphor)、“控制隐喻”(The Control Metaphor)、“传递隐喻”(The Transmission Metaphor)、“战争隐喻”(The War Metaphor)及“舞蹈-仪式隐喻”(The Dance-Ritual Metaphor)等六重隐喻^③。

克里蓬朵夫上述六重隐喻中的某些方面,如“战争隐喻”“舞蹈-仪式隐喻”等,在中文语境中,是很难体会到这样一些隐喻的存在,这其中,既有制度文化方面原因,也有学术路径方面的原因。其实克里蓬朵夫所讨论的英文中 communication 的这样一些隐喻,也并非是说英文 communication 本身存在这样的一些意义,而主要是从 communication 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在讨论 communication 问题时可能的一些理解。

应该说,克里蓬朵夫这样一种对于“传播”的理解,是目前可以见到的文献中对于“传播”的含义最为丰富的阐明。虽然有些隐喻在不同的

社会文化语境中并非能完全地感知到其意义,无法完全照搬克里蓬朵夫这样的一种意义划分,但是克里蓬朵夫这样的一种详细的意义区分的工作,对于我们理解“传播”十分具有启发意义。在上述六重隐喻中,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或许最好理解的是“传递隐喻”,但是除了“传递”之外,就“传播”而言,还有其他的含义。

此外,在英文文献中对于“传播”的讨论,还有一种十分有启发的观点是美国学者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以下简称凯瑞)所说的“传播的传递观”与“传播的仪式观”。对于“传递观”,凯瑞的解释是:“传播是一个为了对距离和人进行控制而使信息在空间得以传递和发布的过程。”^④对于“仪式观”,凯瑞的解释是:“传播的仪式观并非指讯息在空中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社会的维系;不是指传达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representation)。”^⑤凯瑞这样的一种对于传播的洞察,直接的影响来源是美国人类学家克里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的文化的阐释的观点。从事人类学研究的格尔兹的观点为何会直接影响了从事传播研究的凯瑞?这也是直接启发我们去思考“民族”与“传播”两个概念之间存在关联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触点”。

较之1980年代以来国内对于“民族”概念的讨论,国内对于“传播”概念的讨论显得相对不足,目前我们对于“传播”的含义的理解,更多地还是停留在对西方学者相关讨论的介绍方面,尤其是基于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以及丰富的传播实践进而形成关于中文语境中的“传播”的特定含义方面,还有很多的“空白”有待研究者去填补。

从上述对于“传播”含义的简要说明中也让我们意识到,虽然前面关于“民族”的含义的说明中我们看到有学者提到了“传播”,但是使用这一术语或概念的作者,其对于“传播”的理解,应该说也是较为简单的,甚至仅仅是作为一个术

①此处词义来自“汉典”: <http://www.zdic.net/c/0/157/345558.htm>。

②中文中所说的“传播学”,对应的英文就是 communication,本文所说的“传播”,均是在 communication 的意义上来讲的。

③华人学者潘忠党曾在—篇中文的文章中引用过克里蓬朵夫的相关讨论,但是潘忠党的表述稍有不同,潘文的六重隐喻是:传送、导体、容器、拷贝、权力、社区。参见:潘忠党.传播媒介与文化: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研究的三个模式(下)[J].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6(05):16-24.

语在使用“传播”，并非是把它作为一个具有丰富含义的概念来使用的。在人类学中的各种理论学派中，有一个学派中文有时翻译为“传播论学派”，但是这里所说的“传播”，其对应的英文词是 diffusion^[10]。从上述对于“传播”的含义的说明中可知，diffusion 也具有“传播”的含义，但是就中文翻译而言，翻译为“扩散”或许更为恰当。了解这一学派的人都知道，该学派的核心观点是“将人类文化或社会中的变化，首先归因于物质文化或习得行为从一起源社会散播到其他社会”^[11]。

二、“民族”与“传播”相关研究产生的背景

要讲清楚“民族”与“传播”之间的关系，除了上述两个概念的含义之外，还需要对这两个概念相关的学术研究产生的背景进行考察，以便更好地理解这两个概念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

如前所述，在“民族”“文化”和“人”三个概念中，“人”是最为古老的，其次是“文化”，再次是“民族”。虽然我们在前文中也讲到民族研究可以涉及古代的人，也可以是未来的人，但是作为某个特定人群的“民族”概念（或观念），则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的，在我们看来，地理大发现、殖民势力的全球扩张，是“民族”概念产生的最为直接的动因。当然这其中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期，直到 19 世纪中期，随着民族学作为一种特定的知识话语类型的确立，“民族”作为一种观念，才普遍被人们接受。

西方民族学产生的一种重要原因是因为人们意识到了文化差异，这是大家讲得较多的，但是仅仅看到这一点还不够，为了达到更为有效的沟通，这才是更为真实的动机。这种有效的沟通，正是我们这里所讲的“传播”。正如我们在讲述殖民势力与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关系时通常会讲到的：“对于殖民地民族及文化的了解是为了因俗而治，减缓当地民族更为激烈的反抗，以确保统治的顺利实施。”^[12]即便是后来人类学研究中所说的研究他者，是为了反观自身。这同样是一个“传播”问题，即传播学所讲的“内向传播”。

随着地理大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殖民扩展，一方面人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了与自己不同

的人，希望去了解这些人以及她们的文化；另一方面，随着人的全球流动，这些流动的人与自己的国家、家人的联系，自然成为一种迫切的需求。上述两个方面，均使得沟通、交流成为那个特定时代的重要命题。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传播”概念的形成以及传播学的诞生，比“民族”概念的形成及民族学的诞生晚了近一个世纪。但是，在有些从事传播思想史研究的学者看来，作为现代概念的“传播”（即英文中的 communication）的含义确立，是 1844 年电报的发明。美国学者丹尼尔·切特罗姆（Daniel J. Czitrom）认为，1844 年电报的出现，“标志着传播（communication）从交通（transportation）中第一次分离出来，并开启了电子媒介时代。”^[13]而这个时间点，和民族学学科诞生的时间，几乎是一致的。但是，传播学获得学科的地位，则是在近一个世纪之后，并且与报纸、广播、电影等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的普及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其实所有的学科的产生、发展，情况几乎都是一致的，一定是现实先提出问题，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会有相关的学科或研究领域出现。

从以上对于现代“传播”概念的意义的确立以及传播学学科的诞生来看，与现代传播媒介有着直接关系，或许正是这样一种先天的局限，制约了此后的传播研究。或者说即便是西方从事传播研究的人对于“传播”的理解，其实也不是前文所说的克里蓬朵夫意义上的“传播”。

当然，就全球范围内的传播研究而言，还有一个重要的传统是英国的“文化研究”，这一传统，与发端于美国的传播研究有很大的差别。英国文化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雷蒙·威廉斯、斯图尔特·霍尔等都对“大众传播”“传播”等概念进行过批评。凯瑞这样写道：

霍尔认为“传播”这个词在实质上和方法上使得研究变得狭隘而孤立。在实质上，他的研究视野狭窄到只涵盖由大众媒介生产与发布的产品，于是，一方面传播学研究在整体上从文学与艺术的研究中孤立出来，另一方面也从日常生活，如宗教、交谈、体育这类表达与仪式的形式中孤立

出来。^[14]

如果回到上文对于“民族”概念形成以及民族学学科的诞生的历史背景来看,无论是对于“传播”概念的含义以及传播学的学术史,或许均要进行重写?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也正是因为地理大发现以及殖民势力的全球扩展,使得人类交流、沟通的问题变得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重要。“民族”与“传播”的观念,正是源于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背景。

三、“民族”与“传播”:更为具体的关联理论

如上所述,“民族”与“传播”的观念,产生于共同的历史背景。在此后的相关讨论中,其实有更为具体的理论再度涉及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关系,只不过这些学者均未单独对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说明,或许在他们看来,这已经是显而易见无需再做讨论的。其实这方面的关联理论数量还不算太少,在此列举几个在我们看来较为重要的“理论”。

(一) 多伊奇的观点

一位较少被传播学者关注的德裔美国政治学家卡尔·多伊奇(Karl W. Deutsch,以下简称多伊奇),在其1953年出版的专著《民族主义和社会交流》(Nationalism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中,系统阐述了他的民族与传播观点。

多伊奇作为一位政治学者,民族与民族主义显然仍是他在讨论相关问题时的出发点。然而,与众不同的是,多伊奇认为,“社会(society)和共同体(community)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是许多民族问题的根源”。^[15]或许正是基于此,他将民族主义的思考引向了共同体以及与共同体密切相关的传播(communication)方面。多伊奇由此敏锐地捕捉到了“传播”与“民族”的关系。他认为:“一个民族成员的本质在于社会传播(social communication)的广泛互补性。它包含有能力在一个大的团体里,与其成员而不是与外人,进行更有效、更广泛的传播(communication)。”^[16]

“社会传播”(social communication)不仅是多伊奇民族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而且成他考察、监测民族主义的一个主要指标——他

甚至认为,通过对社会传播的研究,可以准确地描绘出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发展。^[17]

在对民族问题的讨论中,多伊奇还特别强调了文化的意义。然而,他并没有将“民族”作为一种天赋的文化特质,而认为它是一种社会习得的文化结果。显然,这种社会的习得过程离不开传播的作用。正如多伊奇所阐明的:

共同的文化是人们的注意力、行为以及思想和感情中所有共同的一套稳定的、习惯性偏好和优先次序。这些偏好中的许多可能涉及传播(communication),……只要一种共同的文化促进了交流,它就形成了一个共同体(community)。^[18]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位著名的政治学家,多伊奇似乎对传播与交流问题的格外敏感,他还对另一个在政治学领域广受关注的概念——“安全共同体”(Security Community),从理论上和实证上进行了全面阐述,并且由此开启了政治学中的政治沟通理论的路径。^[19]

(二) “想象的共同体”

与多伊奇相比,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以下简称安德森)则是一位在整个人文社科领域近乎“妇孺皆知”的学者,关于这一点,他那本以29种语言畅销于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想象的共同体》就足以说明问题。虽然没有直接证据显示安德森是受到了多伊奇的直接启发,但毫无疑问,从学术史的发展脉络上来看,他关于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的论证,正是对多伊奇的民族与传播观念的发扬光大。如果说多伊奇明确提出了传播在(现代)民族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安德森则系统阐述了传播如何作为(现代)民族形成的一种重要机制。

安德森既然把民族界定为“想象的共同体”,必然需要回答“民族共同体何以成立?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何以可能”这两个关键问题。以下,本文将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梳理,来考察安德森的“民族”与“传播”观念,且只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梳理才能更深入地进入对“传播”如何与“民族”关联过程的探讨。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民族共同体何以成立?在安德森的理论中,“现代化”成为民族共同体成

立的“社会结构上的先决条件”(吴叡人语)。正如笔者在前文所述,“民族”(nation)首先是一个现代概念,而安德森深谙于此。他认为,“民族是一种现代(modern)的想象形式——它源于人类意识在步入现代性(modernity)过程中的一次深刻变化”^①。那么,这种现代化又体现在哪些方面?

安德森认为,宗教信仰的领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落、时间观念的变化,以及资本主义与印刷术等是造就(现代)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现代化核心因素。其中,他特别强调印刷资本主义(包括报纸和小说^②)为民族想象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和社会心理基础——在印刷资本主义兴起之前,尽管人们在宗教信仰、语言、相貌特征等方面享有共同的东西,但由于方言等障碍的存在而无法实现相互的理解,而只有在印刷资本主义产生之后,上述那些人们之间的共同特质才能真正发生作用,进而成为“想象的共同体”的基础。由此可见,现代化所引起的结构性变化,特别是印刷资本主义的兴起使得民族共同体得以成立。由此可以说,民族是一种历史结构。

接下来看第二个问题: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何以可能?安德森认为,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不在于其成员拥有多少共同的文化特质,而在于“想象”的过程和方式。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在本质上,人们对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不是凭空捏造的,不是虚假意识的产物,而是一种社会心理学上的“社会事实”^[20]。然而,这种社会事实又是如何形成的?换言之,民族共同体想象是如何实现的?得益于其建构主义的方法论,安德森将民族的本质界定为一种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心理的建构。而对于这种建构过程,安德森特别强调了传播在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事实上,所有比成员间有着面对面接触的原始村落更大(或许连这种村落也包括在内)的一切共同体都是想象的。区别不同共同体的基础,并非他们的虚假真实性,而是他们被想象的方式。”^[21]在安德森看来,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最

初而且最主要是通过文字(阅读)来想象的。经由小说、报纸等印刷媒介(这些媒介在今天演化为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的传播,通过共通的阅读与想象,人们拥有了共同的生活经验,这些共同的经验的凝聚不仅使人们与同胞之间有了休戚与共的感受,也使得人们意识到与其他群体的区隔——正是基于这种社会心理基础,才促生了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而在这一过程中,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民族共同体成员必须凭借一定的传播(媒介)来感受某种休戚与共的手足同胞之情。此外,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文献、神话传说、仪式、文学小说、语言,以及安德森提及的地图、人口调查、博物馆等传播符号和象征资源也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民族共同的生活方式与行为规范,促使人们产生民族认同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上述这些方面共同构成了民族形成的现实的传播机制。

“共同体何以成立?想象何以可能?”——如果说前一个问题回应的是历史机制(历史结构)问题,后一个侧重于社会现实机制(现实结构)问题。基于前文的论述,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传播”,“想象的共同体”就没有实现的具体途径。在安德森的讨论中看,他强调了印刷媒介对于“想象的共同体”形成的重要作用,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又把传播思想史的梳理往前推进了几百年。但是,正如前文所说的,在我们看来,地理大发现和全球的殖民扩张是“民族”与“传播”观念产生的最为重要的动因,而印刷媒介,只是为“想象的共同体”的实践提供了具体的条件而已。

(三)“传播的仪式观”

如果说多伊奇和安德森均是从“民族”入手来讨论问题时涉及了“传播”,那么,美国传播学者凯瑞作为一位传播学者,他又是如何从“传播”入手,进而触及到“民族”问题的?

在这里,首先需要对凯瑞的传播思想的理论来源做一个简要说明。凯瑞的传播思想的理论来源,简单地说,主要是两个,一个是以杜威等为

①引自吴叡人为《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所写的导读:“认同的力量:《想象的共同体》导读”。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8.

②后来又将地图、人口调查、博物馆等传播方式补充进去。

代表的芝加哥早期社会学派,另一个则是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凯瑞对于“传播”的理解是一种文化取向的,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是格尔兹的“文化的阐释”的观点,直接影响了凯瑞。凯瑞的确没有在讨论“民族”,但是凯瑞关于“传播”的讨论的理论,则是直接来自格尔兹对“民族”的研究。这种理论上的相通,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表明了“民族”(主要是前文所说的文化维度)与“传播”之间存在的关联。在凯瑞那里,“传播”与“文化”几乎是两个等同的概念,若此,如果我们从文化维度来理解“民族”,它与“传播”的关系也就更加地显而易见了。

凯瑞的主要传播思想,集中体现在1989年出版的《作为文化的传播》这样一本论文集中,其中最为重要的观点,即“传播的仪式观”。本文作者之一也曾对此进行过一些解读^[2],但是从本文论述的完整性出发,还需再做适当说明。

凯瑞认为,“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23]在此基础上,他在对居于主流地位的传递观(传播即信息传递)进行批判的,提出了传播的仪式观——一种长期被遮蔽的,旨在强调传播的文化功能和作用传播观念。

为了说明自己与传统迥异的传播观念,凯瑞使用了“仪式”这个隐喻,也就是说,他更多地是在类比的意义上使用“仪式”^①。然而,除了要与传统的传递观进行明确区分这个原因之外,他为什么要用“仪式”来类比传播?换言之,凯瑞为什么选择“仪式”这个概念来表达自己的传播观念?^②

基于本文概念考察的目的来进行分析,我们认为,有两个因素促使凯瑞将“仪式”作为一种很自然的传播隐喻。

第一,仪式内含“时间的同一性”。“传播的

仪式观并非直指信息在空中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社会的维系”^[24]——传播如何穿越时间实现对社会的维系?凯瑞在书中对这个问题并没有直接的和集中的回答,但通过其散落在不同段落的只言片语,我们仍然可以还原出他的大致想法。

凯瑞曾借用英尼斯(Harold Adams Innis)的表述,认为西方史始于印刷文明所创造的“时间性构造”。而笔者认为,这种时间性构造的核心就是社会时间的同一性。凯瑞一段关于传播概念的辨析,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此问题进行了某种解读:“当电报比横跨大陆的铁路干线早八年到达西海岸时,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符号上,‘传播’和‘运输’这两个词的同一性就此终结了。在电报之前‘communication’被用来描写运输,还用于信息传达,原因很简单,当时讯息的运动依仗双足、马背或铁轨运载。”^[25]电报没有出现之前的印刷时代,讯息的传递需要“人背马驮”,因此信息的传播即是信息的运输(传递),这种情况下,空间内嵌于时间之中,或者说时间的同一性包含着对空间的整合。这也是英尼斯所谓的“时间束缚型文化”,它构成了仪式传播的前提条件,也形成了仪式传播的基本场景。

时间的同一性以其横向的空间联结(即凯瑞所谓的“横向维度”,horizontal dimension,也即安德森所谓的横向空间的“同时性”),创造了新的时空联结和文化联结形式:“口语的、神话的、宗教的、仪式的;其社区根植于地方之中——有着亲密联系和某种共享的历史文化”^[26],从而实现了对社会的维系——“进入现代国家、国际关系,并带来了社会阶层在意义与关系上的改变”^[27]。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凯瑞认为,传播的仪式观“不是指传达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28]。

第二,仪式具有高度的情境性。人类的仪式往往通过不断的重复和循环,创造出一个高度情景化的信息和交流环境,从而对文化进行共享、对社会秩序进行再确认,最终达到维系社会共识

①参见本文一位作者的文章:郭建斌. 如何理解“媒介事件”和“传播的仪式观”——兼评《媒介事件》和《作为文化的传播》[J]. 国际新闻界, 2014, 36(04): 6-19.

②本文作者之一曾在《理解与表达: 对凯利传播仪式观的解读》一文中对什么是仪式做过一定的解读, 在此, 采用另一个视角来解释这一疑问。参见: 郭建斌. 理解与表达: 对凯利传播仪式观的解读[J]. 中国传媒报告, 2006(3), 50-59.

和秩序,保存社会记忆和传统的作用。

以宗教仪式为例,其过程往往充斥着大量重复和循环活动,如宗教领袖的布道、信众的共同祈祷等一些在信息的传递和增量层面上看似“无意义”的活动。然而,仪式具有传递信息的性质,但却不限于信息的传递。借用为凯瑞极为推崇的格尔兹的说法:“正是在特定的仪式中——即便这仪式不过是背诵神话,求助神谕或装点坟墓——宗教象征符号所引发的情绪和动机,与象征符号为人们系统表述着的有关存在秩序的一般观念相遇,相互强化。”^[29]仪式在向人们传递信息的同时,还通过这些高度情景化传播活动,让人们在其中共享经验、情感和意义,共享“共同信仰的创造与表征”。

虽然传播仪式观中的仪式并不能简单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仪式,但凯瑞通过仪式的隐喻,提示我们需要关注传播过程中的仪式化现象,而不仅仅是那些直接的信息传递行为。对传统的传递观或线性传播模式而言,这些情景化信息往往是作为“冗余信息”而被忽略的。因此,凯瑞用仪式来提示我们传播活动类似于仪式活动,传播研究需要重视那些大量的看似“无意义”的情景化信息和行为,因为它们涉及经验、情感 and 意义的共享,因而在某些情况下比直接的信息传递更为重要。

与强调信息在空间扩散的传递观不同,仪式观强调传播(媒介)在时间上维系社会的作用——这种维系与保存、传承与记忆,恰恰是文化的社会功能。也正是基于此,凯瑞认为传播活动实质也是一种文化活动,传播行为即是文化行为,传播就是一种文化的共享过程。鉴于凯瑞明确指出传播的仪式观“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因此如果把传递观总结为分享模式,则仪式观则可以总结为共享模式——一种文化的共享。

四、“共同体想象”:“民族”与“传播”关联性的另一种理论表达

从以上梳理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民族”与“传播”这两个概念之间可能存在的种种关联,但是,在我们看来,仅仅停留于此还不够,有些

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说明。

关于“民族”与“传播”两个概念之间的关联,在我们看来,最为重要的是两个点,一个是“共同体”,另一个是“想象”,基于此,涉及这两个概念的相关讨论,我们把它表述为“共同体想象”。这样的表述,也正是本文开头处所提到的“民族传播”“民族传播学”“民族与传播研究”“传播民族学”等说的真实含义,这也是“民族”与“传播”关联性的另一种理论表达。

正如前文所讲到的,在关于“民族”概念的讨论中,尤其是政治维度上的“民族”概念,“共同体”是一个具有共识性的表述。但是政治维度的“共同体”仅仅只是“共同体”概念的其中一个方面,除此以外,“共同体”还有更为丰富的含义。关于“共同体”的相关讨论非常之多,我们再次只想结合芝加哥早期社会学派讨论“传播”时涉及“共同体”的内容来进行说明。

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杜威有一段讨论传播的话经常被很多人引用:社会不仅通过传递、通过沟通继续生存,而且简直可以说,社会在传递中、在沟通中生存。在共同(common)、共同体(communitiy)和沟通(communication)这几个词之间,不仅字面上有联系,人们因为有共同的东西而生活在一个共同体内;而沟通乃是他们达到占有共同东西的方法(或手段)。为了形成一个共同体或社会,他们必须共同具备的是目的、信仰、期望、知识——共同的了解——和社会学家所谓志趣相投。^[30]

前文提到的美国传播学者克里蓬朵夫对于传播隐喻的讨论,华人学者潘忠党曾在一篇中文文章中进行过介绍。潘忠党对六重隐喻的归纳是:传送、导体、容器、拷贝、权力、社区。这里所说的“社区”,对应的英文词正是community,也即我们这里所说的“共同体”。潘忠党对此的解释是:“即思想和意义交流发生于生活在某一有限的实体空间范围内,在某一个共同时间区域内的人们当中,而交流的结果是增强社区的纽带和意识。”^[31]这样的观点,与上述杜威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

显然,无论是杜威还是克里蓬朵夫,他们对

于“共同体”的理解是较为宽泛的，不仅仅是政治共同体，还可以包括其他几乎所有的共同体。“共同体”的形成和维系，和传播密不可分，甚至我们可以说，“共同体”和“传播”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凯瑞在对传播仪式观进行讨论时把传播看成是“穿越时间的维系”。在凯瑞的文章中，他没有直接使用“共同体”的表述，但是，这样一种“维系”，正是指向某个“共同体”的。

在杜威和克里蓬朵夫对于“共同体”的讨论中还有十分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在这里所说的共同体，不仅仅是实体意义上的，还可能是一种“想象式”的。

关于“想象”，前文在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介绍时也讲到了，在这里，我们想再提供一点芝加哥早期社会学派在讨论“传播”时的相关观点。

库利把传播问题作为人类本质特征进行论述，在这里，“交流欲”提供的是一种动力，而“想象”则是传播实现的方式。如同库利对其它问题的论述一样，库利对于这一传播实现方式的论述，也是从对儿童行为的观察和反省中开始的。他说：“当孩子独自呆着的时候，他们通过想象和伙伴一起玩耍而继续享受着交往的快乐”，“不论是哪一类孩子，在他们学会说话，了解到社会的丰富多彩以后，头脑就像开了窍，想象如泉喷涌，所有的思想就变成了对话”^[32]。在库利看来，“人们彼此之间的想象是社会的固定事实”，并把对它们的观察和解释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强调“人和社会必须在想象中研究”，这也就是库利多说的“对想象的想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想象成为了库利思想中一种最普遍、最高级的沟通方式。正是这种“对想象的想象”，使得库利在论述人类传播行为时不时流露出这样如诗一般的语言，富有诗意，却不失深刻：

我们的意识不是隐居者的草棚，而是待客和交际的客厅。我们没有真正离开他人的高层次的生活；正是通过想象别人，我们的人格得以形成；丧失想象别人能力就成了白痴；意识缺乏这种能力的程度就是它衰落的程度。没有这种意识的交

往，就没有智慧、力量和正义，就根本没有高级的存在。意识的生命基本上是交流的生命。^[33]

在米德的著作中，虽然没有像库利一样频繁地使用着“想象”一类的词汇，但是在他很多关于传播和沟通实现方式的论述中，我们却可以发现与库利、帕克论述过的想象式传播同样的思想存在。米德认为：“姿态对话是沟通的开端”，而这一“姿态对话”，正是通过想象来完成的。在论述新闻报道的重要意义时，米德曾这样说道：“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诸如新闻报道所涉及的沟通媒介这样的沟通媒介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报道的各种情景，而人们通过这些情景就可以进入他人的态度和经验。”^[34]米德在这里所说的“进入”，并非是一种实际的进入，而是一种意识的进入，这种意识的进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想象。这也是库利理论中的“同情”概念在米德思想中的表现，是库利和米德思想的另一个共通之处。

杜威把艺术作品看作“人与人之间唯一的完全无阻碍的传播媒介”，曾把“沟通”（即“传播”）提到“艺术”的高度来论述。他这样写道：“除了论述平凡的事物和令人注意的话以外，必须富有想象力地吸收别人经验中的一切东西，以便把自己的经验明智地告诉别人。一切沟通就像艺术。”^[35]

基于以上说明，本文把“民族”与“传播”的相关研究表述为“共同体想象”似乎就不会显得突兀，或者说是缺乏相应的理论内涵。“民族”不仅具有政治含义，说到底，“民族学”也是“人学”；“传播”为何？显然，是为“人”。

五、结语

本文围绕“民族”与“传播”两个概念来展开讨论，在介绍了其各自含义的基础上，从这两个概念相应的观念的产生的历史背景中找到了进一步的证据，这样一些证据，或许可以进一步拓展我们对于“传播”的理解，以及对传播研究的思想史的书写进行某种改写。在此基础上，本文又在更为具体的理论话语中寻找到了“民族”与“传播”两个概念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最后，本文把“民族”与“传播”相关研究的核心问题表

述为“共同体想象”，并再度进行了相应说明。借用本文中多次使用过的表述，本文这样的一种讨论，肯定也是一种“想象”。本文的讨论虽然是围绕两个概念而展开的，但是所涉及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民族学、传播学两个学科边界，无论是我们对于“民族”的理解，还是对于“传播”的理解，均已不仅仅是既往这两个学科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而是不断地溢出既定的学科边界，拓展相关的认识、理解。当然，这样的做法肯定具有风险，同时我们对于可能存在的风险也有一定的心理准备，望各位有识之士对我们的“想象”提出批评。

参考文献

- [1]林惠祥.文化人类学[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9.
- [2](美)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第十版)[M].张钰,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8.
- [3](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101.
- [4]赵仲牧.赵仲牧文集(第四卷)[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28.
- [5]林耀华.社会人类学讲义[M].张海洋,王晔,整理.厦门:鹭江出版社,2003:258.
- [6]丹克沃特·A·拉斯托.民族[J].郭庆,译.民族译丛,1990(03):75-79.
- [7]Krippendorff, K. Major metaphors of communication and some constructivist reflections on their use [J]. Cybernetics & human knowing, 1993, 2(1): 3-25.
- [8][9][14][23][24][25][26][27][28](美)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修订版)[M].丁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15-157.
- [10][11]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53.
- [12]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50.
- [13]Czitrom D J. Media and the American mind: from Morse to McLuhan [M].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2,p. preface xii.
- [15][16][17][18]Deutsch, K. W. Nationalism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An inquiry into the foundations of nationality [M].Cambridge:MIT press,1953,p. 41-97.
- [19]Deutsch K W. Chapter V.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the North Atlantic Area[M]//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merican Are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162-198.
- [20][21]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6-8.
- [22]郭建斌.理解与表达:对凯利传播仪式观的解读[J].中国传媒报告,2006(3),50-59.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修订版)[M].丁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18.
- [29](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M].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29.
- [30][35](美)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9-11.
- [31]潘忠党.传播媒介与文化: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的三个模式(下)[J].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6(05):16-24.
- [32][33]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第2版)[M].包凡一,王源,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64-70.
- [34]乔治·赫伯特·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M].霍桂恒,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277.

“Nationality” and “Communication” : An Analysis on the Conceptual Level

Guo Jianbin, Su Tao

Abstract: "Nationality" and "communication" are tow concepts with a lot of interconnectedness. This paper makes a systematic review on the respective meanings of these two concept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generation for them and corresponding concepts, and specific relevance theories. It also deeply discusses about another theoretical expression of relevance between "nationality" and "communication"(Imagination of communities). Such arrangement is of great academic value in promoting the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nationality" and "communication", and thus promoting the theoretical progress.

Keywords: "Nationality";"Communication";Concept distinction;"Imagination of Communities"

Authors: Guo Jianbin,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Yunnan University. Su Tao,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 Yunn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理论意图、内涵转换与语言限制

——凯瑞“传播的仪式观”再审视

戴长征 罗金玉

摘要 “ritual”的内涵大于“仪式”，把“the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翻译成“传播的仪式观”本身使得对凯瑞相关理论的误读成为可能。就由传播和仪式的关系建构的理论意图而言，凯瑞既是在类比层面又是在同一性层面使用仪式，但更主要的是在后者。在凯瑞以及对凯瑞的解读者对 ritual 或仪式的阐述中，“神圣典礼”是其核心内涵。但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思考传播，除了“神圣的”“有宗教隐喻的”以及“交际性交流”的 ritual 之外，理应包含其中的还有指向习惯、常规和惯例的 ritual。技术赋能使得传播内容供给过剩正成为社会现实，从神圣内涵的 ritual 方向解读传播，其神圣性日渐式微或已变得世俗化。

关键词 传播的仪式观；理论意图；内涵转换；语言限制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戴长征，中原工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河南郑州 451191；罗金玉，中原工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河南郑州 451191

“传播的仪式观”是“the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的对应中译，出现在2005年《作为文化的传播》（Communication as Culture）中译本中，^①这一译法沿用至今。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首次提出“传播的仪式观”是在1975年，收录这篇论文的《作为文化的传播》英文版出版于1989年，2005年被译介到中国的正是该论文集。如凯瑞本人所说，在他写作的时代，“传播的仪式观不是美国学术研究中占优势的研究主题”^②。他的这个开创性的洞见以及在此基础上“完全理解传播需要仪式观和传递观”的观点，被认为是他对传播学研究的“独到见解和特殊贡献”^③，一定程度上成为凯瑞理论的标志。

自2008年陈力丹在《国际新闻界》上主持了一次相关笔谈后，中国传播学界有了较多的关于“传播的仪式观”的讨论。2013年和2015年，该刊刊载了刘建明关于此理论的两篇商榷文章，这两篇文章加上被商榷的樊水科、郭建斌的两篇文章，对“传播的仪式观”、仪式传播和“媒介事件”等概念进行了辨析，并从各自角度对概念被误读的原因做了说明，对准确理解凯瑞的理论具有启发意义。

显然，三位作者的分析都是以把“ritual”译成“仪式”作为前提的。但我们就是从翻译的角度发现“ritual”与“仪式”实际上存在差异，“仪式”一词无法包含“ritual”的全部内涵。由此出发，准确地说是从重新审视“传播的仪式观”

^①在这本书中，译者把“the transmission view of communication”译为“传播的传递观”。参见：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M].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修订版。

的理论意图出发,引发了我们对英语“ritual”向汉语“仪式”翻译时对应程度的思考,并因此有了几个新的发现,应有助于更进一步地全面理解相关理论。

一、理论意图: 凯瑞想在“传播”和“仪式”间建立什么关系?

凯瑞提出“传播的仪式观”,是对当时传播学界过度关注“传播的传递观”的反对和纠正,他试图把人们对传播的理解从“空间上讯息的传递”引导向“时间上对社会的维系”,从“发送信息的行为”引导向“共享信仰之表现形式”。^[3]在《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一文中,凯瑞毫不掩饰他对当时美国传播学研究者“重传递、轻仪式”“重信息、轻文化”现象的批评:“因为文化的概念在美国社会思想中那么弱且很难被人想起,所以我们还没有对传播的仪式观进行探索。”^[4]他更直言:“按仪式模式改变我们对传播的研究,其目的不仅仅是更牢地把握传播这一‘美妙’过程的精髓,还是为重塑我们的共同文化提供一条途径,借此为传播重建一个具有修复价值的传播模式。”^[5]凯瑞的研究者们对他从文化研究进入传播的上述理论意图拥有共识。而本文所谈的理论意图是就该理论的微观层面而言,具体就是:凯瑞想要在“传播”与“ritual”之间建立什么关系?换句话说,“传播的 ritual 观”到底是说“传播像 ritual”,还是“传播就是 ritual”?

上文提到的郭建斌认为,“传播的 ritual 观”是人类传播现象的一个“隐喻层面”^[6]的问题,他把人类学家格兰姆斯(Ronald L. Grimes)和维克多·特纳(Victor W. Turner)引以为其背书。其中格兰姆斯明确指出凯瑞只是在“类比(analogue)层面上”使用仪式:

他(凯瑞)对仪式概念的使用是轻描淡写的并且没有展开(light-handed and undeveloped)。因此,理论效用很小。凯瑞在使用仪式时仅把它作为类比,而且,像“传播的仪式观”这样的短语并没有说清楚仪式就其自身而言是项活动(activity),还是仅仅只是研究别的什么问题时的一种观点。^[7]

而特纳关于隐喻的论断也在他那里得到了共

鸣,所以他认为:“隐喻将熟知的和陌生的事物特点合并在一起,在这里,凯瑞也是借我们所熟悉的事物——仪式来类比人类传播活动的隐含意义。”^[8]

对此,刘建明持有不同看法,他指出“‘仪式’不仅是传播的类比,也是传播的实质”,^[9]并且从凯瑞对“传播的传递观”的态度等4个方面进行了论证。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把“仪式是传播的实质”描述为“二者具有同一性”,明确否定两者之间的“类比关系”。^[10]如本文开头所述,中国传播学界对凯瑞的解读基本上都是基于认可用“仪式”来翻译“ritual”这一前提的,所以,如上引文中的“仪式”原文都是“ritual”。毫无疑问,传播与 ritual 之间的关系是理解“传播的仪式观”的关键。

我们的观点是:在与“传播”的关系之中,凯瑞既是在类比(或隐喻)层面,也是在同一性层面使用“ritual”一词,但类比(或隐喻)是他的主要意图。也就是说,在凯瑞提出“传播的仪式观”这一概念时,他既是从功能角度认为“传播像仪式一样”,又是在属性角度认为“传播是仪式行为”,但他的主要用意在前。

凯瑞提出“传播的仪式观”,并非是在否定传统“传递观”的基础上标新立异,根本动机应是在当时的主导研究范式之外,尝试一种突破。凯瑞写道: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传播的传递观就在美国人的思想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我刚进入这一领域就发现,这一用行为和功能性的术语来表达的观点,已经讨论殆尽(exhausted),成为一种经院式的(academic)东西:重复过去的成果,证明明白无误的事实。虽然这会产生一些扎实的成果,但再继续下去,就会造成知识和社会领域的灾难性后果。^[11]

这样的关切,一方面让凯瑞为传统的“传递观”贴上了行为的、功能的标签,另一方面也为他从文化研究角度为传播研究另辟蹊径铺设了逻辑基础。

关于传播,杜威(John Dewey)曾有一个经典论断:“社会不仅因传递、传播而存在,而且简直

可以说它就存在于传递、传播之中。”^[12]这显然是个宏大视野的论断。作为杜威的追随者，凯瑞把传播与社会、文化桥接起来，即便选择了微观意义上的“仪式”作为切入点，实际上仍是在宏大视野里讨论传播：从具体的传播行为中抽离出来，在文化层面观察社会大系统之中的所有传播行为。这是凯瑞的核心关切，一种温和的文化研究取向。而 ritual^①是“最能体现文化的形式（the most embodied form）”。^[13]

关于“传播的仪式观”理论意图的问题，本文提出了一个看似融合了刘建明和郭建斌两位研究者观点的观点，是因为我们在对传播和 ritual 关系的基本面认识是一致的，而在对凯瑞解读的解读上存有不同。

凯瑞在解释“传播的仪式观”时曾说：“在此观点下，传播的原初或最高表现形式（manifestation）并不见之于知识信息的传递，而是对一个可以支配并包容（a control and container）人类行为的、有秩序、有意义的文化世界所进行的建构与维系。”^[14]可以看出，他是把传播看作远远高于信息传递行为的一种文化行为。在这个意义上，他用同样在文化的历时传播中发挥着巨大作用的仪式与传播做类比，或使用隐喻，具有合理性。

不同点出现在从凯瑞的字里行间对其是否于同一性层面使用“ritual”的认识上。郭建斌明确表示，“如果仅仅把传播理解为一种仪式，那就大大缩减了传播的外延”，“凯瑞仅仅是把传播类比为仪式，而不是说传播就是一种仪式”。^[15]而这正是刘建明与他的主要分歧点。^②如前所述，刘建明于2015年提出的论断使用的是“不仅是……，也是……”的句式，但他在2020年的专著中又对此做了修正，进一步提出“仪式是传播的本体而非类比”^[16]的观点，并正式将传播与仪式二者的关系描述为“隐含的同一性”^[17]。

我们认为，凯瑞首先是在类比层面上使用仪式，但又不仅仅停留在此，更是朝着“传播就是仪式”这个方向进了一步。他认为传播的仪式观“有着显明的宗教渊源”，把“神圣典礼”视作传播的原型，把读报行为解读成“好比参加弥撒仪式”，并且引用马林诺斯基（Bronislaw K. Malinowski）的“寒暄式交流”（phatic communion），来说明人际传播中仪式性行为的存在。^[18]当然，要说明后者，凯瑞完全可以把他“获取新的传播研究视角”^[19]的资源之一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搬出来。在被后来者尊为“互动仪式分析创始人”^③的戈夫曼眼中，“ritual 是例行公事般的、常规行为”^[20]。他从微观社会学角度阐释了“在人们面对面的社会交往中，社会互动或符号互动是一种仪式行为”^[21]。如果说戈夫曼对于互动仪式的讨论选取的案例还只是“来自保守的、循规蹈矩的个人行为”^[22]，那么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则进一步地说明了互动仪式的无处不在：性生活、不同阶级或阶层成员在不同场景的言谈举止、香烟社交等都被纳入互动仪式的应用当中。^[23]深受戈夫曼影响的凯瑞没有像柯林斯那样把社会生活中的人际互动基本上都纳入“仪式”的视野，但戈夫曼在面子以及包含问候、告别、回避等在内的遵从和举止（deference and demeanor）等方面的讨论，^[24]应是凯瑞把传播尤其是人际传播与“仪式”之间划等号的基础。

“传播—神圣典礼”“读报—弥撒仪式”和“寒暄式交流—仪式性行为”等对应关系是我们认为凯瑞试图建构传播和仪式之间同一性关系的证据。让人遗憾的是，除此之外，他确实并没有明确这种同一性关系，更未做进一步地解释。这也才给我们留出了更多讨论的空间。“传播就是仪式”意味着传播具有仪式的特征。凯瑟琳·贝尔（Catherine Bell）在《仪式的视角和维度》一书中

①在凯瑞后期的一篇文章中，ritual 是与 practices 互换的，翻译成“惯例”更为准确。参见注释8。

②在刊载于2015年11期《国际新闻界》的文章中，刘建明提出对隐喻和类比两个问题的不同看法，但在2020年出版的专著中，他又提出认同包含隐喻问题的“其中三个问题”，只对另一个问题即类比问题持不同看法。在他那里隐喻和类比或有区别。在本文中，我们把隐喻和类比归为一类与“同一性”相区别。

③被《互动仪式链》作者兰德尔·柯林斯称为“互动仪式分析创立者”的戈夫曼，“展示了仪式在日常生活中不同程度的存在，拓宽了仪式的应用”。参见 COLLINS RANDALL.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4, 8.

曾提出 ritual 的六个特征,即形式化(formalism)、传统性(traditionalism)、不变(invariance)、规则主导(rule-governance)、神圣象征体系(sacred symbolism)和表演(performance)。^[25]总起来讲就是,仪式通过对形式规范的特定要求体现对传统的延续,并以一套特有的符号系统和表演行为,对程序、时间、话语、参与者行为、象征符号、重复不变等关键内容作出规定。如果按一种松散的方式对照下来,凯瑞所说的大众传播范畴的读报和人际传播中与戈夫曼所谓“面子维护”内涵类似的“寒暄式交流”,^[26]都具有上述特征,可以被视作仪式。但是,在同为人类学家的库德里(Nick Couldry)那里,人类学意义上关于“ritual”有三种理解,即习惯行为(任意习惯或重复性的行为)、形式化行为和涉及超验价值的行为,“习惯行为”是三者之一。^[27]就是在这里,库德里实际上回应了我们一直抱有的一个疑问。

我们的疑问是:凯瑞提出从“传播的仪式观”角度来理解包含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在内的人类传播现象,并且一直试图用 ritual 内涵中的神圣性与传播相关,但日常的人际传播总有神圣性么?还是我们对 ritual 内涵的认识存在问题?这个问题中包含本文的另一个观点:就是即便如戈夫曼、柯林斯们所认为的在人与人的社会互动中充满了“仪式”(ritual),人际传播行为中的主体仍然应该是习惯或常规。

上述观点和疑问是我们在理解凯瑞理论时认为“类比是他的主要意图”的根本原因。因为,如果“ritual”内涵里不包含日常的习惯或常规,那么“传播是 ritual”的同一性表述就无法自治。

作为对人际传播与“ritual”对应关系进一步考察的意外发现,我们对“the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中“ritual”一词的内涵有了新的看法。

二、ritual 的内涵及“传播的仪式观”的内涵转换

(一) 作为神圣典礼与惯例、常规的 ritual

在有着 200 多年历史的朗文(Longman)词典中,“ritual”一词有名词和形容词两个词性,两个词性下各有两个义项,对应关联。其第一义项是:为记录重要宗教或社会场合而举行的典礼;第二

义项是:经常做的、每次都相同的事情。这和近 200 年历史的韦氏(Merriam-Webster)词典的解释基本相同。在韦氏同义词词典(Thesaurus)中,habit(习惯),practice(常规/惯例)和 routine(例行公事)被作为“ritual”的同义词收入,这可以看作是除“典礼、仪式”之外,对 ritual 第二个义项更具体的解读。也就是说,“ritual”应主要理解为具有神圣性的典礼、仪式,但还可以理解为习惯、常规或惯例。

上文所引的人类学家贝尔认为,在现代西方社会,人们会把仪式(ritual)看作是和日常惯例(daily routine action)有着内在差异(inherently different)的特别活动,与传统和组织化宗教中的神圣性(sacralities)密切相关。^[28]这根本上也还是指向“ritual”的主义项,而且还把与宗教的神圣性相关的仪式和没有神圣性指涉的日常惯例分列两边。

如前文所讨论的,在凯瑞理论中传播和“ritual”的关系上,我们认为他不仅是在类比层面使用“ritual”,还试图在同一性层面上即“传播就是‘ritual’”这个角度使用“ritual”,这一观点也是基于“凯瑞主要是在主义项上使用‘ritual’”这样的判断。

通读凯瑞提出“传播的仪式观”的“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一文,不难看出,他笔下的传播是包含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如他提到的读报和“寒暄式交流”。我们确实可以从凯瑞口中的读报以及电视普及前人们聚集观看电视的场景中,找到“传播就是仪式”的证据,在“寒暄式交流”中发现的礼仪,也可以为“传播就是仪式”提供佐证。但如上文我们提到的疑问,未被凯瑞提及的、更加大量的日常人际传播,并不具有“ritual”主义项中所包含的神圣性。

在我们看来,海量的人际传播中,包括“寒暄式交流”以及戈夫曼和柯林斯所说的众多日常人际互动中的礼仪,已经无法为“ritual”的主义项即“典礼、仪式”所包含,有意思的是,这些并不能简单作为具有神圣性指向的“仪式”来理解的互动行为,在英语中仍然可以用“ritual”表达,正如戈夫曼在“互动仪式”(interaction ritual)中所用的一样。只是,很显然,同是 ritual,“仪式”与“习惯、常规或惯例”在中文语境中却有

着明显差别。

也就是说,英语“ritual”本来就有“典礼、仪式”和“习惯、常规或惯例”两个内涵,只是在凯瑞对“传播的仪式观”的有限展开中,他对传播的宗教隐喻的强调以及因深受杜威影响而对传播“神奇与让人敬畏”^[29]之处的认同,遮蔽了日常的、普通传播行为中的文化研究价值,也让我们误以为按“仪式”来理解“ritual”是全面的。

(二)“仪式”的神圣性消解和世俗化与“传播的仪式观”的内涵转换

中国电视事业始于1958年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的试验播出,前期电视接收终端经历了黑白电视到彩色电视的过程,普及过程也经历了从城市到乡村的过程。二十世纪80年代初,黑白电视开始向农村普及。在尤其受制于可支配收入较低这个因素下,^①仅有为数不多的农村家庭拥有黑白电视机,这使得收看电视成为稀有的甚至奢侈的体验。就本文作者而言,村民对拥有电视本身的尊重、集体观看电视以及过程中通过专注、小心谨慎、请求换频道、香烟与茶水供应等所体现出的特别之处,与凯瑞所谓“读报像参加弥撒”拥有相同内核,过程中有与仪式相关联的神圣感,而这就是我们认为凯瑞理论具有“传播与ritual同一性”意图的经验性原因。

但是,很明显的是,这种“以集中收视及其过程中的敬畏之感”为背书的“仪式”视角的解读,只能存在于特定时期。随着电视的普及,主动的集中收视场景已基本不存在。与此同时,包括移动互联、智能手机以及短视频平台等在内的技术快速迭代,使得传播内容的供给过剩正成为社会现实,这构成了截然迥异于内容供给不足时代的传播生态。

凯瑞在解释“传播的仪式观”时,反复提到传播的宗教渊源(religious origins)和隐喻(metaphoric),并多次使用神圣典礼(sacred ceremony)、弥撒仪式(mass)、神秘及让人敬畏(mysterious and awe-

some)等字眼。通过宗教、传播、仪式和神圣等词语的交叉复现,他实际上建构了“传播是具有神圣性的仪式行为”这一关系。而“神圣性”与“仪式观”一样,在上文所述的农村集体收看电视的大众传播实践中,也确实能够得到呼应。

然而,就像我们从经验层面上认可特定时期大众传播可能给予人们和仪式一样的神圣性一样,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这种神圣性的消减或者说大众传播本身的世俗化。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尚未在硬件和内容供给多寡与传播行为的神圣性高低之间建立强因果关系,但从经验层面来说,随着硬件普及和内容的巨量供给,传播“仪式”的神圣性式微,是具体可感的。一定程度上,无论是大众传播还是人际传播,传播已因多发、高频和琐碎,而成为习惯、常规或惯例。

三、翻译语言的限制

the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 中的“ritual”是理解该理论的核心。所有的问题,最终都聚焦到了对“ritual”的理解以及对其中译“仪式”的理解上。

语言学领域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一般被认为包含两个理论: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 determinism)和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ty),是描述语言、文化和思维三者之间关系的重要理论。其中“语言决定论”认为:语言决定人们的思维形式;“语言相对论”认为:在不同文化中,不同语言在结构、意义和应用等方面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使用者的思维方式。根本上,这个假说(两个理论)支持“个人更多地是通过语言形成世界观”。^②当然,能否准确理解源语言并且找到贴切的目标语言与之对应,在学术理论的解读中也至关重要。

如上文所讨论的,“ritual”主要有“典礼、仪式”和“习惯、常规/惯例”两个义项,以前者为主义项,尤其常以“仪式”为其中文对译。因此,丁未老师将其译为“传播的仪式观”并且该

①根据国家统计局官网数据,1983年农村平均每人纯收入为309.8元(包括来自生产经营活动的272.9元,来自外出人口寄回、带回的现金和实物,国家发放的救济金等方面的36.9元);平均每人生活消费248.3元。检索于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ndtjgb/qgndtjgb/200203/t20020331_29996.html。一台14英寸黑白电视机的时价约为600元左右。

②洪堡特的“语言形成世界观”被认为是萨丕尔-沃尔夫“语言决定论”的最初原型。参见: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835/1997:70。

译法为绝大多数学者所沿用，是合乎情理的。

在汉语词典里，“仪式”一词的基本释义是：典礼的秩序形式。取法、仪态、测定历日的法式制度等解释只出现在古用法中。在汉语中，仪式就是仪式，习惯就是习惯，常规就是常规。

两相比较，我们的确可以很确定地得出“ritual 包含仪式”或者“ritual 的内涵大于仪式”这样的结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固然接受将“the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翻译成“传播的仪式观”，却也认为有必要对译法本身给我们理解凯瑞理论可能造成的误导加以提醒。也就是，按照“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理论来理解，汉语“传播的仪式观”限制了我们只能在“ritual”一词的主义项，即具有神圣性内涵的“典礼、仪式”的角度理解“the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而这也使得站在“传播与仪式同一性”的立场理解凯瑞时，在马林诺斯基“寒暄式交流”之外海量的人际传播行为，无法纳入这一理论视角，造成“传播的仪式观”的无法自治。我们认为，从“ritual”到“仪式”的转译，客观上会影响中文学者全面、准确地理解“ritual”一词。当然，如果坚持凯瑞只是在类比层面使用“ritual”，就没有这种困扰了。

四、余论

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凯瑞本人未对“传播”与“仪式”的关系做更进一步地讨论，甚至在后来被问及为什么没有进一步研究时，他也只是给出了一个“圆滑”的答案：“既然这个理论已得到广泛的反应和认同，就没有必要再继续研究了”。^[30]

在本文对凯瑞“传播的仪式观”的理论意图进行讨论时，我们提出了一个融合郭建斌和刘建明观点的观点：凯瑞既是在类比层面、又是在同一性层面上使用“ritual”，但更主要的是前者。之所以没有简单赞同，是因为在郭所认为的“传播”与“ritual”的关系中，少了我们认为凯瑞试图展

示的二者同一性的内涵；而在刘的最终结论里，凯瑞在“传播与 ritual 同一性”的问题上的似是而非被忽略了，而且，他把戈夫曼和柯林斯的“互动仪式”作为说明“仪式”和“传播”同一关系的佐证^[31]本身，也并非无懈可击。

凯瑞自述将韦伯、涂尔干、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尤其是杜威和芝加哥学派的戈夫曼等人视为理论源泉。其中，在赫伊津哈对中世纪末期的法国和荷兰的描述中，包括出行、劳作、访友在内的日常生活中充满了仪式性行为^[32]；而操持着“世俗社会同样普遍存在着不同仪式”观点的戈夫曼^[33]，在微观社会互动领域倾注了大量研究精力，并被他的后来者柯林斯尊为“互动仪式分析的创立者”，“戈夫曼在其整个研究生涯中倾注了大量精力在解决影响有效开展仪式的问题上”。在上文对应“仪式”的地方，英文原文都是“ritual”。在我们看来，如果没有把“ritual”和“仪式”的内涵差异弄清楚，凡是“ritual”都译成“仪式”，必然会导致误读。误读的对象不仅限于凯瑞，还包括戈夫曼、柯林斯、格兰姆斯、罗森布尔（Eric W. Rothenbuhler）等人。

凯瑞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专门以“ritual”为小标题讨论了文化、传播和 ritual 之间的关系，但这里的 ritual 不再是神圣的“仪式”，而更是普通的、常人的、于每日生活中常见的“惯例”，可以与 practices 互换：

文化是秩序借以加诸于混乱状态的惯例（practices）的总和（ensemble）。这些惯例（practices）首先构成传播，因为惯例（ritual）创造了社会关系类型，人们是进入这些关系，而不是进入到这些关系中的具体过程。……惯例（ritual）在其原初意义上，是控制混乱和对迥异的、随机的人类行为冲动加以秩序的最重要手段，尽管它不只是手段。最能体现文化的形式就在惯例（ritual）之中，……从其被具体化的意义而言，传播始于惯例（ritual）也就是传播始于对话。^①

这符合我们对凯瑞理论的理解。以文化研究

①我们把 practices 翻译成“惯例”，这样，在该引文中的下文，当“ritual”出现的时候，也译成“惯例”才符合前后语境。由此也可看出英语“ritual”与汉语“仪式”的内涵差异。原文见 MUNSON E S, WARREN K A. James Carey: A Critical Reader [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314.

为进路的凯瑞,在提出 the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 的观点时,反复提及传播的本质是人们共享目标、信仰、知识等共同理解的方式,而无论“典礼、仪式”,还是“习惯、习俗、成规、惯例”,本质上都是共享行为。也就是说,从“ritual”的内涵来看,无论在类比层面还是在同一性层面,“the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都是自洽的。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对“ritual”的“神圣典礼”内涵的强调,具有一定的误导性。他在我们上文所引的“文化论”(The culture in question)一文中又重点解读了先前有所忽视的“ritual”的“惯例”内涵。至此,凯瑞笔下的 the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 图景得以完全。

最后,还必须提到“仪式传播”。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刘建明、樊水科的相关文章,樊水科认为,用“仪式传播”置换“传播的仪式观”,是对詹姆斯·凯瑞的“误读”^[34];刘建明认同“在我国学术界的确存在概念模糊甚至相互置换的倾向”,^[35]但却并不认同樊的归因。樊文认为之所以将“仪式传播”判为误读,主要是因为作为“本土概念”的“仪式传播”是“‘传递观’意义上的概念”,难以涵盖“传播的仪式观”所表达的涵义^[36]。作为对樊文“本土说”的反驳,刘文引出罗森布尔(Eric W. Rothenbuler)以及森福特(Gunter Senft)和巴索(Ellen B. Basso),说明“在中国学者使用‘仪式传播’之前,英文已出现完全对应的词汇”,并进一步提出“我国学者、罗森布尔、森福特和巴索笔下的‘仪式传播’,恰恰与凯瑞所说的‘仪式观’意义上的传播是一致的”,而且“罗森布尔的‘仪式传播’涵盖‘传播的仪式观’”。^[37]事实上,刘建明在之前的一篇文章中,已经较深入地讨论了“仪式传播”,将其置于“仪式”视角下传播研究的流变框架之下,与传播的仪式观、媒介

事件和媒介仪式等概念共现。^[38]在刘、樊商榷前后,有不少中国学者在“传播的仪式观”的观照之下研究“仪式传播”^①,单就概念辨析而言,以刘、樊和郭建斌的讨论更为系统和深入。

本文支持从罗森布尔的两个角度理解“仪式传播”,即仪式传播包括“作为传播现象的仪式”(ritual as a communicative phenomenon)和“作为仪式现象的传播”(communication as a ritual phenomenon)^[39],也即肖鸿波等人认为的“仪式的传播”(ritual communication)和“仪式化传播”(ritualized communication)^[40]。只不过,正如本文所重点讨论的那样,从“ritual”到“仪式”的转译问题,既然可能导致对凯瑞的误读,就也可能成为准确理解罗森布尔的障碍。

准确理解“传播的仪式观”以及其它“ritual-仪式”转译下的理论,要求我们必须正视源语言“ritual”更加丰富的内涵,并避免对“仪式”做简单的字面理解。而认识到“ritual”的内涵大于“仪式”,也将有助于提升传播学学术翻译中“信”的标准。

参考文献

- [1][2][3][4][5][11][14][18][19][29] CAREY J W.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M].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15; xvii; 15; 16; 27; 18; 15; 15-17; 18; 13.
- [6][8][15] 郭建斌. 如何理解“媒介事件”和“传播的仪式观”——兼评《媒介事件》和《作为文化的传播》[J]. 国际新闻界, 2014, 36 (04): 6-19.
- [7] GRIMES R L. Rite out of Place: Ritual, Media, and the Art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8.
- [9] 刘建明. “仪式”视角下传播研究几个关键概念被误读现象研究——与郭建斌教授商榷[J]. 国际新闻界, 2015, 37 (11): 64-74.
- [10][16][17][21][22][31] 刘建明. 仪式传播思想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0: 41; 36-51; 41; 36; 48; 48.

①周鸿雁和孙健的“隐藏的维度——评詹姆斯·W.凯瑞的新闻观”(《东岳论丛》2010年第12期)一文提出从“仪式”的角度解读“新闻”;张方敏在论文“仪式传播场域论纲——对传播仪式观研究支点的探索”(《当代传播》2015年第5期)中认为凯瑞提出传播仪式观的命题,却没有提供理论支点和研究方法,因此借鉴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将场域作为仪式传播研究的理论支点;张孝翠的论文“论仪式传播与参与主体性”(《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4期)认为“仪式传播突出了信息接收者的主体性”;肖鸿波和马筱艺在“仪式传播视域下的NBA赛事电视传播”(《新闻大学》2015年第2期)一文中,从仪式传播的视角研究NBA赛事的电视传播,关注其如何通过符号的功能传播文化,详细阐述了NBA赛事传播如何利用电视这一大众媒介将受众带入一场媒介仪式并对其产生影响等等,在这些论文中,“仪式传播”基本上都等同于“传播的仪式观”。樊水科分别发表于2008和2009年的两篇文章对作为一种传播现象的乡村仪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是在“传递观”的视野下的研究,暂未和“传播的仪式观”建立联系。

- [12]DEWEY J.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M]. New York: Macmillan, 1916: 5.
- [13]MUNSON E S, WARREN K A. James Carey: A Critical Reader [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314.
- [20]LEMERT CHARLES,BRANAMAN ANN. The Goffman Reader[M]. Maiden: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1997: 114.
- [23][33]COLLINS RANDALL.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223 – 237; 20.
- [24][26]GOFFMAN ERVING. Interaction Rituals: Essays on Face-To-Face Behavior [M].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7: 5–95; 19.
- [25][28]BELL CATHERINE. Ritual: Perspectives and Dimensions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38–169; 138.
- [27]COULDRY NICK. Media Rituals: A critical approach [M].London: Routledge, 2003: 3.
- [30]PACKER JEREMY, ROBINSON CRAIG. Thinking with James Carey: Essays on Communications, Transportation, History [M]. New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2006: 200.
- [32](荷)约翰·赫伊津哈.中世纪的秋天[M].何道宽,译.广西:广西大学出版社,2008:1.
- [34][36]樊水科.从“传播的仪式观”到“仪式传播”:詹姆斯·凯瑞如何被误读[J].国际新闻界,2011,33(11):32–36+48.
- [35][37][39]刘建明.“传播的仪式观”与“仪式传播”概念再辨析:与樊水科商榷[J].国际新闻界,2013,35(04):168–173.
- [38]刘建明.“仪式”视角下的传播研究——一种强效果论及其反思[J].新闻与传播评论,2012,(01):36–44.
- [40]肖鸿波,马筱艺.“仪式传播视域下的 NBA 赛事电视传播”[J].新闻大学,2015(02):39–43.

Theoretical Intention, the Shift of Implications and Language Restriction: Rethinking of the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 by James Carey

Dai Changzheng, Luo Jinyu

Abstract: Ritual means more in English than its Chinese counterpart “yi shi”, and the rendering of “the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 into “chuan bo de yi shi guan” makes it possible to misunderstand Carey in Chinese context. In construct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communication and ritual, Carey uses ritual not only as an analogue, but also an equivalent, the former being fundamental. The English word ritual refers to both sacred ceremonies and everyday routine. The sacredness of communication seen from the communication=equals=ritual perspective is ever dwindling with over-supply of information being a social reality.

Keywords: The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 theoretical intention; the shift of implications; language restriction.

Authors: Dai Changzhe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Zhong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uo Jinyu,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Zhong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在“他”与“她”之间：网络游戏玩家的性别转换与身份展演策略研究¹⁾

黄典林 张子萌 苏际聪

摘要 近几年女性游戏玩家的发展壮大与关于这一群体的刻板印象形成了鲜明反差。性别偏见限制了女性在游戏文化中的能见度，但也激发女性玩家采取包括性别转换在内的手段来建构性别身份展演策略。由于网络空间的匿名性，电子游戏玩家出于不同动机，通过虚拟化身来建构与真实性别身份不同的虚拟性别成为一种常见现象。通过对游戏玩家的深度访谈，本研究发现，男女玩家的这种性别转换行为表现出不同的动机，而性别转换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性别刻板印象和文化秩序，为玩家，尤其是女性玩家回避或消解主流性别秩序的束缚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但这种潜力始终是有限的，既有的性别秩序和刻板印象依然主导着游戏文化空间，塑造着游戏玩家的性别认知和反应模式。

关键词 性别转换；游戏玩家；刻板印象；身份展演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黄典林，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 100024；张子萌，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媒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024；苏际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近几年来，随着女性玩家的崛起，电子游戏被男性一统天下的局面早已不复存在。Usertracker 多平台网民行为监测数据库关于 2016–2018 中国移动游戏用户性别分布情况的数据表明，近几年中国移动游戏用户男女占比整体趋于稳定，女性用户比例大体维持在 42% 左右的水平。^[1]其他国家的统计数据也显示出相似的趋势。比如，2020 年美国的女性玩家占游戏用户总数的 41%。^[2]女性玩家占据游戏市场半壁江山已经成为一个既成事实。

但女性在主流游戏文化中相对边缘的位置却没有因此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女性玩家在游戏文化中的可见性始终不足，技术型“硬核玩家”（hardcore gamer）依然被视为男性的专利。^[3]在这种情况下，在游戏中如何展示自己的性别身份始终是女性玩家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网络游戏空间的匿名性和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为玩家的性别身份建构提供了弹性。^[4]以异性形象来展示虚拟化身的性别转换（gender bending/swapping）行为成为游戏玩家身份展演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理解这种行为的动机及其后果，尤其是评估这种行为与游戏文化中的性别刻板印象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更好地把握游戏玩家群体的互动结构和行为逻辑。

基于这种考虑，本文试图在系统批判讨论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通过深度访谈，对游戏玩家性别转换行为背后的动机，尤其是现有文献中较为忽略的女性与

1) 基金项目：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CUC210B002)。

男性玩家动机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进行分析,进而探讨作为一种性别身份展演策略的性别转换现象与游戏文化中的性别刻板印象和权力秩序之间的关系。

一、文献探讨与研究问题

(一) 游戏文化中的性别刻板印象与性别关系

电子游戏向来被认为是一种由男性主导的文化,女性在被视为男性势力范围的游戏空间中经常遭遇歧视。^[5]不过,随着手机游戏的蓬勃发展,以及游戏类型的多样化和市场细分程度的加深,女性玩家在电子游戏用户中的比重也越来越高。甚至在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Multiplayer Online Battle Arena Games,简称MOBA)这类对技术性、对抗性和时间投入要求较高,故而男性玩家占据主导地位的“硬核”游戏中,女性玩家的参与度也在不断提升。

但女性玩家群体发展和壮大的客观现实,并没有改变游戏文化中依然盛行的男性主导的性别刻板印象。尽管经验研究已经证实,女性和男性玩家在游戏能力上并不存在差异,女性在学习游戏技能方面的进步速度至少和男性一样快^[6],但那种认为女性的“固有不足”导致其并不适合参与竞技类游戏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新近的一项研究认为,这种刻板印象至少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人们对游戏文化以及玩家本身特性的界定。如果把电子游戏视为一种强调对抗性的竞技文化,把技术和策略界定为游戏活动的核心特征,同时从时间、自我认同、游戏种类、游戏元素与内容、技能等指标把硬核(hardcore)用户界定为游戏玩家(gamer)的话,那么,男性玩家必然处于支配地位;另一方面与既有的性别规范和性别身份有关。由于现实性别规范对女性行为和表现方式的限制,男性玩家在现有的游戏文化中往往具有更高的行动自由度和更高的可见性。相比之下,游戏环境对女性的不友好加剧了女性可见性的降低。^[3, 7]而在对抗性较强的游戏类型中,传统网络文化固有的匿名性、有限的非语言提示等因素^[8],加之男性主导的游戏活动中盛行对抗和暴力性语言^[9],更是为女性玩家的参与设置了重重障碍,从而进一步加剧

了女性在游戏文化中的低可见性和边缘地位。

当然,除了这两方面的因素,女性玩家弱势地位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游戏文化是根植于现实社会性别秩序之中的。游戏文化,尤其是对抗性较强的游戏类型与男性身份的契合和对女性玩家的排斥,一定程度上是玩家被赋予的社会性别身份和规范导致的结果。比如,一项较早的经验研究发现,在小学五年级以前,无论男生还是女生都喜欢参与电子游戏,但当其性别角色认知完全成型之后,男孩会变得更爱打游戏,而女孩对电子游戏的兴趣和参与度则会显著降低。^[10]换言之,两性在游戏文化中的参与度、位置和由此形成的刻板印象与一般意义上的性别认知一样,都是在社会化过程中与性别身份相关的文化建构和权力规训的产物,其中最关键的是父权制,即一种维持和不断再生产男性社会控制权的文化系统,其核心是性别的二元化关系和所谓男性优越性的意识形态。根据这种意识形态,以相对极端的方式来表达攻击性、暴力和欲望被视为男性的专利。相比之下,女性的行为应当是消极的、补充性的、合作性的,任何僭越既有性别规范的行为都会被视为异端。^[11]

游戏文化中这种男性主导而女性边缘的刻板印象在许多方面产生了后果。一方面,有不少游戏作品会主动迎合这种性别偏见,从而复制和重申既有的父权制社会性别秩序。^[12]而即便是整体上性别取向不是很明显的游戏类型,也往往在人物设计方面无意识地渗透了主导的性别意识形态。^[13]另一方面,这种刻板印象对包括游戏创作者和玩家在内的所有参与主体都产生作用,不仅影响了游戏角色和风格的设计,而且塑造了游戏中的社交惯例和互动方式。^[14]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也发现,性别刻板印象往往会成为游戏玩家辨识女玩家的一种参考性指标,反应相对迟钝、操作容易失误,更多使用辅助类角色往往成为女性玩家的“固有特征”。^[15]

显然,这种刻板印象必然会鼓励女性以男性认知为中心的标准参与游戏(比如,选择辅助性的边缘角色),而系统性地压抑女性对男性主导的游戏区域(比如,竞技性较强的游戏类型)的介入。比如,Ratan等人对《英雄联盟》玩家的研究发现,由于游戏社群中不友好的环境和性别刻板

印象, 尽管女性玩家的技能积累速度与男性玩家并无本质性差异, 但这一游戏的女性玩家仍然很稀少, 或被迫承担辅助性角色。^[16]正是这种不友好的环境导致女性玩家相对于男性玩家更难在游戏中获得认同和归属感, 故而对游戏的时间投入和参与互动的意愿较低, 进而成为硬核玩家的概率也大大降低。^[17]

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到, 在女性玩家对电子网络游戏的参与度越来越高的现实与依然盛行不衰的男性主导的游戏文化和性别刻板印象之间, 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 当代游戏文化中不同性别玩家的互动方式, 尤其是在游戏产品的可供性范围内如何策略性地塑造自身的性别身份, 以及如何对异性玩家作出回应, 就成为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

(二) 僭越、性别转换与游戏中的性别展演策略

性别身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当代著名文化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 (Judith Butler) 指出, 性别身份并非一种自然存在物, 而是一种述行 (performative) 现象, 是主体按照社会规范不断进行言语和身体实践的产物。^[18]与此类似, West 和 Zimmerman 提出“做性别” (doing gender) 的说法, 认为主流社会性别身份和性别秩序的维持, 离不开个体反复通过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互动行为来不断把自己纳入“正确”的性别范畴, 从而强化和再生产社会性别的“本质属性” (essentialness) ^[19]。而人们如何进行性别展演 (gender performance), 取决于具体的互动条件和语境。^[20]

尽管男性偏见主导着游戏文化, 但在网络化互动过程中, 传播的去身体化和匿名性, 大大提高了人们在虚拟性别展演过程中僭越 (transgression) 行为发生的可能性。^[21]所谓僭越, 就是那些“打破规则或越过边界的行为”, 即对社会规范的偏离或越轨。^[22]俄罗斯文学评论家巴赫金的狂欢节理论认为, 僭越行为与对社会规范和社会身份的暂时抵制或超越有关, 而类似于狂欢节的语境则为僭越行为的发生提供了条件。^[23]比如, 有研究者认为, 某些角色扮演类游戏为玩家挑战白人异性恋男性主导的游戏文化提供了可能性。^[24]在个人真实身份相对隐匿的网络游戏空间中, 玩家的性别角色扮

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摆脱现实性别身份的束缚和压力。在这种情况下, 玩家选择异性角色进入游戏, 即性别转换行为成为一种常见现象。^[25]

就游戏而言, 除了在与社交媒体捆绑的情况下玩家可能会展露真实性别身份之外, 网络空间的相对自由度为玩家塑造自己的性别形象提供了更大的弹性空间。在大多数情况下, 处于匿名状态的玩家可以通过塑造虚拟化身 (avatar) 和选择特定行为来建构自己在游戏过程中的性别形象。虚拟化身可以是作为玩家账户标识的头像, 但更重要的是游戏过程中玩家选择的虚拟人物形象。而这些虚拟人物形象的设计往往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性别偏好。^[26]还有研究发现, 人们在选择自己的虚拟化身时, 往往会将理想的自我形象投射到这种虚拟化身上。^[27]而由于网络虚拟空间的去身体化和匿名性, 这种形象既可以与自己的真实性别身份相符合, 也可能不符合, 即出现性别转换的现象。

围绕这一现象, 现有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其背后的动机或原因, 并形成了如下两类主要观点: 1. 基于利益考量的理性决策。性别转换行为的动机是利益导向的, 以异性形象进入游戏能为玩家带来实际的利益和好处。^[28]比如, Hussain 和 Griffiths 的调查发现, 一些男性玩家为了能够得到其他男性玩家的优待, 选择使用女性形象进入游戏。^[29] Martey 等人的研究同样表明, 绝大多数情况下男性进行性别转换的目的与身份认同无关, 而是对游戏符号元素的一种策略性选择运用。^[30] 2. 基于审美或幻想需求的感性动机。玩家之所以进行性别转换, 主要原因在于认为异性游戏人物的形象符合自己的审美需求。利益并不是这种行为的主要动机, 相反, 游戏角色的颜值和美感成为玩家是否选择异性人物角色的主要决定因素。^[31]还有研究发现玩家的目的想通过这种行为来想象异性经验。^[32]但无论哪种类型的动机, 玩家进行性别转换行为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提升自己在玩游戏过程中的“愉悦感” (enjoyment)。^[33]

关于性别转换的影响或后果, 现有的一些研究认为这种行为具有潜在的积极作用。比如, 一项关于中国男性游戏玩家性别转换行为的早期研究

认为，这让玩家在一定程度上反转了以男性为中心的
二元性别体制，从而对既有的性别规范构成了挑
战。^[34]还有研究发现，性别转换行为能够提升女性
玩家的自我效能感，进而间接提高了她们对游戏的
持续参与度。^[35]但也有实证研究发现，性别转换行
为会抑制玩家之间的关系网络和社交互动，从而
对游戏活动中协作关系的建构产生负面作用。^[36]

尽管迄今为止学界围绕游戏玩家的性别转换
行为进行了许多研究，但从上述讨论亦可看出，
现有研究至少存在如下两方面的不足：第一，大
多数关于性别转换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男性玩家
选择女性人物形象的案例，而对女性玩家的性别
转换行为研究不足。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研究注
意到，避免遭遇性骚扰是部分女性玩家使用男性
人物形象参与游戏的动机之一。^[37-38]但总体而言，
目前的研究对女性使用男性人物形象进入游戏活
动的其他动机，以及男女玩家的动机相似和差异
缺乏系统考察。第二，大多数研究聚焦于动机的
探讨，而对性别转换作为一种僭越现象在玩家的
性别身份展演中的作用和影响，以及这种行为与
男性主导的游戏文化中的性别刻板印象之间的关
系，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如下研究问题：1.在
性别转换行为中，女性玩家呈现出哪些主要动机？
与男性玩家相比，有何相似之处，又有何差异？2.
游戏玩家在真实性别身份和虚拟异性性别身份之
间的转换行为，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游戏中的
性别转换现象与既有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化的游
戏文化秩序之间有何关系？

二、研究方法

为了回答上述研究问题，在研究设计上，本
研究采取了质化访谈的方法。相比于问卷调查对
玩家行为偏好表层特征的描述，访谈法更利于被
访者围绕自身的经历和感受提供更深入的描述，
故而有助于我们理解玩家对游戏行为中的实际性
别和虚拟性别角色关系的认知，及其进行性别转
换行为的动机和主观阐释。访谈主要包括两个方
面的内容：一是对被访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等个
人背景和一般游戏经历与行为偏好的了解；二是

重点围绕游戏行为中的性别身份、性别关系，尤
其是性别转换行为现象展开访谈，通过鼓励被访
者讲述自身的经历或遭遇，深入了解被访者自身
的性别观念，对异性性别身份和两性关系的认知，
游戏过程中的真实性别和虚拟性别的互动，以及
在游戏中进行性别转换的行为过程、动机、感受
及其后果等。

通过网络公告招募，我们在所有报名者中甄
选了 16 名在游戏过程中有过性别转换经历的游戏
玩家进行了 1 至 2 小时不等的半结构性深度访谈。
为了回应上述讨论中提及的对女性性别转换行为
关注不足的问题，我们在访谈对象的性别比例方
面注意了平衡，16 名访谈者中男性 7 名，女性 9
名。被访者的年龄分布为 21 至 30 岁，职业身份以
学生为主，兼有教师、职员、设计师、记者等身
份，学历涵盖本科、硕士和博士。被访者所在地
则覆盖了一、二、三线城市，南北方和东西部地
区，并有一名被访者来自香港，在地理分布上具
有一定的代表性。（表 1）

表 1 被访者基本信息

编号	性别	年龄	城市	学历	职业	常玩的游戏	访谈时长
S1	女	24 岁	北京	本科	设计师	英雄联盟、 王者荣耀	77 分钟
S2	女	22 岁	成都	硕士	学生	王者荣耀、 和平精英	60 分钟
S3	女	22 岁	北京	硕士	学生	彩虹六号、 幽灵行动	90 分钟
S4	男	29 岁	杭州	博士	学生	Dota、英雄联 盟、王者荣耀	90 分钟
S5	男	24 岁	鄂尔 多斯	本科	待业	王者荣耀、 和平精英	60 分钟
S6	女	22 岁	上海	本科	学生	反恐精英、 守望先锋	66 分钟
S7	男	23 岁	北京	本科	待业	王者荣耀	60 分钟
S8	女	21 岁	合肥	本科	职员	炉石传说、 王者荣耀	60 分钟
S9	女	23 岁	烟台	本科	教师	王者荣耀、 江南百景图	60 分钟
S10	女	24 岁	香港	硕士	记者	彩虹六号、 模拟人生	89 分钟
S11	女	29 岁	佛山	博士	学生	剑网 3、炉石传 说、守望先锋	113 分钟
S12	男	25 岁	北京	博士	学生	纪念碑谷、 美少女梦工厂	72 分钟
S13	男	30 岁	大连	博士	教师	英雄连、微软 模拟飞行	63 分钟
S14	男	30 岁	南京	博士	研究员	和平精英、三 国杀和狼人杀	60 分钟
S15	女	25 岁	上海	硕士	职员	魔兽世界、 炉石传说	60 分钟
S16	男	22 岁	北京	硕士	学生	王者荣耀	60 分钟

由于疫情原因,所有访谈均通过腾讯会议线上进行。在征得被访者同意后,对所有访谈进行了全程录屏。访谈结束后,研究者根据录屏文件将对话转录为文字,共录得218269字文字稿。在与被访对象进一步核实相关信息后,研究者在对所有访谈稿进行细读的同时,通过质化研究软件Nvivo12对访谈稿进行了分析,对被访者提及的主题线索进行了提取,并在研究团队成员反复讨论的基础上形成了主要研究结论。

三、研究发现

(一) 女性玩家与男性玩家性别转换的动机对比

正如上文指出的,现有的关于游戏玩家性别转换现象的研究,大多主要聚焦于男性玩家的性别转换动机,对女性玩家此类行为动机的考察较少,而对男女玩家进行性别转换行为动机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更是一个空白。有鉴于此,本研究首先要考察的问题是通过访谈,阐明在性别转换行为中,女性玩家表现出哪些与男性玩家不同的动机,并进而评估作为一种性别展演策略,这种做法在实现玩家动机和需求方面是否发挥了作用。

就男性玩家进行性别转换的动机来说,我们的研究结果证实了以往研究提出的几种常见的动机类型:(1) 审美动机(出于对女性虚拟人物外貌形象的喜爱而采取性别转换的做法,S5、S3、S14);(2) 对游戏人物功能的偏好(因为对游戏玩法机制设定的人物技能的偏好而选择女性虚拟人物化身,S4、S5、S12、S14);(3) 利益动机(通过性别转换塑造女性虚拟化身来获得其他玩家对自己的优待或其他利益,S4、S5、S14);以及(4) 性投射(出于对女性身份和性别经验的好奇,通过虚拟化身来进行体验或想象,S5、S14)。

但我们的分析也发现了两个此前的研究中没有提及的男性玩家性别转换的动机类型:(5) 通过性别转换塑造的虚拟女性化身来激发游戏中局内互动行为,并挑战游戏文化中的性别刻板印象。比如,《王者荣耀》玩家S7以女性虚拟化身进入游戏,激发其他男性玩家基于固有刻板印象的性别化互动反应,并通过技术性“碾压”形成一种反讽效应和“快感”:

在对局里面我会开个小号,然后把名字起得非常女性化,让别人以为我是女的……(目的是)去引发局内的对话。如果是都是男生的话,可能对话就非常无趣,都是脏字飞,或者根本就不说话……但是如果别人误以为你是女生的话,会引发聊天,然后来给我打辅助。然后我就可能会选一个比较强的英雄,碾压一下对面,这样就会很爽。(S7)

(收到搭讪后)我一般不会回复,然后如果他们就一直这样说的话,我可能会用一个比较女性化的方式去回复他们,可能在后边加上一个语气词“呢”、“啦”这样子,加上这种语气词,然后大家就感觉应该是个女生,对,然后在打的时候选一个特别厉害的(角色)就开始虐他们。一般也会选女性英雄,不会去选什么程咬金这种男性化的比较猛汉的,一看就不成一体系的(英雄)。(S7)

另一个既有研究较少涉及的动机是(6)与女性交往的需求。这种交往动机并不必然是以发展恋爱或亲密关系为目的。尽管本研究所访谈的男性玩家并没有提及这种动机,但通过女性玩家S15所描述的亲身经历,我们可以看到少数男性玩家的性别转换行为在特定情况下具有出明确的与异性交往的动机,而且在实际互动过程中也的确导向了类似于虚拟“闺蜜”的较为紧密的网络人际关系:

(我)经历过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男生,他用女生的变声器,瞒过了所有人……然后我跟他做“闺蜜”做了一年多……我们还约定了老了以后一起去住别墅,一起做老伴的那种。……然后直到有一次因为一个事情吵架了,他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理我。但我有他家的地址和电话,我给他家寄过零食。我打电话打过去是他妈妈接的,然后她说:“我儿子就是一一直很沉迷网络”……我当时都惊呆了。(S15)

关于女性玩家进行性别转换的动机,我们的研究结果证实了以往研究提出的(1)避免被男性玩家骚扰的目的。玩家S1、S3明确提到自己以男性化或中性的虚拟形象出现在游戏中,目的就是要避免来自男性玩家的骚扰和干扰,从而专注于

游戏本身：

我之以前玩《楚留香》的时候……你选一个小姐姐的角色，然后总会有其他的男生过来问你：“小姐姐，组情缘吗？”然后当你选择一个男性角色的时候就无人问津。……我觉得这样反过来倒是挺好的。……有时候只想平静地玩一个游戏，但是总有人过来问你，有点烦躁。（S1）

我如果让他们知道我是女生，他们首先会在聊天频道里面不停地说话，说一些和游戏无关的话，然后还会不停地有加好友的弹窗跳出来……我的游戏体验肯定会打折扣。（S3）

但就我们所获得的访谈资料来看，女性玩家进行性别转换的目的远不只是为了避免男性玩家的骚扰，不同玩家基于不同的个性、偏好、经历、游戏类型形成了不同的动机。相比于男性玩家的动机，女性玩家在性别转换行为中也呈现出某些相似的动机，比如，（2）审美动机，主要表现为对游戏人物外貌形象的喜爱（S1、S2、S10、S15）和（3）对游戏人物功能或风格的偏好（S1、S2、S3、S6、S9）。

但女性玩家也表现出一些与男性玩家截然不同的动机：（4）避免男性主导的游戏文化中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和歧视（S2、S3、S9、S15）。在这种情况下，女性玩家的主要动机是通过建构虚拟的男性身份，来回避主导性别规范中男性玩家对女性玩家那种高度刻板印象化的回应方式。比如，玩家S3认为男性玩家在游戏行为中表现出来的对女性玩家的保护欲实际上反映的是男性的一种优越感和将女性低能化的一种性别偏见，而性别转换的目的就是要避免这种偏见对自己的影响：

我不想被因为是女性而被特殊化。不管你是觉得应该允许我差一点，还是对我要求低一点，还是变成一个撩妹的舞台，我觉得都不好……我是来玩这个游戏的，我不是来听你在这里说什么小妹妹我保护你这种话……现实生活中他都不敢说出这样的话……（但在）游戏世界里面他会这么说。……我不需要这样的保护，也不需要这样（被）特别对待……其实是因为你内心里面觉得他们是低人一等的，他们是弱势的那一方，你有这种俯视的感觉，你（才）要去照顾他们的。（S3）

玩家S9表达了同样的意图：

为了避免打游戏的时候遭到性别歧视，我的资料，我的性别都放了男性。……我就是怕……（如果）你是女性的话，可能大部分情况下很多……男的看到你，他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你弱，第二个感觉可能就是游戏里面玩的女生又少，他可能就想跟你聊天什么的。（S9）

此外，（5）标新立异或寻求反差感（S2、S15）也是部分女性玩家进行性别转换的动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反差往往构成对既有性别刻板印象一种解构。比如，玩家S15在性别转换的过程中通过虚拟性别化身和真实性别的不对称性在对男性玩家形成一种冲击效应：

我们其实会跟陌生人打游戏，然后中间我就一直打字交流，都没有开过麦。然后打完之后，大家会觉得说你玩的挺好的……然后我会开麦说一句：“好的，下次见”，然后我就潇洒地离开，他们就会留下一阵惊呼，说：“原来是妹子”，然后我就很享受这种感觉，就是打脸的感觉。（S15）

当然，由于访谈资料的局限性，上述讨论并没有穷尽所有可能的动机。但通过与既往经验研究结论相比较可知，我们的研究发现应已囊括了游戏玩家性别转换行为的主要动机类型。更重要的是，我们对男女玩家的动机类型进行了对比。如表2所示，男女玩家在游戏虚拟现实空间中进行性别转换的动机既有共性，也有很大的差异性。无论是男性玩家，还是女性玩家，都具有基于对游戏人物视觉形象或内在功能特征的偏好而出现的性别转换行为。在其他方面，女性动机中没有发现男性动机中存在的利益导向动机和对异性的想象或交往动机类型。

表2 男女游戏玩家性别转换主要动机之比较

玩家性别	性别转换的动机		
男性	对游戏人物外貌的喜爱	对游戏人物功能的偏好	在游戏中获得优待或其他利益
			对异性的想象
			与异性交往的需求
			挑战性刻板印象
女性			避免被异性骚扰
			回避刻板印象和歧视
			标新立异或寻求反差感

总体而言，男性玩家将性别转换作为一种积

极争取理性或感性收益的策略,相比之下,女性玩家采取性别转换策略的动机更具有被动回避的色彩。即便就男女玩家中都存在的回应主流性别刻板印象的动机来说,男性玩家是通过策略性反转来“玩弄”针对女性的性别偏见。相比之下,女性玩家并不是直接面对和挑战这种偏见,而是通过男性虚拟化身提供的暂时性保护作用来回避游戏空间中存在的关于女性的种种偏见。即便是通过展露真实性别从而形成反差感的方式挑战既有性别偏见,女性玩家也往往是先依托男性性别身份的保护进入游戏空间,再进行策略性挑战。考虑到男女游戏玩家的不同性别身份及其在游戏文化中的位置,这种性别转换动机的差异实际上是不同性别群体的社会处境的反映。换言之,性别转换行为对男性玩家来说,是一个既有的特权位置基础上的增量行为,而对女性玩家而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保护性策略。

(二) 游戏玩家性别转换行为与性别刻板印象的关系

游戏玩家出于以上动机把性别转换作为在网络空间性别身份展演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纳入日常游戏行为中。这种转换可以是连贯的、长期性的,也可以是断续的、暂时的,可以是整体的,也可以是局部的。而一旦付诸实践,这种行为能够为玩家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则取决于复杂的多重因素。其中最关键的依然是游戏实践所处的性别规范,尤其是既有关于性别和性别关系的预设。比如,有男性玩家发现以女性形象进入游戏后,自己不仅没有得到好处,反而受到了歧视:

优待倒没有,歧视倒是挺多的。比如我的名字叫“四头”,他就会说:“四头,你这个女生你就打辅助就好了,把中路让给我,你不要越位了,你不行的。”可能在局里游戏的话,我是个女性名字,然后我就可能把他杀了,我又回去跟他说一句,他就会说:“你小女孩子的不要这么说话,不文雅不淑女”,这个样子的,反正挺无语的。(S7)

关于性别转换行为对玩家游戏实践的影响,我们的研究验证了既往经验研究中所发现的一个结论,即性别转换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游戏

玩家之间进行直接互动的意愿水平。^[9]但我们的研究发现,相比之下,性别转换对互动水平的影响在女性玩家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在所有被访者中,没有男性玩家报告自己因为性别转换而降低与其他玩家互动和建立合作关系的意愿。相反,有4名女性玩家(S3、S9、S10、S11)报告为了掩盖或弱化自己的真实性别身份,她们不得不把在线互动交流,尤其是可能透露其真实性别身份的沟通行为最小化。

显然,这里所涉及的最主要的互动方式是玩家之间基于真实性别身份的披露而展开的对话活动。随着网络游戏社交属性的不断强化,游戏玩家的真实身份和虚拟化身之间的边界正日益变得具有流动性。这意味着在真实性别身份和虚拟的异性性别身份之间进行转换和移动,成为游戏文化中的常见现象。进行性别转换的游戏玩家同时也可能在特定的语境下披露自身的真实性别身份,从而带来一系列复杂的结果。换言之,游戏文化中的大部分性别转换现象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既可以被强化,但也会在特定的情况下出现回转现象,即从虚拟的反向性别退回到真实性别。这一点是以往的研究所忽略的。

在不披露真实性别身份的情况下,性别转换对女性玩家来说具有一定的保护和赋能作用。比如,女性玩家S1表示,以男性形象出现在游戏中增加了自己的自信心:

如果你玩女性角色多了,被人烦的也稍微多了一点。……我觉得选男性角色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我觉得我可以。……就是那种可以自由畅游在游戏世界的感觉,可能心情会和选女性角色稍微有点差别。(S1)

但我们的研究发现,女性玩家一旦在展演虚拟异性性别的同时,披露自己的真实性别身份,会引起其他玩家,尤其是男性玩家的两种较为分化的反应。一方面,以虚拟异性形象进入游戏的女性玩家所披露的真实身份会遭遇怀疑和否定。在这种情况下,玩家之前设定的虚拟异性身份会被进一步强化,而不是削弱。而玩家新近披露的真实性别身份则被否定。比如,女性玩家S1和S3都报告了类似的遭遇:

玩一个小乔，然后对面玩一个大乔，我拿了对面大乔第一滴血，然后对面的人突然跟我说你为什么欺负大乔，大乔可是你的姐姐。……我就跟他说一句：“我可是萌妹子。”对方居然回我说：“你顶多是个人妖。”……他们觉得（我）并不是（女性），然后我这么一说，他们更确定我不是（女性）了。（S1）

我有一次……开麦了之后有一个人就不停地喷我，他说你凭什么用变声器？对，他喷我是人妖……然后他说：我不相信有女生会玩这个游戏，这个不适合女生，你怎么会来玩这个游戏，你一定是个男生假扮的……（S3）

在这里，两位女性玩家披露的真实性别身份都遭遇了强烈的否定，并被其他玩家认定为是男性假扮的女性。这种否定无疑是男性主导的游戏文化中长期存在的关于男女性别玩家游戏能力差异的刻板印象的结果。

另一方面，以虚拟异性形象进入游戏的女性玩家对自己的真实性别身份的披露也可能会引发男性玩家的“包容性”反应。玩家 S2 的经历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你开麦和不开麦，别人对你（是不一样的）。你如果开麦，然后他知道你是个女生，他就会更加热情，然后会跟你对话。……如果你不开麦的话，你跟陌生人一起 4 排，他们基本上是各玩各的，然后也不会救你。但是如果是开麦的话，他就会寒暄，然后说去哪儿，会说哪里有敌人，然后会来扶你，然后甚至扶完你之后，他还会担心你身上没有药，然后扔下一个药包给你。（S2）

无论是否否定女性玩家的真实性别身份还是在接受这种身份的基础上采取“保护者”姿态，实际上都是调用了既有的关于女性群体的刻板印象和偏见，在本质上都认为女性玩家不可能具备和男性玩家同等的竞技能力。无疑，在这里既有的性别刻板印象发挥了框架性的作用，塑造了不同性别玩家之间的特定互动反应方式。这意味着作为游戏玩家性别身份展演策略整体中的一个组成要素，性别转换策略所发挥的作用是矛盾的。一方面，在特定的条件下，它为玩家体验另类的性别身份和探索不同的互动经验提供了机会。尤其

对女性玩家来说，性别转换是一种提供自我保护的策略性手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存在于游戏文化中的各种对女性不利的偏见和压力。另一方面，玩家可以为了维系这种“收益”而将自身的网络身份维持在虚拟的边界之内，但也可以选择打破这种边界。性别转换行为所提供的保护总体上来说消极的、有限的和不稳定的，一旦在游戏互动过程中突破了虚拟现实的边界而进入真实身份的领域，就会立刻被现实社会性别秩序所吞噬，甚至引发矛盾和冲突。

这表明，尽管电子游戏等虚拟现实空间为性别转换等另类性别身份展演提供了可能性，而性别转换行为的确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玩家，特别是女性玩家提供了赋能的潜力，但这种潜力始终是有限的、局部的、临时的。既有性别秩序和刻板印象依然主导着游戏文化空间，塑造着游戏玩家的性别认知和反应模式。性别转换行为的悖论在于，无论是男性玩家对去男性化性别空间和经验的探索，还是女性借助男性身份的外壳来构筑自我保护的空间，本质上都是以承认男性和女性之间等级化的二元性别秩序为前提的。在反思自己的性别观念预设时，有女性玩家已经意识到自己在反抗主导性别意识形态的同时也把这种观念内化为自身观念的一部分，从而构成了女性“歧视”女性的悖论景观：

我潜意识里面应该也是有性别歧视的，因为我对男生玩家要求比较高，我觉得男生应该更就玩得更好一点，我对他们的要求可能就在八九十分。然后对女生玩家可能没有什么要求……可能会给她 50 分的要求，我潜意识里面其实也是这么觉得的。感觉女生她可能游戏技能还是不如男生，这是我的问题。（S15）

四、结论

本文围绕游戏玩家的性别转换行为，通过深度访谈的经验性研究，对玩家性别转换行为背后的动机进行了拓展分析，尤其是对女性玩家和男性玩家动机的相似性和差异进行了对比研究。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分析了性别转换对游戏玩家性别身份展演的影响，尤其分析了在真实身份

介入的情况下,性别转换行为所可能带来的矛盾性后果。研究发现,男性玩家和女性玩家的性别转换行为动机既有相似性,也有很大的不同。男性玩家倾向于将性别转换作为一种积极争取理性或感性收益的策略,而相比之下,女性玩家采取性别转换策略的动机更具有被动回避的色彩。对性别转换现象影响的研究则表明,这一行为对游戏玩家的互动方式会产生复杂的甚至是矛盾的结果。它既可能带来赋能效应,也可能抑制玩家基于真实身份的互动行为和人际关系网络的建构。而一旦这种互动突破了虚拟身份边界,进入真实身份的范畴,就会带来高度分化的反应。但无论如何变化,游戏玩家的性别转换行为及其对游戏互动的的作用都没有脱离主导性别意识形态框架的限制。

在这个过程中,行为转换行为与性别刻板印象之间表现出复杂的相互构成关系:一方面,无论是再生产还是回避或挑战既有的性别刻板印象,性别转换为行为的发生都是以既有的性别身份秩序为参照系和出发点的。刻板印象在玩家进行性别身份展演行为模式和策略选择的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的动因功能。尽管网络传播的虚拟性提供了身份展演的弹性,但这种弹性并没有也不可能超越既有性别框架的边界。另一方面,尽管没有突破整体的性别秩序,但这种行为本身并不是毫无意义的。作为一种文化僭越现象,性别转换,尤其是当这种转换在虚拟性别身份与真实身份的交互过程中产生的震惊和反讽效应,揭示了既有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气质观念内在逻辑的非本质性,从而将一种被自然化中立化了的身份意识形态重新历史化,并为游戏文化注入更多的批判性和自反性。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副教授周逵、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董晨宇、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刘晨宇、杨润苗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 [1]2019年中国移动游戏行业研究报告 [EB/OL].[2021-06-07]. <http://report.iresearch.cn/wx/report.aspx?id=3405>.
- [2]Distribution of computer and video gam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2006 to 2020, by gender [EB/OL].[2021-06-07].<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32383/gender-split-of-us-computer-and-video-gamers/>.
- [3][7]Paaßen B, Morgenroth T, Stratemeyer M. What is a True Gamer? The Male Gamer Stereotype and the Marginalization of Women in Video Game Culture [J]. Sex Roles, 2017, 76(7): 421 - 435.
- [4]Dickel M H. Bent gender: Virtual disruptions of gender and sexual identity [J]. Electronic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95, 5(4): 95 - 117.
- [5]Delamere F M, Shaw S M. "They see it as a guy's game": The politics of gender in digital games [J]. Leisure/Loisir, 2008, 32(2): 279 - 302.
- [6]Shen C, Ratan R, Cai Y D, Leavitt A. Do Men Advance Faster Than Women? Debunking the Gender Performance Gap in Two Massively Multiplayer Online Games[J].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2016, 21(4): 312 - 329.
- [8]Lea M, Spears R.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de-individuation and group decision-making[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Machine Studies, 1991, 34(2): 283 - 301.
- [9]Tang W Y, Fox J. Wiley Online Library, 2016. Men's harassment behavior in online video games: Personality traits and game factors[J]. Aggressive behavior, 2016, 42(6): 513 - 521.
- [10]Chappell K K, Taylor C S. Evidence for the Reliability and Factorial Validity of the Computer Game Attitude Scale [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Computing Research, 1997, 17(1): 67 - 77.
- [11]Burt M R. Victimology Inc., 1983. Justifying personal violence: A comparison of rapist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J]. Victimology, 1983, 8(3 - 4): 131 - 150.
- [12]Fantone L. Female players from margin to centre: female sociality, digital consumer citizenship and reterritorialisations [J]. Digital Creativity, 2009, 20(4): 211 - 224.
- [13]Gao G, Min A, Shih P C. Gendered design bias: gender differences of in-game character choice and playing style in league of legends [C]//Proceedings of the 29th Australian Conference on Computer-Human Interaction. 2017, 307 - 317.
- [14]Chappetta K C, Barth J M. Gaming roles versus gender roles in online gameplay [J].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20: 1 - 22.
- [15]曹书乐, 董鼎. 傲慢与偏见——对女游戏玩家性别刻板印象的研究[J]. 艺术评论, 2018(11): 38 - 49.
- [16]Ratan R A, Taylor N, Hogan J, Kennedy T, Williams D. Stand by Your Man: An Examination of Gender Disparity in League of Legends [J]. Games and Culture, 2015, 10(5): 438 - 462.
- [17]Lucas K, Sherry J L. Sex Differences in Video Game Play: A Communication-Based Explanation[J].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04, 31(5): 499 - 523.
- [18]Butler J.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M].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 [19]West C, Zimmerman D H. Doing gender [J]. Gender & society, 1987, 1(2): 125 - 151.

- [20]Figueira J. Gender Performance [G]//The Wiley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Gender and Sexuality Studies. ,2016: 1 - 2.
- [21]Gersch B. Gender at the crossroads: The Internet as cultural text[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1998, 22(3): 306 - 321.
- [22][23]Jenks C. Transgression[M]. London: Routledge. 2003.
- [24]Nielsen D. Identity performance in roleplaying games[J]. Computers and Composition, 2015, 38: 45 - 56.
- [25]DiGiuseppe N, Nardi B. Real genders choose fantasy characters: Class choice in world of warcraft[J]. First Monday, 2007.
- [26]吴斯. 性别僭越与年龄迟滞——《王者荣耀》中的身体拟像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 2019(01): 57 - 63.
- [27]Sung Y, Moon J, Lin J-S. Actual self vs. avatar self: The effect of online social situation on self-expression [J]. Journal of Virtual Worlds Research, 2011, 4(1).
- [28]Song H, Jung J.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Gender Swapping in Online Games [J].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2015, 20(4): 434 - 449.
- [29]Hussain Z, Griffiths M D. Gender Swapping and Socializing in Cyberspace: An Exploratory Study[J].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 2008, 11(1): 47 - 53.
- [30]Martey R M, Stromer-Galley J, Banks J, Wu J, Consalvo M. The strategic female: gender-switching and player behavior in online games [J].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4, 17(3): 286 - 300.
- [31][37]李紫茵,王嵩音.線上遊戲性別轉換行為分析[J]. 傳播與社會學刊, 2011(18): 45 - 78.
- [32]Carr D. Playing with Lara [C]// Screenplay: Cinema/Videogames/Interfaces. London: Wallflower Press. 2002.
- [33][38]Chou Y-J, Lo S-K, Teng C-I. Reasons for Avatar Gender Swapping by Online Game Players: A Qualitative Interview-Based Stud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Business Research, 2014, 10(4): 1 - 16.
- [34]Wu W, Fore S, Wang X, Ho P S Y. Beyond virtual carnival and masquerade: In-game marriage on the Chinese internet[J]. Games and Culture, 2007, 2(1): 59 - 89.
- [35]Hao L, Lv Q, Zhang X, Jiang Q, Liu S, Ping L. Conquering Gender Stereotype Threat in “Digit Sports”: Effects of Gender Swapping on Female Players’ Continuous Participation Intention in ESports[EB/OL]. Scientific Programming, 2020, 2020: e8818588 (2020-07-06) [2020-09-27]. doi: <https://doi.org/10.1155/2020/8818588>.
- [36][39]Tseng F-C, Chang C-T, Lee H-C, Teng C-I. How does gender swapping impact online gamer loyalty?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dependence theory [J]. Online Information Review, 2018, 42(5): 647 - 662.

Between “He” and “She” :

A Study of Gender Bending and Identity Performance Strategies of Online Game Players

Huang Dianlin , Zhang Zimeng , Su Jicong

Abstract: The growth of female gamers in recent years contrasts with the stereotypes about this group. Gender bias limits the visibility of women in gaming culture, but it also inspires female gamers to adopt gender identity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including gender bending or swapping. Due to the anonymity of cyberspace, it is common for video game players to construct virtual gender identities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their real gender through avatars for different motives.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gamers, this study finds that male and female gamers show different motivations for this gender bending behaviour, and that it breaks the existing gender stereotypes and cultural order to a certain extent, providing potential for gamers, especially female gamers, to evade or dissolve the constraints of the mainstream gender order. However, this potential is always limited, as the established gender order and stereotypes still dominate the cultural space of gaming and shape the gender perceptions and response patterns of gamers.

Keywords: gender bending; gamers; stereotypes; identity performance

Authors: Huang Dianlin, 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Zhang Zimeng , Faculty of International Media,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Su Jico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故乡何处是：短视频平台上的农民工社群建构与乡土记忆¹⁾

——对抖音“福建村”的考察

于晶 谢泽杭

摘要 聚焦农民工短视频社群建构与乡土记忆关系，探讨新媒介如何影响记忆生成与再现。以抖音“福建村”为个案，将其作为“网络中的田野”进行民族志考察，访谈代表性成员，并走进他们的线下生活，探寻短视频对“福建村”农民工乡土记忆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因技术赋能下的情感互惠，抖音“福建村”以在线社群方式被建构。抖音“福建村”借用“地方”，利用地方资源再生产创作短视频作品，使用仪式化直播进行展演，开展乡土记忆实践，依托地缘、血缘形成文化认同与共通交流内容，成员在互动与分享中让共有的乡土记忆得以生成。在城市文化、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博弈中，乡土记忆趋向融合与延续，并通过个体行为和互动行为再现。研究认为，新媒介的出现使得记忆场域不断拓宽，短视频平台独特的算法推送机制为拥有共同乡土记忆的网络社群形成助力，生成了介于绝对领导与人人平等间的记忆场域。相比于媒介产生的明显界线，记忆本身也具有排他性，对拥有共同记忆社群外的人设限，即使外人有类似经历也难以走进社群开展记忆活动。此外，记忆并非被动的，在媒介与人的双向交互下，它愈发具有反作用于现实活动的力量。同时，立足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文章在记忆研究主体性回归和对记忆理论中国化做出一定尝试。

关键词 农民工；短视频；社群建构；乡土记忆；媒介记忆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于晶，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上海 200241；谢泽杭，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硕士研究生，上海 200241

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社交媒介也日趋多元。近年来，方兴未艾的短视频平台越来越受到大众追捧，它以直播、发布短视频作品等方式建构在场与围观，形成共时在线互动，重新形塑了人类社会交往方式。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短视频用户数已突破8.73亿，占全部网民的85.5%，短视频已成为当下极具影响力的社交媒介之一。^[1]

农民工群体是构筑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乡土性”与城市意识交融是这一群体的重要特点。农民工从农村到城市打工，是一个追求“现代性”并摆脱“乡土性”的过程^[2]，但“乡土性”仍作为一种文化和记忆交织于这一过程中。技术与社会发展使农民工群体与信息通信技术的“接合”发生转变^[3]，手机对于农民工来说已不仅是打电话和发短信的工具，而逐渐成为日常娱乐消费、维系社会

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舆情生态治理下政务新媒体运营策略与传播效果研究——以省级行政机构为例”(17YJA860022)。

资本的社交媒介,甚至可以通过这一渠道追忆乡土。媒介作为主导人类记忆的平台和核心^[4],在网络时代对承载人类乡土记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人人都是拍客”的当下,短小精悍、生动有趣的短视频越来越受欢迎,并因视频呈现丰富性、现场感强,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农民工群体追忆乡土的需求。^[5]

抖音“福建村”类似于线上“老乡会”,是由在沪福建农民工自发生成的短视频平台网络社群,依托地缘、血缘形成文化认同,以共享的乡土记忆为核心开展互动交流。它有别于传统意义上固定的网络社群,而是由一位抖音名为“虎纠依哥”^①的农民工主播定期在个人账号上发布与在沪农民工和福州相关的作品,并在每晚9点至11点进行抖音直播,通过老乡间口口相传,吸引近五万粉丝。这一社群不以盈利为目的,大家相聚于短视频作品评论区和直播间,即使素未谋面也能亲切交流,通过短视频作品与仪式化直播展演,将承载乡土记忆的地方化的符号与实在物在特定的场景下呈现,与观看者共同开展乡土记忆实践。因参与互动的人多为在沪福州农民工,形成类似于线上村庄的集合体,故农民工们亲切地将这一网络社群命名为“福建村”。

有学者呼吁,农民工研究没必要过于关注宏观结构性、制度性因素的制约作用,而忽视农民工自身主观能动性及其作为理性主体创造自己生活世界和建构意义的能力。^[6]反观已有记忆研究,也多是从媒介对记忆的社会性建构视角出发,探讨在大众媒介的传播路径下,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是如何生成的,忽略了个体能动性,造成“主体的缺失”。^[7-8]此外,由于记忆理论是源自西方的“舶来品”,其理论观点是在西方社会历史框架下生成的,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中国农民工的记忆内容中还夹杂着信俗、人情、面子等多方面张力,不同地区乡土记忆也存在差异。因此,本研究着重关照农民工自组织网络社群抖音“福建村”,从农民工群体主体性出发,探究其通过新兴媒介追忆乡土的能动过程。立足中国特殊

的社会结构,从乡土记忆的生成与再现入手,挖掘农民工短视频平台网络社群独特性,探索其生成机制与运作逻辑,对记忆理论中国化做出一定尝试。

一、农民工的短视频使用与乡土记忆

进入21世纪,城乡二元结构日益松动,中国社会总体结构已经开始从二元结构转向三元结构,非工非农“第三种户籍”的农民工群体则是形成三元社会结构的重要力量。^[9]农民工在城市中是“无根性居住”群体,想融入城市文化,但“城市梦”与现实残酷碰撞,使得绝大多数农民工只能成为城市“过客”,由此产生孤独感和对乡土的追忆。城市文化是能够激发人们思想感情活动的城市形态和特征^[10],乡土记忆则代表人们的故乡难离情感,可以通过“内在感情——个体行为——集体行为”三个维度表达,生成并再现记忆。农民工利用短视频平台建构社群,开展记忆活动,在追寻城市文化“现代性”的同时,寻求个人与集体乡土记忆。

(一) 城市文化与乡土记忆

自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之后,“乡土性”成为描述中国特征的一个重要词语。随着中国城镇化不断推进,“乡土性”又逐渐成为描述中国农村社会的形容词。^[11]“乡土性”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的“土”,它还是文化与记忆。^[12]但有学者指出,这种文化与记忆本身与城市文化存在抵牾,乡土记忆会导致农民工城市认同陷入困境^[13],也有学者指出,当今中国几乎所有的社会难题都与城乡分野社会关系密切相关。城乡分野产生记忆鸿沟,虽然农村和城市一样,也有历史、文化记忆,但由于农村记忆的媒介、方式和手段没有城市文化先进、科学和多态多样,加上可以采用多符号、多媒体、多形式记忆的有文化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优秀人群纷纷离去,齐聚城市,导致农村故乡记忆逐渐退化,故乡成为只是偶尔追溯的对象和场景。城市文化凭借技术等优势占领各种媒介,消融和解构着人们乡土记忆。^[14-15]但还有一派观点

①“虎纠依哥”为福州方言“福州哥哥”的意思。出于研究伦理的隐私考虑,在征求本人意见后,将其原抖音名缩减转化为“虎纠依哥”。

认为,农民工有着“离土不离乡”的故乡情感,乡土记忆与城市文化也并非“势不两立”,而是可以相互融合。那么,媒介使用对农民工的作用可能并非解构,而是重塑(reshape),乡土记忆融入在地城市记忆新蕴含。^[16-17]

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18]在集体记忆讨论中指出,个体记忆依赖于集体而存在,集体记忆由个体记忆组成,是共享的个体记忆。那么,对于农民工乡土记忆而言,也必然存在个体乡土记忆和集体乡土记忆两个指向。个体乡土记忆是农民工个人亲自看到、亲身感受过的乡土,而集体乡土记忆在本研究中则是由短视频这一媒介所建构出来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乡土。农民工正是在城市文化、个体乡土记忆、集体乡土记忆“漂泊”中,寻求“此心安处”。

(二)“无根性居住”的农民工群体与城市适应需求

2020年5月1日正式实施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一次从法律上界定“农民工”概念:“农民工是指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务的农村居民。”^[19]也就是说,农民工是户籍地仍在乡村,进入城区从事非农业产业劳动,常住地在城区,以非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的劳动者,除了工地工人外,还包括低端制造业技术工人,及理发师、餐厅服务员、保洁员等低端服务业工作人员。

国内农民工研究形成了一种共识:农民工在从农民向市民过渡中,并非完全“同化”。农民工无法真正融入城市,仍然游离在城市边缘,可归结为“无根性居住”。^[20-22]“无根性居住”呈现出四个方面特点:在物理层面,农民工居住环境较为恶劣;在社会关系层面,无法以城市地缘为基础积累信任、互惠、互动等社会资本;在社会权利层面,缺乏公共政策保护;在社会认同层面,农民工进入城市地界范围却不能进入其社会结构,身份认同难以有效构建,城市归属感也难以获得。^[23]在这种情况下,适应性(adaptation)便成为农民工继续留在城市的重要基石。

近年来,流动人口城市适应问题愈发受到西方经典城市社会学和都市人类学学者关注,Sampson等^[24]考察在港口工作的跨国移民工人,发现工人们

会通过宗教汇集在一起,从宗教信仰中获得精神慰藉和情感支持。Palmer^[25]认为,由于存在刻板印象,香港的印尼家庭佣工并不十分受待见,雇主与印尼佣工仅停留在雇佣关系上,而印尼佣工们则会通过群聚(Cluster)实现情感交流。Baig R B^[26]则发现,由于缺乏公民身份,尼泊尔移民劳工经常被排除在政府公共政策外,这种排斥将移民劳工置于社会和政治权力结构最底层。随着工会建立,移民劳工之间日常互动和身份意识得到加强。从中可以发现,流动人口城市适应,很大程度上源于同类人集聚,通过在“集体”中交流互动,实现情感聚合。罗雅琳^[27]指出,流动人口城市适应不仅仅是脱离乡土、融入城市,而是将固有乡土身份与当下城市打工者身份做好合并,形成新的认同。对于在沪福建农民工来说,他们融合乡土与城市双重身份,通过短视频平台形成在线集聚,共同构筑乡土记忆,从而满足情感需要,达到城市适应目的。也就是说,通过网络社群开展追忆乡土、分享共同记忆是在沪福建农民工适应城市的重要手段。

(三)作为记忆场域的网络社群

随着技术不断发展,网络社群成为农民工适应城市、开展乡土记忆活动的新场域。农民工网络社群一般可分为政府主导与自组织两种形式。政府主导型网络社群以农民工网站、论坛为主要形态,是农民工向政府反馈民意的重要渠道,但因存在信息更新机制薄弱、互动效果差、审核机制严等原因,参与人数极少,近乎处于瘫痪状态。^[28]而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自组织网络社群近年来成为农民工乡土记忆活动的主要平台。微博网络社群以“超话”社区形式,围绕地域话题将在异乡的农民工黏合起来,发布信息、评论互动。但Svensson^[29]对中国新浪微博的研究指出,名人和意见领袖运用其社会和文化资本获得大量粉丝,发出有影响力的声音,而大多数普通人发声是不被关注的。加之微博高点赞、多评论优先推送机制,使得绝大部分农民工在微博网络社群中没有追忆乡土的发声权。相比于微博网络社群农民工话语权近乎绝对缺失,微信社群则提供了一个人人平等的记忆活动场域。同地熟人群实际上是原先农

村社会秩序与关系的网络迁移,社群内农民工可以依托熟人身份自由交流。同地非熟人群则为同在异地的不相识农民工提供平等交流平台,群内没有绝对主导者,人人均可以是乡土记忆话题发起者或参与者。^[30-32]政府主导型农民工网络社群通过严格审核机制、微博通过话语权、微信通过“入群申请”为农民工加入社群设置了明显界线,使得同乡之间对外具有较强排他性。^[33]

短视频以15秒或59秒以内快速切换的流媒体形式为主,凭借简短、有趣、低准入门槛等特点收获亿万用户。由于农民工大多成长于乡村,抖音“福建村”短视频作品也多以故乡作为经验材料,展示乡土风貌或将故乡与城市作比,通过短视频唤起乡土记忆。这些经验材料既包含农民工回到乡土后所积累的视频素材,也包括方言、信俗等无需回到故乡便可生成的视频内容。对于知识水平偏低的农民工群体来说,低门槛短视频破除了农民工加入网络社群开展乡土记忆活动的明显界线,人人均可自由观看乡土记忆短视频,围观乡土记忆直播,平等交流、展示所想。

二、作为个案的抖音“福建村”

2019年9月,笔者在校园内一处施工工地旁结识了农民工阿文。阿文是福州闽清县人,不到三十岁的年纪,高中肄业后便跟随舅舅到上海工作。相仿的年纪和老乡关系让笔者很快与阿文熟络起来,并从他口中知道了抖音“福建村”。“虎纠依哥”是阿文的表哥,是一名石材运输司机,户籍仍保留在福建农村,主要工作是从福建闽清运输石材到他所工作的上海工地。这项特殊工作使“虎纠依哥”能够经常往返于沪闽两地,成为抖音“福建村”中仅有的能时常感受两地文化的人,从而顺理成章被推举为“村庄”管理者。

阿文的引见让笔者很自然成为抖音“福建村”一员,实现“入场”,并结识“福建村”掌管者“虎纠依哥”,这为开展研究提供了诸多便利。研究选用网络民族志方法,将抖音“福建村”作为“网络中的田野”,通过参与式观察,编织和讲述

抖音“福建村”成员记忆活动的生成与再现。笔者于每晚9点至11点进入“虎纠依哥”直播间,作为粉丝开展一年多的观察。“福建村”成员通过抖音直播间进行无拘无束的自我表达,从而参与到网络民族志文本书写中。直播以外的时间段,“虎纠依哥”乡土短视频作品以及粉丝们在评论区的交流实践活动构成笔者研究文本。

除了收集观察性数据外,笔者通过观察抖音“福建村”成员交流实践活动,选择25位农民工代表作为访谈对象。选择标准是:第一,是在沪闽籍农民工;第二,相较那些匆匆进入直播间又匆匆退出的游客而言,他们是抖音“福建村”忠实成员,具体表现为关注“虎纠依哥”抖音号并加入“粉丝团”;第三,他们在抖音“福建村”中是互动的活跃者,也是乡土记忆实践活动的真正参与者(如在故乡短视频下评论、在直播中与其他成员共同追忆乡土)。最终,笔者确定包括阿文和两位直播间管理员^①在内的25名访谈对象,年龄从19岁至54岁,各个年龄区间访谈对象数量保持均衡。笔者还对“虎纠依哥”进行深度访谈,重点考察其乡土作品创作逻辑与文化蕴涵。笔者对26位受访者以微信语音形式开展半结构式访谈,每位采访时间在40分钟左右。

线下生活对于田野点来说应被视为一种情景(context),通过更多挖掘情景才可深入虚拟社区文化。^[34]故笔者分别于2019年9-12月、2020年10-12月,走进阿文的线下生活,于2020年4-9月走进“虎纠依哥”的主播日常,考察二人借助抖音“福建村”追忆乡土、分享乡土的生活情境。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式观察,深入挖掘抖音“福建村”背后更深层次文化内涵。

三、动机与实践:抖音“福建村”的乡土记忆生成

“无根性居住”的农民工群体,为了适应城市生活,在短视频平台算法推送作用机制下,因情感互需联结在一起,建构抖音“福建村”。这一网络社群为在沪福建农民工乡土记忆生成与再现搭

①管理员一般是抖音直播间内最活跃的用户,基本能保持每天“在场”。

建平台,乡土记忆则成为维系网络社群的重要纽带。

(一) 动机:技术赋能下的情感互需

情感互需是在沪福建农民工联结在一起的重要动机,也是其乡土记忆生成的关键因素。这一情感动机使在沪福建农民工有较强的观看乡土短视频倾向,加之位置信息、身份标签等个人信息,使短视频平台准确识别农民工偏好,利用特有算法机制推送乡土短视频、直播间,利用技术为抖音“福建村”与乡土记忆生成助力。

农民工从小在农村长大,即使是90后、00后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户籍等原因,他们与农村也无法脱钩。对于这批离开乡土漂泊于大城市的农民工而言,他们遭受他者隔离、媒介隔离与自我隔离。^[35]基于城市地缘与业缘的互动场域很难对其社会资本提升发挥作用,他们往往也难以成为大众媒介关注焦点,加之其内心隐秘的自卑感,使农民工群体游离于城市边缘。而被地理分割的乡村血缘与地缘关系对农民工情感支持亦只是杯水车薪,“无根性居住”的农民工群体陷入孤独之中。

人是社会性动物,难以脱离社会而独自存在。^[36]因此,情感需求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农民工群体在城市中的“基本需求”。

我在流水线上工作,每天做着同样重复的工作,就像机器一样一直动啊动,也不怎么和别人交流,我都要闷死了!回到宿舍也浑身无力,看看手机就准备睡了,和她们(舍友)也没什么交流,可能因为她们年纪比较大,有代沟了吧。因为我有刷抖音嘛,后来抖音给我推送“福建村”,我看里头都是上海工作的福州老乡,因为自己也刚出来(从福建到上海工作)没多久,挺想家的,就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天。那个抖音号经常发老家的视频,看到以前熟悉的东西,又能和讲一样方言的老乡聊聊天,孤单情绪就缓解了很多。(小徐,女,23岁,福建闽清人,在上海一食品生产车间工作^①)

在小徐眼里,关注短视频不止是寻求娱乐,更是情感的寄托。在她看来,“老家”的视频能通过“熟悉的东西”,使得农民工个体在前往陌生的地方后,回忆起故乡的景物、风俗以及其他事物,缓解陌生感与紧张感,做好情感过渡。对远离故乡的农民工而言,越来越多的个体以情感为出发点寻求自我满足与群体认同,人们与互联网另一端的人或群体的亲密度甚至超过了当下生活的身边群体,来自远方的故乡在情感作用下变得熟悉,可以理解为部分学者笔下“脱嵌—再入嵌”的过程,即“脱嵌”故乡的农民工,又表现出个体对社会重新“再嵌入”意愿。^[37-38]

“能和讲一样方言的老乡聊聊天”,凸显了农民工对乡土的留恋。有研究指出,农民工群体在城市中最频繁也是最愿意主动交流的对象往往是在同一个城市拼搏的其他农民工。如果来自同一个地区(即老乡),则更有利于双方交流亲密性,因为其记忆有共通空间。^[39]地理空间分隔使农民工群体与乡土情感联系十分有限,他们往往需要借助媒介保持自我与乡土的勾连,而短视频为漂泊异乡的农民工群体提供了情感交流与记忆生产空间。

我是(抖音)系统推荐过来关注的“虎纠依哥”,成为“福建村”一员。这里头很多是在上海打工的福州人,自己一个人在这里(上海),就经常去“虎纠依哥”直播间看看,还会经常上麦^②,和老乡一起交流感觉很好,就像一家人一样。他(“虎纠依哥”)还有发(短视频)作品,我记得有个讲的是长乐的建筑与长乐路的建筑^③,感觉挺有创意的,勾起了我对家乡的回忆(笑)。(张哥,男,45岁,福建长乐人,厨师)

短视频平台独特的推送技术逻辑,实现从经验到科学的智能洞察和需求预测与以算法模型为工具的智能分发^[40],经过用户和技术“赋权”后,算法推送技术具有了筛选、定义、推送信息和记录、存储个人数据的特殊权力^[41]。短视频乡土作品满足了在沪福州农民工缓解思乡之情,找寻乡土

①受访对象年龄为截至2020年的周岁,职业为进行深度访谈时所从事的职业。

②正常情况下,粉丝在抖音直播间内只能通过文字互动,但“上麦”后,粉丝可以连接麦克风与主播和其他粉丝语音互动。

③长乐是知名的侨乡,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长乐路位于上海市区,路名取自福州长乐。

记忆的需求。在这里,“乡土”成为有价值的“消费品”,农民工通过“消费”乡土,唤起故乡记忆,获得情感支持。同时,“乡土记忆”作为一种财产,在抖音直播间内被交易,农民工们互相诉说自己的乡土故事,进行情感交流,互相满足情感需要,使得农民工通过抖音构建出的“福建村”网络社群,紧密联结在一起。技术赋能下,有类似乡土记忆的人均有可能收到系统推送,出于情感需要而走进抖音“福建村”,产生“滚雪球”式扩张效果。

但为何是“福建村”?为何是来自福建的农民工聚合在了一起?这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在贺雪峰看来,中国农村地域广大,不同地区农村社会结构具有相当不同的逻辑。^[42]他在数十年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依据经济社会分化程度和社区记忆程度,划分出如表1所示四种村庄类型。其中,社区记忆类似于本研究所探讨的乡土记忆,是指村庄全体或部分成员共享的村庄文化经验。位于改革开放前沿的福建和广东农村属于D型村庄,不同于中西部人口净流出产生的B型原子化村庄,亦不同于江浙人口净流入产生的C型原子化村庄,D型村庄成员人口流动规模适中^①,信俗、方言、地方节日等传统文化得以保留,且当地人有着更为强烈的宗族意识,对故乡认同感强烈。与宗族意识强烈但经济不发达的湖南、江西等地A型村庄相比,D型村庄因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有着更为庞大的媒介需求与先进的媒介使用水平,依赖媒介实现跨区域的记忆实践也变得可能。^[43-44]

表1 四种村庄类型

	经济分化程度低	经济分化程度高
强社区记忆	A	D
弱社区记忆	B	C

(二) 实践:借用“地方”的短视频生产与直播展演

短视频作品与直播是短视频平台最重要也是最具特色的内容产品,抖音“福建村”通过调用“地方元素”,形成人地互动,对风物、乡音等地

方资源再生产,引发受众情感共鸣,勾起抖音“福建村”成员乡土记忆。

在特定地域中,“地方感”作为维系社会化的个人与具体场所的情感纽带,兼具地方固有特性与特定相关人群对其依恋的双重属性。^[45]在人与地方互动中,地方产生独特历史文化,形成人的活动所构筑具有意义的地方资源。这些地方资源通过再生产,被运用于抖音“福建村”短视频拍摄与制作中。短视频集中展现地方特有高辨识度元素,勾起抖音“福建村”成员乡土记忆。

“虎纠依哥”保持每周5条作品更新频率,他一般会利用每周一天休息时间和工作日晚上^②,到街上走走逛逛,拍摄视频,并精选五条发布于抖音号上。“虎纠依哥”作品并不是对地方资源简单复制,而是通过融入作者与地方资源互动,创作出抖音“福建村”中独特的乡土记忆短视频。

抖音“福建村”短视频作品对“地方”借用有如下几个方式:一是再现地方重大活动,唤起在沪福建农民工乡土记忆。游神是福州农村在新年里最盛大的活动,“虎纠依哥”拍摄游神途中迎佛、舞龙、杂技等精彩画面,利用抖音自带剪辑功能进行拼贴,附上方言解说,再现游神壮观场面。由于这一活动规模较大、参与人数众多,不少在沪福建农民工是记忆共有者,所以诸多粉丝纷纷点赞,在评论区开展互动,“想当年,哥也是游神队伍中的一员啊”“一年年的过得好快,今年又不能回家了,想爸妈女儿了”……表达过年不能回家的伤感或对故乡传统习俗的怀念。

二是捕捉市井生活,以熟悉之景唤醒乡土记忆。“地方”可以分为通过公共符号构建的地点,以及经由长期接触及日常经验而熟悉的地点。^[46]对于在沪福建农民工来说,熟悉的知识和体验,来源于情感紧密的物质环境以及意识可觉察到的环境认同^[47],更容易唤醒乡土记忆。除了再现宏大场面唤起记忆外,抖音“福建村”乡土记忆短视频十分重视市井气息传递,如拍摄镇上每周六赶集、菜场叫卖、邻居家搓麻将场景等,利用抖音图声

①这里的农村人口流动区别于城市人口流动,闽粤一带以城市人口流入为主,农村吸引力一般,不同于江浙一带乡镇企业吸引力强。对四种村庄类型的具体阐释,可参见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

②“虎纠依哥”的工作是轮班制,他上白班。

文结合的特点,营造出较强“临场感”,将“若隐若现”的记忆具体化、具身化。多位受访对象均提到:“虽然短视频里未必是自己熟悉的人,但这种乡村生活场景最能触发家乡记忆。”这类视频引发了农民工们在评论区中的广泛互动:“怀念小时候赶集的盛况啊!每周就盼着赶集的那一天。”“上海都没有赶集了,要买东西直接去超市或者叫个生鲜配送,反而没有以前家乡那种热闹的感觉了。”在沪福建农民工们通过观看短视频追忆故乡生活,反思当下,并通过评论区互动加强记忆认同。

三是个性化表达赋予“地方”新内涵,引导记忆实践内容和方向。记忆实践权力观认为记忆由权力形塑,记忆实践背后隐含权力不平等逻辑,即占据权力高位者可以引导记忆实践内容和方向^[48],“当权者”拥有将个体记忆上升为集体记忆的权利。“虎纠依哥”无疑是抖音“福建村”的“当权者”,创作什么、传播什么由他个人决定。“虎纠依哥”短视频作品最常借用“地方”食物与地标,在短视频场景中融入个性化表达。比如在对地方食物借用中,“虎纠依哥”常常发表对某家店、某道菜的评论,因观看短视频的在沪福建农民工无法“到场”,关于食物的个体记忆被抖音“福建村”集体记忆所引导,趋于一致。正如哈布瓦赫^[49]指出的“群体框架会限定个体记忆之间的异质性和差异化,并引导个体记忆走向组织化和同质性”。借用地标在抖音“福建村”中通常表现为“虎纠依哥”在乡土地标前的个人展示:

那时候“无价之姐”的舞蹈很火嘛,“虎纠依哥”就在我们当地很有名的宏琳厝前面跳这个舞,我原本对宏琳厝的记忆就是一个气派的古建筑,现在感觉它就像新潮建筑一样。(小徐,女,23岁,福建闽清人,在上海一食品生产车间工作)

抖音“福建村”对乡土地标的借用,赋予“地方”新内涵,使得在沪福建农民工乡土记忆随着抖音“福建村”短视频呈现发生转变。

四是对比沪闽风物,通过“场景嫁接”激发在沪福建农民工乡土记忆。“对比”在抖音“福

建村”短视频作品中非常常见,由于抖音“福建村”成员大多为在沪福建农民工,加之“虎纠依哥”时常往返于沪闽两地的便利性,以上海作为与福建比较的地点最具可行性,也更能激发在沪福建农民工乡土记忆。

我会收集上海和福建两地的视频素材,找到相似之处,把它们放在一个短视频里。比如我拍过闽清的塔和上海大厦施工工地的对比(短视频),一个是农民工们关于老家的记忆,一个是农民工现在工作的地方,我觉得画面很有冲突感。大家纷纷评论看到这个视频后想家了。后来还被抖音推送上热门,获得十几个万个赞,我就继续拍这样的短视频了。(“虎纠依哥”,男,33岁,福建闽清人,石材运输司机)

沪闽风物对比的“场景嫁接”短视频,在比较中强调地方文化独特性,从而唤起在沪福建农民工乡土记忆。

而借用“地方”的短视频,又引发了在沪福建农民工们怎样的互动?评论区是农民工们开展互动的重要渠道,在观察中发现,有两种类型的评论往往会引起较大关注。

一是根据短视频内容,写下能引发共鸣的评论。比如“@SIRI”在“虎纠依哥”“福州鱼丸”的短视频下评论道:“第一次去吃鱼丸是外婆带我去的,那时候一碗只要两块钱。现在全国各地都有鱼丸,但是没有家乡那种味道了。”其他农民工们纷纷回复:“食物还在,人已不在。鱼丸依旧,家乡不再。”“上海街上一碗鱼丸都至少要十几块钱了,味道比我们自家包的差远了”。

二是吸引短视频发布人,即“虎纠依哥”评论。短视频作者回复过的评论将会自动被抖音系统在评论区置顶,能获得更高关注度。如“@冷夏末”在发表观点前加上一句“番茄的番怎么读”^①来吸引作者回复,“@小玲珑”则以“奉承”的方式如评论“‘虎纠依哥’越来越帅了”吸引作者回复。这类被系统置顶的评论,虽评论本身没有实际内容,但常常成为农民工们互动的平台。大家会回复该条评论,表达对视频内容的赞美,以及

①在抖音中,“翻”意指“翻牌”,隐喻作者回复自己。“番茄”的“番”与“翻”同音,故为约定俗成的抖音评论区“暗语”。

视频引发的对故乡的所思所想。因作者曾在该条评论下回复过,所以在该评论下互动得到作者再次回复的可能性更高。

借用“地方”的短视频作品往往能通过“观看视频—唤起回忆—参与互动—强化记忆”的方式产生在沪福建农民工们的乡土记忆实践。从上述两种引发强烈互动的评论可以窥见农民工在短视频作品中开展乡土记忆实践的方式。第一种互动形式属于“内容吸引型”。强调通过评论内容引发共鸣,吸引更多人关注。第二种互动形式属于“社交吸引型”。即为了得到作者和更多农民工的关注,而采取非优质内容形态的评论,构筑评论区中独立的“互动小空间”。由此可见,抖音“福建村”中的乡土记忆实践并非只是“虎纠依哥”的个人实践,而是主体引导下的共同互动。

直播展演作为抖音“福建村”仪式行为,通过借用方言、场景等地方元素,推动乡土记忆实践开展。仪式是建构与追溯记忆的重要手段,社会群体通过仪式定期重新巩固自身,当人们感到他们团结了起来,就会集合在一起,逐渐意识到他们是道德统一体。这种团结部分是因为血缘纽带,但更主要是因为他们结成了利益和传统的共同体。^[50]在沪福建农民工在技术赋能下因情感互需建构抖音“福建村”网络社群,仪式在其中必不可少,它让抖音“福建村”成员更紧密团结在一起寻求乡土记忆。但仪式需要一定操作性,繁琐仪式在分散各处的农民工中难以进行,而新媒介以其便于携带的“可移动性”为仪式开展创造条件。如保罗·康纳顿所言,记忆通过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两种方式进行,其中纪念仪式的演练可以唤起人们对过去的记忆,并进一步延续和强化过去的回忆,而仪式的演练本身通过身体实践来完成。^[51]

在抖音“福建村”中,无论是主播“虎纠依哥”还是其粉丝,每晚9点至11点总是准时“到场”抖音直播间互动交流,开展记忆实践,通过

不断重复的仪式行为强化乡土记忆。

抖音“福建村”直播仪式对方言借用最为频繁,直播间名称便取自“聊天”的福州方言“攀讲”^①。“虎纠依哥”常利用方言开展直播展演,如将知名影视剧桥段用福州话表述出来、演唱福州话歌曲等等。在直播间内,福州话是“官方语言”,无论是“虎纠依哥”还是上麦的粉丝,均会优先使用福州话互动。

和我一起上班的人来自五湖四海,平常只能说普通话,只有在这个直播间里才能用方言畅所欲言,就像回到家里一样。而且有的东西是福州特有的,像“C”^②,普通话我都不知道怎么讲。(阿欣,女,31岁,福建闽清人,餐馆服务员,直播间管理员)

在沪福建农民工借用极具地方特点的方言进行直播间互动与展演。方言本身作为记忆一部分,调动起抖音“福建村”成员乡土情感。同时,需要方言才能进行的特殊表达,往往容易唤起在沪福建农民工对特定乡土风物的记忆。

地方场景借用在抖音“福建村”直播展演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虎纠依哥”直播背景往往是能反映福建农村“夜生活”的热闹场景,如海鲜大排档、河边榕树下^③等。即使在上海家中,“虎纠依哥”直播背景也是巨幅福建土楼塑料挂画。对地方场景的借用让直播充满“福建元素”,始终存在的“福建元素”则加强直播仪式感,增强抖音“福建村”成员黏性,让他们在直播间中自然开展乡土记忆实践。

依哥今天在的地方挺热闹啊。又到哪里胡吃海喝了?

夏天来了,逛逛美食夜市好舒服啊。连江那边禁渔期前一两个月的晚上经常有海边夜捕,大排档里头卖的都是刚刚捕捞的海鲜,想想就流口水啊!

我们县也有,住在海边就是爽!

上海是不是不打渔呀,都没看到这种夜市。

①福州各区县方言均为福州话,虽口音有差异,但仍属于同族闽语,彼此之间可以听懂。由于抖音算法推送,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也时常有福建其他地市的人参与互动,虽然方言不同,但短视频文字和画面等往往能吸引他们。

②福州特有的点心,口味类似于其他地区的糍粑。

③榕树是福州的市树,在市区和农村都极为常见。福州乡村,人们夜晚喜欢在河边的榕树下散步、运动。

怀念在家晚上出门就可以吃海鲜的感觉啊。

(2020年7月10日晚“虎纠依哥”直播间粉丝语音对话节选,语音对话中采用的方言文中已转化为汉字)

在直播间中,由于工作属性的差异,农民工们虽偶尔会分享着当下生活的故事,但“乡土”成为其更愿意交谈的话题。乡土记忆因共通的意义空间成为直播间中的重要实践。在“地方”元素的作用下,直播间中的成员共同回忆起家乡海鲜夜市的场景,并由此展开互动,追忆乡土故事。

抖音“福建村”以发布短视频作品和直播的双重形式开展乡土记忆实践,构筑以视频和“共时在场”为主体的、有别于微博微信等网络社群的新型在沪福建农民工记忆交互空间,为记忆追溯与建构提供新场域。乡土记忆实践主要可从形式与效果两个维度考量。在形式上,乡土记忆实践所涉及的内容必须包含方言、建筑、生活方式等福建故乡元素。在效果上,则需要唤醒观者的记忆活动,即在评论区或直播间的互动中表露出“想家”“怀念故乡”等意涵。这两个维度同时存在,方可构成在沪福建农民工们的乡土记忆实践。在这一网络社群记忆场域中,“虎纠依哥”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他既是抖音“福建村”的当权者,又是一名服务者。正如在访谈中“虎纠依哥”所说:“我更多的是给在上海的福建农民工们一个交流的空间,毕竟这样的空间太少了。当然,我自己也挺享受这种为大家服务的过程。”他是唯一拥有发布作品权力的人,是话题发起者,但其直播间又是人人皆可连线的平等交流平台,“虎纠依哥”是提供交流空间的保障人。这一网络社群记忆场域,既不同于政府主导型网络社群和微博的绝对领导,又区别于微信的人人完全平等,是介于二者间的新记忆场域,不仅调动了农民工乡土记忆积极性,还避免无人发声的尴尬局面。

短视频平台网络社群打破网站、论坛、微信、微博网络社群的明显界线,人人皆可自由观看乡土记忆短视频,围观乡土记忆直播,参与社群互动,但参与互动依然难以“入群”。抖音“福建村”依托地缘、血缘形成一定群体边界与文化认同。在其中,记忆对外人是有界限的,在沪福建

农民工以外群体,即使有诸多相似经历,但由于文化差异性或缺乏群体归属感等原因,其个体记忆在抖音“福建村”中很难被唤醒。同时,方言在抖音“福建村”频繁使用也为外人进入设置障碍。所以,记忆并不是无私的、可共享的,而是对集体外的人存在排斥,即使新媒介打破以往明显界限,但记忆本身具有的排他性依然使得外人无法进入其中。

四、融合与延续:抖音“福建村”的乡土记忆再现

媒介会通过再现、遮蔽或凸显来建构记忆^[52],记忆也会反作用于人的现实活动。在城市文化、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博弈中,乡土记忆趋向融合与延续,并通过个体行为和互动行为再现乡土记忆。

(一) 三重认同:乡土记忆的个体维系

在沪福建农民工所追求的城市文化“现代性”,并非与“乡土性”二元对立,而是可以相互共存。抖音“福建村”构筑起的集体乡土记忆也并非只能单向作用于个体乡土记忆,在沪福建农民工在城市文化、集体乡土记忆、个体乡土记忆博弈中,形成文化与记忆“三重认同”,寻求记忆融合,延续乡土记忆实践,实现乡土记忆个体维系。

对城市文化与乡土文化的认同使在沪福建农民工在“村民”与“市民”双重身份中形成“新市民”的特有身份。他们既积极体验城市新鲜事物,融入城市文化,又维系着乡土记忆。

平安夜快乐!你们圣诞节打算咋过?

我今天去吃了麦当劳过了过洋节。

我们老板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个苹果,叫“平安果”。

南京西路那边好像搞了个大圣诞树,我打算明天过去瞅瞅。

(2020年12月24日晚“虎纠依哥”直播间粉丝对话节选)

圣诞节作为舶来品并非中国城市“原创”,但城市洋节日氛围明显比乡村浓厚。对于在沪福建农民工而言,洋节日是城市文化符号之一,它代

表潮流与时尚,过洋节则象征自己融入了城市文化之中。

今天是拗九节^①,祝全天下父母身体健康,百毒不侵,长命百岁!

大家记得喝拗九粥啊!

我都忘了要喝拗九粥了!我只记得今天是孝顺节,我早上用美团给他们远程买了束康乃馨。

想爸妈了,我先给他们打个电话去。

(2020年2月22日福州传统节日拗九节晚“虎纠依哥”直播间粉丝对话节选)

虽然追求“潮流与时尚”成为在沪福建农民工融入城市文化的重要手段,但其身上“乡土性”并未因此掩藏,乡土传统节日依然保留于在沪福建农民工记忆之中。但由于长期处于城市环境里,大众媒介建构场景又往往对“他者”的乡土节日缺乏关照,在沪福建农民工乡土记忆出现淡化倾向,拗九节被“孝顺节”的笼统记忆取代。与此同时,城市文化作为一种新的记忆融入在沪福建农民工乡土记忆中,“为长辈送康乃馨表达祝福”这一常见于城市的文化被在沪福建农民工乡土记忆维系实践所运用,在沪福建农民工将城市文化与乡土记忆相互融合,延续并再现个体乡土记忆。

在沪福建农民工乡土记忆在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博弈中逐渐走向融合,以独特方式延续、维系个体乡土记忆。福建农村拥有较多信俗,妈祖信仰便是其中一项,每年农历三月廿三妈祖诞辰日,福建福州、莆田等地会举行盛大的妈祖祭典。2020年4月15日妈祖诞辰,抖音“福建村”开展隆重的线上祭祀妈祖仪式,抖音“福建村”成员纷纷在直播间评论区发送蜡烛表情,表达对故乡女神崇敬之情。笔者在线下还观察到参与仪式的阿文双手合十,祈求妈祖护佑。

扬·阿斯曼(Jan Assmann)^[53]指出,集体记忆是行动者之间就特定事件内容互动生成的具有凝聚性和共享性意义的过程和结果。抖音“福建村”成员通过祭祀妈祖仪式的互动,产生乡土妈祖信俗集体记忆,使成员更紧密凝聚在一起。但有意

思的是,在访谈中了解到,“虎纠依哥”、阿文等闽清籍在沪福建农民工并不信仰妈祖:

妈祖是海神,我们(闽清)不靠海的,也就没有妈祖信仰。但是直播间里头靠海的县的人多,他们信妈祖。毕竟是福建的守护神,我们出门在外,也跟着一起信了,保平安嘛。我们内陆信陈靖姑^②,虽然我们没在直播间开祭祀仪式,但是自己在家还是会经常拜拜。(“虎纠依哥”,男,33岁,福建闽清人,石材运输司机)

抖音“福建村”成员既认同集体乡土信俗记忆,又保留个体乡土信俗记忆。在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竞争中,实现两种记忆融合与再现。

在沪福建农民工既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形成城市认同,又在短视频媒介影响下被乡土记忆拉回;既在媒介构筑的集体乡土记忆中形成新的文化认同,又在故乡元素助推下维系个体乡土记忆,形成城市文化、集体乡土记忆、个体乡土记忆“三重认同”。而对记忆的认同又反作用于现实活动开展,通过拗九节送花、在家拜神等行动再现个体乡土记忆。

(二)“礼物”的流动:乡村互惠记忆的城市开展

在《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中,阎云翔^[54]对下岬村的田野调查展示了乡村礼物经济与关系网络。在对抖音“福建村”考察中发现,“福建村”成员亦会通过网络社群互动行为,形成“礼物”流动的集体记忆,唤醒社会关系结构运作的个体乡土记忆,并在城市开展关系网络互惠乡土记忆。

乡土社会是基于礼治的熟人社会,而城市是基于规则的陌生人社会。在以农村户籍人口为主的抖音“福建村”中,“乡土性”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将抖音“福建村”凝结为线上的乡土,形成在沪福建农民工的抖音熟人村庄。“礼多好办事”是乡土熟人社会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唤醒“送礼办事”的个体记忆,在城市文化中运用新技术手段再现传统乡村社会关系网络“潜

①每年的正月廿九是福建福州地区的传统节日拗九节,又称为“孝顺节”,在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煮拗九粥祭祀祖先或者孝敬父母;拗九粥由红糖、糯米、花生、红枣、桂圆等配料熬制而成,口味类似八宝粥。

②陈靖姑是福建最有影响力的陆上女神。2008年,陈靖姑信俗文化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规则”互动，形成城市文化、个体乡土记忆与集体乡土记忆的平衡性“三重认同”。

线上交流的虚拟性，使得抖音“福建村”礼物流动也呈现出非物质性状态，最常见的就是“刷礼物”。直播间粉丝可以购买虚拟货币“抖币”用于支付虚拟礼物费用，并择机将礼物赠予他人，被赠人可以获得一定比例真实收入。在抖音直播特殊机制里，除了主播外，只要在直播间上麦，任何人都可能成为被赠人。“五爷”是抖音“福建村”中收到礼物金额仅次于“虎纠依哥”的人，这源于他在上海拥有丰富的经验和资源。

“五爷”是我们这里资历最老的了，他二十多年前就来了上海，一步步爬到了现在工头的位置。我没签合同，干一个地方换一个地方，指不定哪天就找不着活儿了。虽然我年纪也不小了，但刚来上海，还是个新人，有很多需要别人照应的地方，农村不就讲个“人情大过天”嘛。其实在直播间里一直刷礼物，大家都懂是咋回事。（王哥，男，40岁，福建闽清人，塔吊司机）

而被赠人“五爷”，也十分清楚“刷礼物”背后的含义。

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线下也见过面，还给他引见了不少人。当然，工作上的事情也会给他指导和帮助。（五爷，男，54岁，福建闽清人，工地工头）

传统人际交往模式中，人情是人际关系核心，在陌生城市找到一个经验、资源丰富的朋友，对刚到上海的福建农民工来说有助于城市生活开始。跟随在城市工作多年的老乡讨生计，甚至是部分农民工到上海工作的契机。直播间内“礼物”的流动，唤起更多人关于乡村互惠的乡土记忆，虽然这与以秩序和规则为基础的城市文化存在冲突，但“礼物”交换在抖音“福建村”的人情互动中十分有效。于是，个体乡土记忆与集体乡土记忆便达成某种共识。“刷礼物”这一原本以“打赏”形式出现的互动功能，在乡土记忆作用下，成为抖音“福建村”成员人情交流、资源互换的重要渠道，乡村互惠记忆反作用于在沪福建农民工现实活动开展，乡土记忆得以再现。

丰富的视频呈现对乡土记忆再现具有重要意

义。^[5]但网站、论坛和微博都不具备“共时在场”的连线功能，微信也对在线人数设定上限。而短视频平台网络社群依托视频而生，除了短视频作品外，直播能实现不设上限的共同观看、互动，更易再现乡土记忆。而短视频平台打赏功能既避免微信社群内发红包的尴尬（微信非好友间无法私发红包），他人又能看到线上礼物流动，唤醒乡村互惠记忆并反作用于其现实活动。

五、结论与讨论

如图1所示，在中国特殊的文化情境下，通过对抖音“福建村”深入考察发现，因技术赋能下的情感互惠，抖音“福建村”以在线社群方式被建构。抖音“福建村”借用“地方”，利用地方资源再生产创作短视频作品，使用仪式化直播进行展演，开展乡土记忆实践，依托地缘、血缘形成文化认同与共通交流内容，成员乡土记忆在互动与分享中得以生成。在城市文化、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博弈中，乡土记忆趋向融合与延续，并通过个体行为和互动行为再现乡土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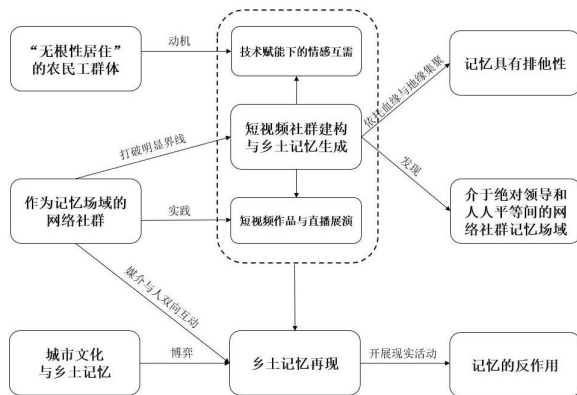


图1 短视频平台上的农民工社群建构与乡土记忆研究结论

此外，有必要对抖音“福建村”乡土记忆生成与再现做进一步探讨：

对于抖音“福建村”成员乡土记忆生成而言，在沪福建农民工所寻求的情感需要，实质上是对社会资本的渴望。在乡土，他们处于血缘关系与乡村地缘关系的社会网络中，拥有丰富人脉资源与牢固情感纽带。但到了城市，他们是“无根性居住”群体，既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结构，又不易

形成稳定社会资本。短视频平台通过其独特的算法推送机制,引导寻求社会交往以适应城市生活的在沪福建农民工聚合,建构抖音“福建村”网络社群,通过回忆乡土满足情感需要。可以说短视频的技术逻辑突破以往自组织网络社群的建构法则,向乡土记忆网络社群的形成伸出了“无形之手”,进一步降低其进入门槛。

虽然短视频打破以往媒介所产生的对外明显界限,降低进入门槛,但在抖音“福建村”中,成员们依靠方言等地方资源对乡土记忆编织与书写,这又为非在沪福建农民工“入场”设置了障碍,即使外人有相类似经历也难以走进这一社群。那么抖音“福建村”乡土记忆便成为“村”内成员“私有化财产”,在沪福建农民工追求社会资本的步伐趋于停滞,难以在向外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有重大突破,其“圈子”仍局限于传统基于乡土的地缘群体或血缘群体。这说明乡土记忆本身具有较强排他性,它既可以依托血缘与地缘集聚某一群体,又可以使这一群体记忆活动趋向内卷,对群体“现代性”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在抖音“福建村”乡土记忆实践中,可以发现短视频使记忆场域不断拓宽,记忆内容不断丰富。哈拉尔德·韦尔策(Harald Welzer)^[56]认为,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包括广播、电视节目、因特网等)兴起为公众记忆实践提供新的媒介场域和叙事方式。抖音“福建村”通过借用“地方”,以发布短视频作品和直播展演的方式形成特定“记忆之所”,为在沪福建农民工提供乡土记忆实践平台。同时,有别于传统以文字、声音、图片某单一介质为主的记忆方式,短视频融合图声文三者,能更为多元立体展开记忆实践,乡音、地标、信俗、节日均成为记忆对象。实时互动的直播“面对面空间”,进一步丰富了记忆方式,使得乡土记忆能够以互动方式即时传递。发声权缺失容易挫伤农民工开展乡土记忆活动的积极性,而无领导、绝对平等的网络社群又常常因缺少话题发起者而成为“沉默群”,不利于记忆活动开展。短视频平台网络社群记忆场域介于绝对领导与人人平等之间,使农民工拥有乡土记忆话题的同时,有较高开展乡土记忆活动积极性,从而进一步推动乡土记忆生成。

关于乡土记忆再现,以往研究较多关注个人或群体如何通过现实活动影响记忆,对记忆反作用关注较少,这是因为在以往研究中,媒介往往处于被支配地位。而在对抖音“福建村”的考察中发现,乡土记忆有强大力量,在媒介与人的双向互动中,能反作用于在沪福建农民工现实活动。在追求“现代性”,追忆“乡土性”过程中,在沪福建农民工形成城市文化、个体乡土记忆与集体乡土记忆的平衡性“三重认同”,融合三种记忆或文化,形成蕴含“现代性”元素的个体乡土记忆与集体乡土记忆,反作用于节日送花、拜神、乡村互惠等现实活动开展。这说明人类记忆活动并非单向度,而是在人与记忆互动中,形成相互影响、彼此作用的状态。

本研究有两大理论贡献:一是从记忆建构的农民工主体性出发,考察其乡土记忆的生成与再现,弥补了媒介中心主义下对人的能动性考察的不足。另外,本研究也试图在互联网文化研究方法上寻求“回归到日常生活”的路径,正如杨国斌提出的“互联网研究,不能没有人的故事”^[57]。本研究走进在沪福建农民工的平凡生活,触摸他们的不平凡,展示他们的日常,这正是互联网研究和网络民族志过程中回归人的主体经验尝试。^[58]二是将西方记忆理论放置在中国特殊的社会情境下,将中国农村信俗、人情、面子等因素纳入考察范畴,探究在这一复杂机制下的乡土记忆实践,为记忆理论中国化做出了一定探索。

还需指出的是,通过对本研究的梳理,笔者认为在探讨城市与乡村问题时,需要摆脱两种常见的研究思路:一是“城市高于乡村”“现代性高于乡土性”“城市文化高于乡土记忆”的研究思路。这种思维定势容易使研究者陷入对“乡土性”批判和对“现代性”乌托邦式向往的泥沼中,难以平等客观看待“乡土”历史与文化性,以及“乡土”对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等方面积极作用。二是“城市与乡村对立”的研究思路。诸多研究将城乡二元对立上升到不可交融的地步,但实际上,城市与乡村尤其是二者文化与记忆并非完全割裂,可以融合并再现。城市本不是城市,是从乡土逐渐演变而来,城市人口亦然。所以城市在某程

度上带有乡土属性,这种乡土属性不会完全消退,而是会在大众媒介建构下长久保留下去。

(致谢:本研究参加2020年华东政法大学第二届“媒介、历史与记忆”工作坊,得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朱春阳教授、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李红涛教授、云南大学新闻学院孙信茹教授、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吴志远研究员等老师的宝贵意见,同时得到《新闻界》编辑部及匿名评审专家的中肯建议,谨此感谢。)

参考文献

- [1]CNNIC.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21-02-03]. http://www.cnnic.cn/hlwfyj/hlwzxbg/hlwjbg/202102/t20210203_71361.htm.
- [2]汪华,孙中伟.乡土性、现代性与群体互动:农民工老乡认同及其影响因素[J].山东社会科学,2015(02):21-27.
- [3]周敏.“快手”:新生代农民工亚文化资本的生产场域[J].中国青年研究,2019(03):18-23+28.
- [4]邵鹏.媒介记忆理论——人类一切记忆研究的核心与纽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4.
- [5]谢泽杭.“离场”的互动:诉说、分享与自我实现——对农民工短视频的媒介人类学考察[J].新闻论坛,2020(02):88-90.
- [6]郑欣.进城:传播学视野下的新生代农民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9.
- [7]谢卓潇.春晚作为记忆实践——媒介记忆的书写、承载和消费[J].国际新闻界,2020,42(01):154-176.
- [8]陈振华.集体记忆研究的传播学取向[J].国际新闻界,2016,38(04):109-126.
- [9]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 [10]Pang Y P, Liu Y Q. The Impact of Cultural Openness on Creativity in Urban: Evidence from China Urban Panel Studies[J]. Urban Studies,2020,27(03),124-131.
- [11]代红娟,赵文龙.故乡眷恋、城市适应与农村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2):109-117+167.
- [12]郑欣.进城:传播学视野下的新生代农民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387.
- [13]郑欣,赵呈晨.乡愁的守望:新生代农民工集体记忆与城市适应研究[J].河南社会科学,2015,23(09):12-19.
- [14]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测量与分析[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0-11.
- [15]邵鹏.媒介记忆理论——人类一切记忆研究的核心与纽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42-45.
- [16]刘守英,王一鹤.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J].管理世界,2018,34(10):128-146+232.
- [17]潘毅,等.农民工: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J].开放时代,2009(06):5-35.
- [18][49](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283-286.
- [19]国务院.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EB/OL].[2020-05-01]. http://www.gov.cn/xinwen/2020-05/01/content_5507970.htm.
- [20]黄鹏进.“半城半乡”与农民的就近城镇化模式[J].治理研究,2019,35(05):105-113.
- [21]孙中伟,刘明巍,贾海龙.内部劳动力市场与中国劳动关系转型——基于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和田野资料[J].中国社会科学,2018(07):81-105+206.
- [22]朱磊.走出困境:共同体再造与价值重构——对新生代农民工居住状况的分析[J].学习与实践,2013(11):103-108.
- [23]朱磊.农民工的“无根性居住”:概念建构与解释逻辑[J].山东社会科学,2014(01):72-77.
- [24]Sampson H, Turgo N, Cadge W, Gilliat-Ray S, Smith G. Harmony of the Seas?: Work, faith, and religious difference among multinational migrant workers on board cargo ships[J].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2020,43(16),287-305.
- [25]Palmer W.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Stereotype Formation: Indonesian Migrants in Hong Kong[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2020,21(03),731-744.
- [26]Baig R B. Everyday multiculturalism in union: power construction in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unionism[J].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2020,43(05),854-872.
- [27]罗雅琳.上升的大地:中国乡土的现代性想象[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0.
- [28]王芳,宋朋.我国农民工网站运营机制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5(04):38-48.
- [29]Svensson, Marina. Voice, power and connectivity in China's microblogosphere: Digital divides on Sina Weibo[J]. China Information, 2014,28(2), 168-188.
- [30]郭旭魁.新生代农民工在微信同乡群中自我身份的建构[J].当代青年研究,2016(02):24-29.
- [31]汪国华.从内卷化到外延化:新生代农民工务工地创业社会支持网络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9(08):56-61.
- [32]禹卫华.微信群的传播分析:节点、文本与社交网络——以三个校园微信群为例[J].新闻记者,2016(10):61-65.
- [33]高莉莎.“移动主体熟人社会”:基于少数民族农民工手机微信使用的研究[J].新闻大学,2018(02):36-45+150.
- [34]张娜.虚拟民族志方法在中国的实践与反思[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5(04):143-150.
- [35]郑欣.进城:传播学视野下的新生代农民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121.
- [36](美)艾略特·阿伦森.社会性动物[M].杜运周,邢占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37](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社会[M].夏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 [38][58]孙信茹,王东林.玩四驱:网络趣缘群体如何以“物”追忆——对一个迷你四驱车QQ群的民族志考察[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26(01):24-45+126.
- [39]郑欣,徐高鹏.身份再造:传播学视野下新生代农民工公民意识[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9(04):117-123.
- [40]段淳林,宋成.用户需求、算法推荐与场景匹配:智能广告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思考[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42(08):119-128.
- [41]匡文波.智能算法推荐技术的逻辑理路、伦理问题及规制方略[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38(01):

- 144-151.
- [42]贺雪峰.大国之基——中国乡村振兴诸问题[M].上海:东方出版社,2019:23.
- [43]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
- [44]贺雪峰.最后一公里村庄[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
- [45]付若岚,周澄.异质性空间视角下短视频“地方感”的多重实践[J].新闻界,2021(04):55-61+72.
- [46](美)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M].王志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 [47](美)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对于意义的个体追寻[M].宋秀葵,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
- [48](法)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 [50]周海燕.记忆的政治[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252-255.
- [51](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4-5.
- [52]周海燕.媒介与集体记忆研究:检讨与反思[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21(09):39-50+126-127.
- [53](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75-76.
- [54](美)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M].李放春,刘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 [55]Gibbons L. Connecting personal and community memory-making: Facebook Groups as emergent community archives[J]. Information Research-an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 Journal,2019,24(03),18-34.
- [56](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M].季斌,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57]杨国斌.中国互联网的深度研究[J].新闻与传播评论,2017(01):22-42.

Where is the Hometown: The construction of migrant worker community and rural memories on the short video platform——Inspection of Tik-Tok " Fujian Village"

Yu Jing, Xie Zehang

Abstract: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grant workers' short video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nd local memories, and explore how new media affect the generation and reappearance of memories. Take the Tik-Tok "Fujian Village" as a case, use it as a "field on the Internet" to conduct ethnographic investigations. Select representative members to conduct interviews and walk into their offline lives to explore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short videos on the local memories of migrant workers in the "Fujian Village". The study found that because of the mutual emotional needs empowered by technology, the Tik-Tok "Fujian Village" is constructed as an online community. Tik-Tok "Fujian Village" borrowed "Local", use the reproduction of local resources to create short video works, use ritualized live broadcasts for performances, carry out the practice of local memory. Relying on geographic and kinship to form cultural identity and common communication content, and its members' local memory allows the shared local memory to be generated through interaction and sharing. In the game of urban culture, individual memory, and collective memory, local memory tends to bridge and continue, and through individual behavior and interactive behavior reappears the local memories. Research believes that the emergence of new media has led to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the memory field. The unique algorithm push mechanism of the short video platform helps to form an online community with a common local memory, creating a memory field between absolute leadership and equality for all. Compared with the clear boundaries created by the media, memory itself is also exclusive, and limits are imposed on people outside the community that have a common memory. Even if outsiders have similar experiences, it is difficult to enter the community to carry out memory activities. In addition, memory is not passive. Under the two-way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media and people, it becomes more and more counterproductive to actual activities. At the same time, based on the special social structure of China, the article makes a certain attempt to return to the subjectivity of memory research and to Chineseize memory theory.

Keywords: Migrant Workers; Short Video; Community Construction; Local Memories; Media Memories

Authors: Yu Jing, Department of Politic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Xie Zehang, Department of Politic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传播共治与村民政治参与¹⁾

——以成都市郫都区战旗村为例

田烨

摘要 我国提出乡村振兴的农村发展战略，而乡村振兴依赖于良好的乡村基层治理。在提高乡村基层治理水平中，媒介可以发挥何种作用？本文通过对成都郫都区战旗村的观察和对村民的访谈，描绘出媒介参与基层治理的现状，尤其认为在乡村基层媒介存在“结构性匮乏”的问题，即在媒介和信息高度过剩的“媒介化社会”里，基层却面临主流性、主体性、主动性媒介缺乏的状况，制约了村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可能性。文章提出了改变这种情况的建议。

关键词 结构性匮乏；战旗村；乡村振兴；传播共治；村民政治参与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田烨，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陕西西安 710049；西安体育学院体育新闻与传媒学院副教授，陕西西安 710068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农村工作。尤其新世纪以来，连续 18 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新年度一号文件均聚焦于“三农”。2015 年 11 月 29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发布，要求确保到 2020 年农村人口实现脱贫。由此，脱贫攻坚成为“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在 2020 年 12 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宣布：“经过 8 年持续奋斗，我们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近 1 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胜利。”至此，中国农村脱贫攻坚工作圆满完成。

在农村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党中央为农村工作确立了新的战略目标，即乡村振兴。实际上，在脱贫攻坚工作的后期，乡村振兴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在 2017 年 10 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这一战略；2018 年 3 月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 年 9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乡村振兴战略落实为具体计划。2020 年 12 月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乡村振兴战略由此上升到“三农”工作的核心位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国农村幅员辽阔，农业从业人口多众多，因此“三农”工作始终是国家工作的重要方面。

1)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风险社会’视域下主流媒体新闻舆论公信力提升研究”（2019n015）。

我国的媒体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媒体，它们承担着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进行舆论引导的职责。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媒体在基层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是如何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在乡村治理中，村民作为主体之一，他们的参与对治理绩效有重要意义，那么进一步地，乡村传播是如何影响村民的政治参与，进而影响到乡村治理绩效的呢？

二、文献回顾

在现代政治学中，治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与“统治”和“管理”等概念尽管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强调的重点显著不同。在“统治”或“管理”概念下，更多地包含了强制力量的成分，但是治理一般不涉及强制力量，而是强调协同的机制。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给出的定义即是：“私人 and 公共的个人或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法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人们和机构同意的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各种非正式制度安排。”^[1]比较明显地，治理更强调后者即非正式制度安排，也就是非强制力量，各参与方在目标协同下合作共治。治理理论的重要创立者罗西瑙就认为，治理是“由共同的目标所支持”^[2]的。尽管有研究者指出，我国早在《荀子·君道》中已经出现“治理”一词，不过其意义仍然是“统治、管理”^[3]，随着西方治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现代意义上的治理概念才进入到国内。俞可平指出，全球化的一个结果是治理概念的推广，即人类政治过程的重心从统治走向治理，从善政走向善治，从政府的统治走向没有政府的治理，从民族国家的统治走向全球治理。^[4]

在治理理念下，媒介被作为治理的工具被提出，即所谓媒介治理。媒介治理不能被理解为“对媒介”的“治理”，而是“运用媒介”对政治和社会等进行“治理”，促使后者实现“善治”的目标。媒介治理这一概念最先由肖恩和吉拉德提出，肖恩认为“媒介的善治存在于三个层面：媒介对于公民社会的自我治理和完善；媒介对于国家权力机关（政府）的监督与共治；媒介对于超

国家机构或组织的跨文化治理”^[5]。德弗勒强调了传播的社会治理功能，即传播行为是“一个表达团体规范的手段，通过这个手段使社会控制、分配各种角色、实现对各种努力的协调，表明对未来的期望，使整个社会进程持续下去……要是没有这种产生影响的交流，人类社会就会崩溃”^[6]。可以说，现代意义上的大众媒介从诞生开始就参与了社会治理。不过，依靠舆论影响仅仅是媒介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之一。媒介参与社会治理更有力的途径，是直接影响社会的政治与权力结构。比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推特治国”，就是直接运用媒介进行政治活动的典型。媒介实现这些目标依靠的不是强制力量，事实上它也没有强制力量，而是依靠媒体自身的影响力使共识得以形成，因此，媒介治理也被称为“传播的共治”（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Pattern），这一提法似乎更能体现传播治理的本质，也与治理的概念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互联网的兴起使传播共治的概念更加深入人心。互联网的传播赋权不但使公民意识增强，也使公民运用媒介的机会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大量公民记者和自媒体的兴起，打破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权力格局。这些因素使得原来僵化的“统治”或“管理”手段难以适应，容纳包括媒介在内力量参与的“共治”模式成为更有效率的途径。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我国乡村振兴的规划不断完善。2021年4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提出乡村振兴包括“产业发展、人才支撑、文化繁荣、生态保护”等方面的任务，其中第31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健全完善乡村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网络和服务运行机制，鼓励开展形式多样的农民群众性文化体育、节日民俗等活动，充分利用广播电视、视听网络和书籍报刊，拓展乡村文化服务渠道，提供便利可及的公共文化服务。”这里提出了媒体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媒体天然地具有主流舆论引导职责，因此乡村振兴促进法中并未提及，而是强调了“提供便利可及的公共文化服务”。由于我国最基层的媒体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因此参

与乡村治理最直接的媒体也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在2018年8月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建设好县级融媒体中心以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其中的“服务群众”并非仅仅指向群众提供新闻或信息方面的服务,而更是指政务服务等方面的功能,因此强调的是融媒体中心参与基层治理的职责。2018年9月,中宣部在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召开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现场推进会,会议强调,要把准功能定位,坚持分类指导,因地制宜开展工作,努力把县级融媒体中心建成主流舆论阵地、综合服务平台和社区信息枢纽。2019年1月,中宣部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规范》,要求将融媒体中心建设为“开展媒体服务、党建服务、政务服务、公共服务、增值服务等业务的融合媒体平台”,明确地赋予其基层治理的职责。因此,一般认为,与中央或省市级媒体比较,“县级融媒体中心不单是地方性媒体或媒介机构,也不仅仅是各级政策的在地传播者,它应被视作为在国家基层治理中的重要参与者”^[7]。因此,本文将考察村民运用包括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内的各类媒体参与社区治理的情况。

三、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观察法和访谈法进行研究。作者利用假期两次到成都市战旗村进行观察和访谈,了解村民运用媒介参与基层治理的情况,主要是了解村民通过媒介获得本村乡村振兴工作方面的情况,以及如何通过媒介影响本村乡村振兴工作决策。战旗村位于成都市郫都区唐昌街道,距离成都市区40公里。战旗村原名集风大队,在1965年兴修水利、改土改田中成为一片战斗的旗帜,改名为战旗大队,1986年改为战旗村。2020年6月,战旗村与邻近的金星村合并成立新的战旗村,面

积5.36平方公里,下辖16个村民小组,有1445户4493人。2020年,村集体资产8120万元,集体经济收入653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2万元。2018年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战旗村,高度肯定了该村的工作,指出“战旗飘飘,名副其实”,并希望战旗村在乡村振兴中“走在前列,起好示范”。2020年4月,战旗村获得四川省2019年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示范村荣誉称号。因此,在这样一个工作比较先进(基层治理比较规范),乡村振兴工作也比较先进的村庄观察媒介运用对基层治理影响和乡村振兴影响是有典型性的。

在观察中,作者主要了解战旗村的媒介种类、分布情况等。在访谈中,笔者主要了解村民如何参与基层治理,如何运用媒介实现治理目标,经常运用哪种媒介等。访谈对象的获取方式采用目标抽样和分层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即根据该村人员组成情况,抽样对象分为一般村民、大学生、企业家、务工人员等4个类别。一般村民指拥有村民身份,在村里从事不同工作的人员;大学生指拥有村民身份而在外地上大学的人员(笔者运用假期进行访谈,因此部分大学生已经返回家乡);企业家指在该村从事企业管理等经营工作的村民;务工人员指具有村民身份而在外地从事工作的人员。其中务工人员是选择短暂回村里的村民进行访谈。访谈分两次进行,第一次进入该村访谈了10人,第二次进村补充访谈了5人,年龄均为18岁以上。(表1)访谈均为开放式,即不设置固定的问题,但是围绕如何运用媒体获得本村乡村振兴信息和参与乡村振兴工作进行。

四、研究发现

战旗村同中国的众多都市城郊一样,已经被现代传播的网络所覆盖。在机构媒体中,从中央

表1 访谈对象列表

编号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C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年龄	38	42	18	66	23	29	22	35	61	56	49	32	49	56	52
性别	女	女	女	男	男	女	男	男	女	男	女	女	男	男	女
类别	村民	村民	村民	村民	村民	村民	大学生	村民	村民	村民	村民	务工人员	务工人员	企业家	村民
户籍	本村	本村	本村	本村	本村	本村	本村	本村	本村	本村	本村	非本村	非本村	非本村	本村

媒体道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影响力均在发挥作用。智能手机已经非常普及，受访者全部使用智能手机，并全部能够运用它来上网和购物支付等。除了村民所使用的手机媒体和电视等传统媒体，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两类媒体。第一类是户外媒体，进入村口后，左右两个停车场周围有国家电网等公司的广告牌，村中心广场和公路边上则是对战旗村进行介绍的展示牌；第二类是村中心广场上一个巨大的电子显示屏，上面反复播放着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战旗村时在广场上讲话的场景。这些公共媒介叙述着战旗村的光荣历史和成绩，也为该村的基层治理奠定了乡村振兴的基调。

（一）议题类别与共识形成

村民如何了解乡村振兴的信息，又是如何参与到乡村振兴中？整体上年龄较大的村民会提到电视、广播和手机媒体，而年轻的村民基本上只提到手机媒体，这反映出乡村媒介消费习惯的一个侧面。尽管新媒体和智能手机已经非常普及，但是年龄较大的村民还保留着看电视和听广播的习惯，比如一位村民告诉道：“我喜欢听收音机，我每天早上6点半左右开始，沿着门前的公路散步时就听收音机，里面有时候有乡村振兴的新闻。”（C4）更多的年长的村民则从电视中知道乡村振兴，这表明电视依然是农村较为主流的大众媒体。同时，不少村民从战旗村党建馆、精彩战旗馆和广场展板上获得了乡村振兴的信息，这些展馆和展板不但供外来的游客阅看，也给村民提供了信息渠道。战旗村中心广场既是全村的政务活动中心，也是村民的休闲中心，还是媒介和信息的汇聚中心。村里主要的展馆围绕着广场，众多的展板也围绕着广场，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新闻，使广场成为最富有现代媒介气息的场所。而这些媒介信息中，最主要的议题是乡村振兴，其次是战旗村史、发展成就、产业规划等议题。在这样的信息环境中，村民对乡村振兴可谓熟稔在心。值得提出的是，村中心广场上的电子显示屏对乡村振兴新闻的普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几乎所有的村民都提到这一点，这可能与显示屏长期以来持续不断地滚动播放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战旗村的新闻有关。一位村民说道：

乡村振兴？我当然是最先从广场电视上知道的。我因为工作，每天平均要路过广场不下5次吧，大多数时候电视上都在播放总书记视察我们战旗村的新闻。里面总书记说的内容，好些我都能背下来了。我就是从这里知道的。其它的？也有，比如手机新闻里也有，但是哪里有这个天天重复的让人记得住呢。（C6）

媒体的功能之一在于推动社会共识的形成，而社会共识正是参与式治理的精髓所在。在战旗村，媒介的确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共识的形成，受访者对于乡村振兴的战略表现出一致性的赞同。但是，这种媒介“制造”的共识还必须考虑到其他的因素在背后的作用。首先，战旗村早已成名，又在总书记视察后更是名扬全国，因此不但乡村振兴的先天基础较好，而且在总书记视察后变化更快，村民自然对乡村振兴战略非常认同。其次，村民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解和接受，基本上还是处在“管理”思维之下，而非治理思维之下。“电视里说的乡村振兴，当然好啊！在我们村做得很好，政策对老百姓有利”（C10），一位村民的说法既表明乡村振兴战略受到农民的欢迎，另一方面也表明这种赞同倾向于一种“接受”式的，即出于对党的政策的信任和对媒体权威性的信任。这当然是可喜的。另一方面，推动乡村振兴需要提高基层治理水平，那么村民作为治理主体而非对象的角色需要重视，则村民参与和运用媒介参与公共事务的观念和精神都需要培育，就需要村民不仅具有“接受”的意识，同时需要具有“参与”的意识。尤其在脱离战旗村这种发展得比较好的村庄的语境下，参与式治理的动员可能更加重要。

（二）线上参与与线下参与

互联网深刻地塑造了现代社会，使现实社会与虚拟空间融合在一起。政治参与不再依赖于物理空间，而是可以大量地通过网络渠道和网络空间实现。战旗村的治理比较规范，提出在乡村振兴中以“党建引领，共建共治共享”为基层治理机制。总书记在视察时肯定道：“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非常重要，任何地方搞得好都是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你们这里的火车头作用，从你们抓的工作来看，应该是做得好，

你们这个‘三问三亮’，把共产党人的作用发挥出来了。”村委会下辖6个党支部、6个村民自治组织、7个群团组织、7个集体经济组织、5个主要的合作经济组织。其中党支部、村民自治组织、群团组织都是村民能够参与公共事务的机构。村民对本村的治理和参与感也比较满意，认为“小的事情会开村民小组会，重要的事情村委会拍板”“涉及到村民利益的事情会征求大家的意见”。(C6)

村民参与基层治理的方式以参加会议和征求意见为主，尤其会议为主要形式。无论是村民小组、村委会还是自治组织，通常以会议讨论来决定事项。“有事情要商量时，(村民)组长会通知我们什么时间去，大家就在一起讨论”(C8)，一位受访者说道。“有些涉及到村里企业管理方面的事，相关的负责人有时候会来和我摆一下，先征求一下意见嘛”(C14)，另一位受访者说道。这也符合基层治理甚至更高层级治理的常规。

至于逐渐增多的网络参与方式，基本上还没有被运用于基层的公共管理之中。战旗村的网络覆盖非常好，与城市里并无多大的差异，主要的公共场所也有完善的WIFI设置。受访者并未提到运用网络作为参与治理的渠道，基本上均把网络作为一般性的信息接收渠道或者娱乐、通讯等工具。这背后的原因，可能与参与治理的观念不深入有关，也可能与对互联网甚至媒体参与治理的作用不了解有关。但是，一个因素不可忽视，那就是基层治理的地理范围比较小，而且乡村社会更属于熟人社会，这就削弱了网络参与治理的优势。在熟人社会中，公务议事可能同时也是社交活动，而且彼此的物理距离很近，这种社交活动的精力成本并不大。一位受访者对运用网络参与村务不但不太了解，而且也明显地觉得不大必要：“上网？有那个时间还不如几步路就到了，当面(说)总比见不到人好商量啊。”(C15)这确实体现了网络治理在乡村中的特点。即使对于在外务工人员而言，网络也并未充分发挥治理参与的便利：“大的媒体不会有村里面的信息，县级媒体几乎不会有，主要是通过村里面的公号，但是上面的信息也很少，一个月可能两三条吧”(C12)；“我们在地，村里的事情就不怎么管了，有的事情家

里人会处理，也没有精力去管，回去一次都很费精力”(C13)。实际上，村级自媒体建设不充分，村民的新媒体政治参与意识不强是一个普遍现象。

(三) 媒体参与与媒体监督

我国的媒体被定位为主流舆论引导的“喉舌”，这一点已经深入人心。村民对媒体的认知也主要在这个方面，多数村民在访谈中会提到这一点，而且基本上没有年龄段的差异。但是，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视角，也就是媒体可以对作为受众的个人发生何种影响；如果换一个视角，即个人可以运用媒体做什么，则村民的观点会有较大差异。“追剧”(C1)“购物”(C2)“学习”“打游戏”(C7)是被提到的最为普遍的媒介用途，这些都并不令人奇怪。在媒介的公共功能中，村民对媒体监督最为熟悉和认可，认为“媒体可以对不公正的事情起到监督作用”(C1)，或者“媒体可以起到舆论监督作用”(C7)“我如果遇到不公平的事情，可能投诉到媒体”(C12)等。但是，与对媒体监督普遍地熟悉比较起来，运用媒体参与基层治理则对于村民来说要陌生得多。一位大学生村民提到“媒体其实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就是帮助村民更加关心村里面的事情”(C7)，另一位村民认为“媒体能让村民了解村里的情况，看到我们村这些年的进步，使大家理解村委会的工作”(C14)。其他人则没有提到这方面的作用。看起来，村民对运用媒体参与基层治理不很了解，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人们对于媒体作为舆论阵地的职责和作为舆论监督工具的职责相当熟知，可能形成了一定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参与式治理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是一个新的课题，即使在西方也不是一个很成熟的治理模式，因此人们对它难免了解有限。事实上，在前述两位提到运用媒体参与社区治理的两位受访者中，除了一位是大学生外，另一位则是村里面的企业管理者，她有着较多地与村委会打交道的经历，因此对媒体的理解也有不同之处。

五、讨论：媒介的结构性匮乏

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是生产过剩。大众传播发展成为一个商业行业时，媒体和新闻的供给就

铺天盖地。我国的媒体虽然不属于纯粹的商业机构，但是也有一定的文化产业功能，也就是有提供高品质和充足的新闻报道的内在激励机制。进入互联网时代，资讯和媒体的供给更是海量地涌现，人们在信息面前显得无从选择。更重要的是，新媒体极其深刻地改变了社会，使线下的现实社会与线上的虚拟社会融合在一起，社会变得日益网络化。同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被媒介尤其是新媒介影响与支配，呈现出媒介化社会的特征。在战旗村，不但电视、报纸、广播、广告牌等传统媒体仍被运用，新媒体的普及也与都市无异，从表面上呈现出信息丰富甚至过剩的特征。随处可见的移动互联网，几乎人人普及的智能手机，商业场景的二维码，网络购物与移动支付等，网络媒介成为村民日常生活的基础设施之一。看起来，在这个普通的川西村庄，媒介与信息已经极大地丰富，与近在咫尺的成都市区并无太大区别。但是，当我们将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下参与基层治理的场景，则可以发现在“媒介化社会”这种叙事表象之下，乡村的媒介领域隐藏着若干结构性的匮乏因素。

（一）主流性媒介的匮乏

这里的主流性媒介的匮乏，并非指缺乏主流媒体，而是主流媒体新闻的抵达率的匮乏需要引起注意。在互联网时代，人们几乎完全生活在网络的世界，而主流媒体也基本上全部上网，有的主流媒体还有不同的网络平台或账户，因此人们接受主流信息的可能性不存在问题。但是，主流媒体信息是否有效到达受众，则是更为实际的问题。访谈表明战旗村的情况与通常的情形一致，年龄更大的人尚保留着传统媒体消费的习惯，因此主流媒体信息的抵达率相对较好。但是，年轻人群尽管有着更多的上网时间，关注主流媒体信息的意愿反而相对较低，主流媒介影响力相对匮乏。一方面，年轻群体的网络素养较好，因此在网络上面临更多的选择，主流媒体面对的竞争更加激烈；另一方面，年轻群体较少地具有传统媒体消费习惯，尤其是2000年后出生的“网络原住民”，很少接触到传统媒体。一位00后受访者表示，自己的记忆里看报纸的次数屈指可数，看电

影也仅仅是有时候陪妈妈追剧。（C3）如何提高主流媒体在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群中的抵达率，是媒体始终要解决的难题。

（二）主体性媒介的匮乏

主体性媒介的匮乏，指乡村作为主体缺乏自己的媒体，或者说媒体的影响力不强。从严格意义上讲，乡村是没有新闻媒体的，因为我国实行新闻媒体准入制，而且最基层的机构媒体是县级媒体。比如在战旗村，村委会于2018年3月注册了“战旗村”微信公众号，不能称为新闻媒体。当然，如果从广义的概念说，“战旗村”可以称为该村的官方“媒体”，因为它不但由村委会注册，而且主要发布村委会的工作动态，其中有不少关于乡村振兴的工作进展等，但是更新很少，甚至比访谈人员所说得更更新频率还要少，有时候一两个月才更新一条。战旗村所在的唐昌镇人民政府于2018年6月注册了“郫都区唐昌街道”公号，2021年3月改名为“精彩战旗 大美唐昌”，更新的情况比“战旗村”好，大致能保持每天更新的频率，但是里面关于战旗村的消息并不多，至于乡村振兴方面的就更少。在全国众多的乡村中，战旗村的情况应该是不错的，很可能绝大多数村并没有自己的自媒体。这就带来一个不足，通常的村级集体都有数千村民，比如战旗村有将近4500人，这么大的社区如果没有自身的媒体的话，在治理信息的沟通上可能是低效率的。目前新媒体异常繁荣和方便，村级集体有发展自己自媒体的必要。相当多的村之所以没有注册自媒体，可能既与人才缺乏有关，也与没有意识到这一工作手段的重要作用有关。为了解决这方面的难题，除了推动观念的转变外，还可以推出一些切实的帮助措施，比如由当地的县级融媒体中心托管村级自媒体等，那么可能对发展农村基层自媒体和提升基层治理水平都是有益的。

（三）主动性媒介的匮乏

主动性的媒体，指村民不但可以获得信息，还可以参与乡村振兴事务治理的媒体。参与性媒介的匮乏，指媒介上缺乏参与治理的途径。通常地，媒介以提供信息为主要目标，但是由于网络媒体技术的兼容性，新媒体可以提供除了信息之

外多方面的服务。在我国推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中,多数融媒体中心都以综合性的信息提供与政务服务平台作为目标。这种思路有两个方面的优点,第一是方便了群众,第二是新闻服务与政务服务可以互相促进,从而提高融媒体中心的影响力。这个思路对于村镇自媒体实际上也是适用的,因为越基层的媒介越适合发展综合性自媒体。“战旗村”目前尚缺乏村民参与治理的入口,它仅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自媒体。“精彩战旗 大美唐昌”虽然设置了“服务”栏目,但里面的内容很少,只有“唐昌七夕”“农户认亲”两项,没有涉及到村民参与治理的项目,也缺乏政务服务方面的项目,况且如前所说,它对于村级治理的服务有限。提高村镇的基层治理能力,调动村民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加快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应该提高村民通过媒介参与本地社区治理的积极性。由于村级组织在致敬、技术和人才方面受到制约,那么可以设想将村镇的自媒体与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政务服务平台接通,使村民更加方便地办理政务事项和参与公共事务。

综上,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如何发挥村民

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从战旗村的研究可以看到,村民通过媒体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内容和机制方面都有优化的空间。在这种现状的背后,隐藏的是媒介资源在乡村的结构性匮乏的事实,需要通过针对不同的情况改善匮乏状况,从而改善基层治理以及更好地推动乡村振兴战略。

参考文献

- [1]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Our Global Neighborhood-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2-3.
- [2]James N.Rosenau,,"Governance,Order,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in James N.Rosenau(ed.)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p4.
- [3]殷琦.“治理”的兴起及其内涵衍变——以在中国传媒领域中的使用为例[J].国际新闻界,2011(12):37-44.
- [4]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01):20-32.
- [5]虞鑫,陈昌凤.美国“事实核查新闻”的生产逻辑与效果困境[J].新闻大学,2016(04):
- [6]M.DeFleur.Theories of Mass Communication,2nd ed[M].New York:Mckay,1970.
- [7]蒋锐,俞虹.作为公共服务平台的县级融媒体中心:一种基层治理的视角[J].现代传播,2021(02):13-16.

Communication Co-governance and villagers' media participation under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aking Zhanqi village, Pidu District, Chengdu as an example

Tian Ye

Abstract: China puts forward the rural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which depends on good grass-roots governance. What role can the media play in improving the level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of Zhanqi village, Pidu District, Chengdu and the interview with the villagers,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edia participation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especially believes that there is a problem of "structural lack" of rural grass-roots media, that is, in the "media society" with high excess of media and information, the grass-roots is facing the lack of mainstream, subjectivity and initiative media, It restricts the possibility of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change this situation.

Key words: structural deficiency; Zhanqi Village; Rural Revitalization; Communication Co governance; villager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uthor: Tian YE,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College of Sports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Xi'an Physical Education University.

刑法介入网络信息治理的背景、路径与边界¹⁾

冯建华

摘要 随着网络违法信息不断滋长蔓延,刑法介入网络信息治理在特定情况下不仅实有必要,而且成为迫切之需。刑法介入网络信息治理是网络犯罪性质演变与风险刑法观兴起交相作用的结果,从深层动因来看是因应网络空间传播变革带来的巨大压力,与网络治理模式及其背后的权力机制亦有内在关联。从治理重心和发展趋向来看,刑法介入网络信息治理将从内容规制转向平台规制。在内容规制方面,网络空间诽谤罪与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以及关于“情节严重”和自诉转公诉的适用规定,至今仍是核心争议焦点;在平台规制方面,如何基于类型化的角色功能,合理设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权责结构,是网络空间刑事立法和司法的重点与难点。从制度层面分析,要防止刑法过度介入网络信息治理,关键在于回归传统刑法观,为此需处理好网络空间公权和私权的比例关系,探索构建相互依托和相互制约的网络空间权力格局。

关键词 网络信息治理;风险刑法;网络诽谤;寻衅滋事;网络秩序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冯建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任编辑,北京 100026

一、引言：为何研究？

近年来,我国动用刑事手段制裁网络谣言和诽谤类虚假信息的案例呈现增多之势,当遇到重大社会突发公共事件则表现得更加明显。2020 年疫情防控以来,北京市公安局在 1 个半月时间内共查处编造、传播涉疫谣言类案件 450 起,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33 人;截至 2 月 27 日,依法查处违法犯罪人员 27 人。^[1]在开展网络谣言专项治理行动中,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山西省刑拘 49 人、批捕 23 人,河南省批捕 131 人,陕西省批捕 22 人。^[2]发挥刑法强大威慑性固然有利于较快净化网络空间,但若掌握不好时机和火候,网络谣言严打行动也可能使得“原本严肃的刑事程序变成一场标榜政绩的执法运动,导致大量争议案件再度出现”^[3]。社会舆论不时呼吁,刑法打击网络谣言不能扩大化,更不能让“禁谣”变成“禁言”。

为有效遏制网络违法信息肆虐传播,我国不断加强网络空间刑事立法和司法力度。2013 年,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下文简称《网络诽谤解释》),不仅降低了网络环境下诽谤罪的入罪门槛,而且将网络空间特定的编造、传播虚假信息行为升格为“寻衅滋事罪”;2015 年,《刑法修正案(九)》在“编造、传播虚假恐怖主义信息罪”的基础上增设“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罪”,扩展了刑事制裁的虚假信息种类范围,创立了“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专有罪名,不仅将作为传播枢纽平台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纳入刑法规制重点对象,而且囊括了网络违法信息传播中“组织”“指使”“帮

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全媒体时代公共传播治理的理论创新研究”(20BWX079)。

助”等新兴犯罪行为类型；2020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对于以侮辱、诽谤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的特定行为，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值得注意的是，因发布信息贬低、嘲讽加勒万河谷地区冲突中的卫国戍边英雄烈士，网民“辣笔小球”被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成为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的首个案例。在此前后，不时有网民因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而受到刑事制裁，使得刑法介入网络信息治理的尺度与限度问题，再次进入学界关注视野。

出于秩序与安全的考虑，动用刑法这一“最后的手段”介入网络信息治理，在特定情况下不仅实有必要，而且成为迫切之需。面对网络违法信息传播严峻复杂形势，除了需要从微观视角对网络谣言入罪等具体问题加强专业技术分析，同时亦亟待从宏观层面思考：刑法为何积极介入网络信息治理？刑法介入网络信息治理的路径呈现何种趋向？刑法介入网络信息治理的边界何在？从目前来看，学界针对后者在宏观层面展开的跨学科综合研究仍十分薄弱，绝大多成果是聚焦于专业领域的微观研究。只有“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才能更好掌握刑法介入网络空间的规则和底线。

随着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交互渗透，网络犯罪手段不断翻新，互联网从犯罪对象、犯罪工具升级为犯罪空间。在中国特殊国情下，互联网的媒介和政治属性日益彰显，网络信息治理压力随之成倍增长。不同于传统媒体权力主导的规制模式，网络信息治理是多元主体博弈与合作的动态化过程。面对新的媒介环境和新的治理难题，如何以更宽广的视野分析和把握刑法介入网络信息治理的背景、路径和边界，无疑是个具有较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

二、传播变革与风险刑法的价值选择

由于具有较强的暴力性和破坏性，刑法在法

律体系结构中被置于最后序列。传统刑法观认为，犯罪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的，不是犯罪。然而，在社会“维稳”需求强烈而常规管理手段又乏力的特殊情况下，刑法不时被作为应急之策，以一种威慑性的姿态站到了社会治理的最前线。在刑法工具主义的推动下，刑法介入网络空间可能会变得活跃起来，其背后有着复杂的深层动因和环境因素。

从技术和媒介层面分析，刑法介入网络信息治理是因应网络空间传播变革带来的巨大压力。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传播技术的促动下，媒介社会化与社会媒介化呈现交互演进变革的趋势，信息生产和传播方式由传统媒体时代封闭式的“集束化大众传播”走向全媒体时代开放式的“网络化公共传播”。与传统媒体相对封闭传播环境下的“确定性”相比，以社交媒体和平台媒体为代表的互联网络新媒体的最大特征是实时交互传播带来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这一方面带来了网络空间信息传播和言论表达的空前活跃与多元，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网络违法有害信息的滋生蔓延和屡禁不止，网络秩序问题因而变得日益突出。由于自上而下式的媒体和舆论传统管理手段基本失效，为应对与日俱增的网络信息治理压力，利用刑法的强大威慑性，通过扩张网络犯罪圈、降低入罪门槛等方式，不断加大网络违法信息的刑事处罚力度，便可能成为有关权力机构用于维护和管控网络秩序的必要手段。

从制度和文化层面来分析，刑法介入网络信息治理与网络空间治理模式及其背后权力机制有着内在关联。随着网络违法信息肆虐传播日益成为风险社会的表征，探索构建与国情相适应的互联网内容管理制度成为一项急迫任务。网络治理的理念与手段是特定社会环境下的产物，在不同发展阶段会随外在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得到调整和完善。中国网民人数快速攀至世界之最^①，带来了网络使用的自由程度与受控程度的双双扩大和增强。从“Internet Governance”这个词汇翻译的不

^①在2008年召开的中国互联网大会上，时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奚国华介绍，截至2008年6月，中国网民数量达到了2.53亿，成为世界上网民最多的国家。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9.8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0.4%。

同,多少可以看出互联网治理理念的中外文化差异。在西方国家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官方文件中,“Internet Governance”通常被翻译成“互联网治理”,而在中国官方文件与学术研究中,这个词常被翻译成“网络管理”或“网络监管”。^[4]“监管”与“治理”是两个有着不同意涵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措辞的不同反应了对于互联网的角色功能及治理模式存在认知上的差距。偏重“治理”的国家通常采取多元主体参与的协作模式,偏重“监管”的国家多采取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政府在其中发挥主导性乃至排他性的作用。随着传播变革向纵深推进和互联网法治化进程的加快,网络空间治理模式从早期由政府或商业机构主导的单一主体模式,逐步走向政府、商业机构、用户等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的治理模式,只是在不同国情和背景下,协同合作模式的内在结构与动力机制有所差异。

经过三十余年的探索,我国网络治理模式的主体架构基本成形并趋于稳定。随着大数据、算法、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新媒体在极大提升传播效能的同时,也因引发颠覆性传播变革而对网络治理能力和水平提出了严峻考验。在行政驱动的制度惯性作用下,网络治理的理念和手段仍难以完全脱离传统媒体时代新闻宣传工作的管理思路与做法,盘根错节的“多头管理”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制度带来的产物。^①中国政府没有充分意识到网络社会与传统物理空间的区别,并用传统物理空间的法律治理方式和思维方式来思考网络社会的治理问题。^[5]这一度造成互联网法规政策纷纷出台,造成的规则重叠、规制冲突等弊端日益明显。^[6]网络空间多头并置、相互交错的密集式立法立规,不仅难以提升法律实施的整体效果,反而推动立法层级及其威慑力的不断加码。在某种侧面上,刑法积极介入网络空间信息治理就是这种现实的反映。

从现实环境因素来看,刑法介入网络空间信息治理是网络犯罪性质演变与风险刑法观兴起交

相互作用的结果。网络犯罪的特点及其社会危害正在发生变化,互联网在犯罪中的地位经历了从“犯罪对象”“犯罪工具”到“犯罪空间”的演变。与传统社会的犯罪形态相比,网络犯罪的行为方式、危害后果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呼唤着刑事立法、刑法理论与时俱进式的回应。^[7]《网络诽谤解释》的颁布施行,实质上就是试图探索解决互联网作为“犯罪空间”的问题。

风险社会的来临,特别是恐怖犯罪、网络犯罪、环境犯罪等新型风险犯罪的滋生,促动了风险刑法观的兴起。风险刑法观以“抗制”风险(在刑法中表现为“社会危害性”)为主要目的,旨在发挥刑法强力维护社会秩序之功能。在不确定性凸显的高风险社会,对于安全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愈发迫切。“人民的安全乃是至高无上的法律”,霍布斯的这句经典名言,在当今风险社会背景下愈发熠熠生辉。故而,风险刑法观又被称为“安全刑法观”。当社会中出现某种难以解决或被认为具有极大社会危害性的突出问题时,很多人习惯性地希望寄托在刑法之上,认为重刑之下必能达到强力管控和矫正秩序之效果。在政策导向型风险刑法观的驱使下,社会治理便可能染上“刑法浪漫主义”色彩,其突出表现就是刑法立法变得日益活跃,刑法修正案频繁颁布。^[8]社会危害性难有客观评判标准,通常体现为主观性的价值判断,其一旦脱离社会实践或社会发展进程,以消除社会危害性为指向的风险刑法观便可能导致象征性立法的出现。

象征性立法是刑事立法政策化的产物,传递的是立法者的情绪、姿态或立场,主要追求的不是实际效果而是满足社会期待。^[9]为了回应国民对于社会安全的诉求,展现应对风险的主动姿态,刑罚便可能成为“国家自导自演、国民自我满足的手段”。^[10]从实际效果来看,象征性立法不仅会削弱刑法的刚性权威,而且浪费本已稀缺的刑法资源。另一方面,为应对特定领域的行政管制力不足,消除日益凸显的社会危害性,风险刑法观也可能导致过度刑法化现象的出现,其突出表现

①国务院赋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内容管理职权,有利于减轻多头管理模式的弊端,但由于网络空间蕴含丰厚的利益和权力资源,要做到完全避免乃至消除多头管理模式并不现实。

是对某些性质模糊或处于演变中的中性行为犯罪化,或者变通乃至降低犯罪构成要件,以达到强力维护社会秩序之需。^①

风险刑法观的根源在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理论,其背后牵涉刑法的价值定位和本质功能,即刑法是偏重“社会防卫”还是“法益保护”。前者强调刑法对于国家和社会集体利益的维护,后者注重对个体合法权益的保护。网络传播的特点决定了网络空间信息犯罪不仅关涉个人法益的保护,而且直接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我国近年来不断加强网络空间刑事立法和司法力度,某种程度上正是受到风险刑法观的影响或推动。为此,既要辩证看待风险刑法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又要防止陷入象征性立法和过度刑法化的实践误区。

法律是解决分歧与冲突的一套理性的、客观的、明确的准则。从法律社会学层面来分析,在纷争迭起的现代社会,价值认同弱化带来的精神与道德层面的分化,导致对刚性的法律有了更大依赖。在急剧变革的转型社会中,对于作为解决冲突工具的法律的需求越大,社会自我修复机制就会变得越弱,从长远来看法律的实际效能也会呈递减趋势。而在道德价值观念统一、凝聚力强大的社会中,为解决冲突而诉诸于法律的情形相对较少,对于法律的依赖性也较小,但法律的效能却非常高。^②网络空间作为充满纷争与冲突的新型场域,相关行为规范和结构秩序仍处于调试与博弈之中,存在较大的可塑性和变动性,导致网络空间对于法律规则特别是最具强制力的刑法,在特定时空下往往有着极大的功能化需求。这为理解刑法积极介入网络信息治理提供了更为宏观的观察和分析视角。

三、从内容规制转向平台规制

刑法介入网络信息治理通常主要是采取内容规制的手段,即根据形势需要对于社会危害性较大的网络违法信息予以重点打击。我国刑法对于

编造、传播网络虚假信息的犯罪行为,目前没有设立统摄性的专有罪名(“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只是针对有关险情、疫情、灾情、警情等四类社会危害较大的虚假信息),相关规定散见于不同的法律条款之中。

从规制倾向来看,我国对于网络违法信息入罪呈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就是从早期强调对于个体权益的保护,逐步转向偏重于对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保护。这是将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虚假网络信息从众多虚假信息中分离出来,在公民的预见能力之内予以立法明确的主要原因。^③网络违法信息传播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危害,是主张网络造谣传谣犯罪化在社会心理学层面的主要依据。《网络诽谤解释》的颁布施行,本意是为了规范和限制刑法介入网络空间的不当行为。然而,网络空间寻衅滋事罪和诽谤罪是否具有足够的“合法性”,特别是关于“情节严重”和自诉转公诉的适用规定,至今仍存较大争议。

根据《网络诽谤解释》第5条第2款规定^④,网络空间寻衅滋事罪是结果罪,入罪要件是“起哄闹事”并“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由此可见,“起哄闹事”是“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手段,后者是前者造成的直接后果。那么,在网络空间编造、散布虚假信息,是否或如何才能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起哄闹事”?司法解释中的“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是否等同于刑法关于寻衅滋事罪的结果要件“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换言之,网络“公共秩序”是否等同于“公共场所秩序”?此外,《网络诽谤解释》第二条第一款创立了网络诽谤入罪的数量标准,即“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依靠单一的数量标准入罪,会不会造成网络诽谤入罪的过度扩张?《刑法》第246条第2款规定,诽谤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

①过度刑法化现象在国内外比较普遍,其本身并无优劣之分,关键是取决于适用的时机和效度。我国《刑法修正案(九)》增设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某种程度上正是对“演变中的中性行为犯罪化”。这是有效打击网络新型犯罪的必要之举,关键是要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充分理解立法本意,掌握好法律适用的尺度与限度。

②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依照《刑法》第293条第1款第(4)项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和国家利益的除外”。《网络诽谤解释》第三条为此规定了七种例外情形。由于对“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情形通常难以做到客观评判,而自诉转公诉的“合法通道”一旦打开,在中国特殊国情下会不会助长公权力滥用公诉手段打压“不受欢迎”网络言论的现象?上述这些疑问乃至担忧均是必须正视和反思的问题。

《网络诽谤解释》关于“数量标准入罪”的规定,是为了提高刑法打击网络违法信息的力度和范围。这已经超出“司法解释”的范畴,是司法机关越权对法律的“续造”,无论形式还是实质均有违宪之嫌。^[13]这一规定不符合罪责相当、罪责自负和主客观相统一的基本原则,是“客观归罪”,不符合刑法教义学的基本原理。^[14]有些学者却持肯定性意见。“诽谤信息转发 500 次入刑”的规定具有合理性,符合刑法原理且并不违宪,“认真对待司法解释,而不是随意嘲笑司法解释是亟需倡导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理念”。^[15]“诽谤信息转发 500 次”构成网络诽谤“情节严重”,标志着诽谤罪在虚拟空间中呈现“积量构罪”特征,这种量化入罪标准模式因网络空间与传统物理空间的巨大差异而具有合理性。^[16]规定数量入罪标准是基于网络传播特性而采取的应对之策,是立法能动性的体现,在实践中有利于统一执法标准,规范司法行为。其立法初衷值得肯定,可从实际效果来看,用客观不变的数量标准匡定千变万化的网络传播行为,多少存在简单化思维,其结果往往事与愿违甚至适得其反。^[17]

《网络诽谤解释》规定自诉转公诉的例外情形,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法律依据,客观上有利于规范公诉手段的适用。由于在制度实施过程中欠缺对宪法批评权利的价值关怀,其可能也会造成“制度规定的潜在缺陷”被利用和放大,从而给被批评的国家工作人员干预司法提供了便利条件,导致“诽谤罪的现实运作妨碍了批评权利发挥其应有的宪法价值”^[18]。事实上,在不当外力干预

下,因公民批评引起的诽谤案特别是“诽官案”,如“王帅帖案”“吴保全案”“王鹏案”等,均不同程度地存在滥用职权以刑事公诉手段打击“批评者”的现象,在诸多复杂成因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客观因素就是“制度规定的潜在缺陷”。

从立法精神而言,限制性规定网络诽谤罪公诉适用情形,有利于保护普通网民的合法权益,更好平衡网络主体间的法律关系。值得注意的是,经最高检介入、引发诽谤案“自诉”转“公诉”大讨论的“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出轨诽谤案”^①,写进了 2021 年全国“两会”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在当前网络暴力日益严重的形势下,本案启动公诉程序追究“诽谤者”刑事责任,对全社会具有积极、正向的标杆作用,也为检察机关对于自诉转化为公诉案件的法律监督提供了一个范例。^[19]本案处理从行政处罚到刑事自诉再到刑事公诉的逐步“升格”,使其成为彰显网络时代惩处侮辱诽谤类犯罪司法动向的最新案例,值得高度重视和研究。^[20]这种功能需求导向下的刑法扩张逻辑,是现阶段调和传统刑法体系与新型网络犯罪之间的主要载体形式。倡导适度的刑法扩张适用逻辑,反映了现行刑法合理扩大法益保护范围和对象的基本立场,以及切实保障网络空间安全的“积极预防姿态”。^[21]

从世界范围来看,诽谤法日益偏向保护个人名誉权,而不是维护公共秩序。为防止公权力对公民表达权利进行不当干预,欧美许多国家和地区掀起了“诽谤罪除罪化”运动,主要通过民事赔偿的方式追究诽谤者责任。根据国际人权组织提供的资料,有些国家的刑事诽谤法退出了历史舞台,还有些国家和地区虽保留诽谤罪的法律条文,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很少适用,基本属于“纸面上的法律条文”。^[22]基于此,有学者主张以不同方式取消诽谤罪公诉例外情形。为防止造成刑法体系内部的混乱与冲突,诽谤罪只规制侵犯公民名誉权和其他个体法益的危害行为,故可删除现

①2020 年 7 月初,杭州市谷女士在小区门口驿站取快递,被隔壁便利店老板郎某偷拍。郎某与朋友何某分别饰演快递小哥和对面小区独自在家带孩子的“小富婆”在微信上聊天,编造了“富婆出轨快递小哥”的剧情。最高人民检察院建议当地公安机关对“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案”立案侦查,推动刑事自诉案件转为公诉。2021 年 4 月 30 日,余杭区人民法院以诽谤罪判处被告人郎某某、何某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有诽谤罪“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规定，对于诽谤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情形，以我国《刑法》分则第一章、第六章相关罪名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3]为防止立法保护过当，中国大陆刑法应借鉴他国刑法的规定，对诽谤罪提起公诉设定严格条件，在条件成熟时逐步取消公诉诽谤罪。或将“诽谤罪”规定为纯正亲告罪，直接取消公诉追诉模式。^[24]

网络传播具有虚拟性、弥散性、海量性特点，使得刑法制裁网络违法信息面临被动、滞后等诸多难题。从治理重心和发展趋向来看，刑法介入网络信息治理将从内容规制转向平台规制。网络服务提供者是网络空间信息传播的“集散地”与“中转站”，管住了作为中介平台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很大程度上则犹如遏住了网络信息流通的“咽喉”。基于此，很多国家逐步加大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刑法规制力度，以求达到“一两拨千金”之效。我国《刑法修正案（九）》增设“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罪名，即属此种立法思路的体现。

网络服务提供者主要分为网络内容提供者和网络平台提供者。网络内容提供者的主体责任比较清晰，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的权责边界则相对不甚明确。如何界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平台责任已成为网络立法的重点和难点。总体而言，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权重应与其承担的角色功能相匹配。如何适当配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权责结构，将影响乃至决定网络空间法律体系的价值面向和基本架构。互联网立法不是在空白起点上重起炉灶，更多是对传统法律的合理延伸和充实完善。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新的法律主体的出现，是推动互联网立法的重要动因，而立法的重点则是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权利和义务进行合理配置。由于治理模式和社会环境不同，各国法律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权责配置表现出一定差异，然其在互联网法律体系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大应是共同趋向。

权力与责任是对等的。不断崛起的网络平台已成为数字化社会的运行枢纽。随着网络服务提供者掌握的权力资源不断扩展，相应加大对其实行法律约束理属应当。在实践中如何做到权责结

构动态平衡，是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有效治理的关键。如若政府对于算法运作过程的治理失灵，从制度成本上将强烈刺激平台企业的机会行为，由此可能产生诸多社会负外部性问题。“平台既是一个市场，又是一个企业”，这种独特的组织结构“至少在人类商业文明发展史上未曾出现过”。平台具有双重属性使其难以找到市场公共利益与企业私人利益的平衡方案，这是平台治理遭遇困境的根源。^[25]内容中介已经成为威胁网络空间治理的重要主体，在控制网络信息流动及决定用户获取信息范围方面掌握了大量实权，而它们对流经其平台的信息却又往往享有豁免权。^[27]与此同时，政府限于多种原因难以对互联网做到精细化管理，更多地只能借助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中介力量，尝试进行间接控制。在这种治理格局中，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实际上能够发挥裁判乃至替代性决策的作用。网络服务提供者是网络空间信息流动的“守门人”，在网络空间治理体系中占有重要主体地位，它有能力也有义务对其平台上所产生的犯罪风险进行前置性防控，这是网络平台提供者承担主动审查义务的正当性根据。^[28]

从预防和控制犯罪来看，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入罪化无疑切中要害。随着传统犯罪的网络异化和新型网络犯罪的高发，刑法评价和制裁的重心由单一的行为人责任转向行为人和平台责任并重，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刑事责任认定成为网络空间治理不容回避的关键问题。^[29]另一方面，从互联网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来看，普遍倾向于最大限度降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以充分保障网络平台和网络主体的自由空间。在多元化的网络时代，要求企业履行“网络警察”的义务，这种社会分工的错位，最终可能会阻碍甚至窒息整个互联网行业的发展。^[30]如此看来，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规定不仅在我国属于突破性规定，在其他大陆法系国家也无先例，自该罪增设以来如何对其不作为性质进行阐释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31]面对网络犯罪多发态势，对提供平台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犯罪化未必是“全面处罚的故意”，但其中形成的“共犯正犯化的处罚逻辑”与“偏向刑事化判断的思维

逻辑”，多有违背罪刑法定的法治原则。^[32]从实际情况来看，立法意图和现实结果之间出现了较大偏差。有学者统计，截至2019年9月27日，以“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为关键词，在文献数据库仅检索到3份相关刑事判决书。尽管可能存在想象竞合而择其他重罪论处的情形，仍不能否定本罪适用率过低的现实。由于“责令改正而拒不改正”的构成要件设置了过高的入门槛，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在司法实践中不仅不存在“处罚范围过大”的问题，更有“被弃用的风险”。^[33]由此可见，此罪名设置虽存在象征性立法的倾向，另一方面通过司法限缩的方式与立法扩张达到平衡，亦是总体实现刑法谦抑性的有效手段。

如何认识和界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是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能否发挥实效的基本前提。我国法律包括刑法尚未对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进行明确规定，而是将该义务导向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其更多表现为一般性、抽象性的义务规定，存在“缺乏明确性、系统性和类型性”的问题。^[34]采取需事先经监管部门责令改正的立法模式，表明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存在限制刑罚发动的初衷，而不时发生的“滴滴平台司机强奸杀人案”^①等恶性事件，折射出该罪名导向的平台治理模式已显得力不从心，甚至可能滋生“行政权僭越并排斥司法权”的不良风气，使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处于“被架空的尴尬境地”。为合理化解“刑罚制裁具有行政从属性”带来的现实隐忧，应实现网络平台信息安全管理义务的适度前置。^[35]不过也有学者从相反角度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应承担过重的注意义务及刑事责任。与其他国家相似，我国在处理网络服务提供者刑事责任问题时采取了激进的立场，在缺乏保护规则的情况下，处理网络服务提供者刑事责任问题“更倾向于惩罚而非保护”，致使刑事责任的扩张超出了合理界限。基于权益保护和利

益平衡的原则，首先应免除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一般性监控义务，同时为避免立法上的失误和不足，应采取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实施有条件免责制度。^[36]

网络服务提供者权责认定的模糊性和变动性，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快速发展存在较大关系。如何基于技术条件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类型进行科学划分，进而准确把握每种类型特质及其角色功能，是当前刑事立法和司法面临的较大难题。中国应当积极借鉴吸收德国与欧盟的有益经验，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类型划分并以此明确各类提供者的责任。否则，在可预见的未来会遇到越来越多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刑事责任认定难题，中国将面临着立法粗疏与理论空白的双重困境。^[37]立法技术的科学化和精细化，有利于合理区分不同类型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刑事责任权重，对于整体提升网络法治化水平大有裨益。

四、关键在于回归传统刑法观

刑罚正当性（legitimacy）的说明和论证，是刑法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合理区划刑法介入网络空间边界是保障刑罚正当性的重要手段。刑法边界主要是限制刑法扩张的手段，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立法层面的刑法禁止。即必须严格遵守罪刑法定的原则，不能轻易以司法解释、类推乃至以权代法等手段突破罪与非罪的边界。二是司法层面的刑罚禁止。这主要是限制刑罚权的启用程序及范围，以防止刑罚权的滥用或过度使用。

高风险社会的来临加剧了法律价值的分化与冲突，化解刑法安全边际压力的根本之策是回归刑法传统法益观。现实中出于某种功利化需求，刑法法益不时呈现抽象化、空幻化、扩张化的倾向，主要表现在抽象的社会法益（公共秩序）与观念法益（社会危害性）取代具有明确指向性的个体法益，成为刑法重点保护乃至优先保护的對象。因而，要恪守刑法介入网络信息治理的边界，最根本的是收缩和回归刑法传统法益观，即强调保护具体的、实际的法益，使刑法切实成为“法

①类似案件有“深圳女教师乘坐顺风车被害案”“5·6 郑州空姐打车遇害案”等。遭人诟病的是，在这类案件中，平台提供者往往以安全专家介入、保护隐私为由拒绝向受害者家属提供司机车牌号、手机号，最终因错失时机而导致悲剧出现。如何从法律上明确规定网络中介平台的权责边界，成为日益紧迫的社会问题。

益保护法”，而不能演变为“风险防控法”乃至“行政管理法”。

辩证、理性地看待网络违法信息传播的“风险”或社会危害性，是把握刑法介入网络信息治理尺度和方向的基本前提。任何社会都难以避免风险，只要将风险控制在社会承受范围内，适当的风险不但无甚大碍，反而可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处处力求消除风险的社会，其结果只能是停滞不前。刑法不能简单地以风险的最小化或根除风险作为追求目标。^[39]互联网是发展中的新事物，刑法介入网络空间不能为了片面追求“安全”而盲目简单地将“根除风险”作为行动目标。某种层面上，面对来自风险社会的挑战，刑法的积极前伸反而是凸显了国家治理能力的不足。对于强健的法治社会而言，谦抑性并不意味着刑法的软弱，而是更能彰显刑法的刚性有力。只有严守“不作为”之界，才能最大程度提高刑法“作为”的效率与层级水平。这是提高刑法权威性与威慑力的根本之策。滥用刑法带来的各种形式的暴力，只能引发更大的抵抗与混乱。与此同理，刑法过度介入网络信息治理可能造就更大的信息真空乃至“信息黑市”，从而引发更大范围、更大程度上的网络社会秩序混乱。

回归刑法传统法益观首要在于以人权保障为原则，最大程度实现刑法的谦抑性。刑法谦抑性的本质在于如何确定刑法对社会的介入程度，即如何在国家与国民之间适当分权，找到平衡点，使得国家与人民两受其利。^[40]以法律限制国家刑罚权，是保障个人自由的重要手段。“为了惩罚而惩罚”的刑法实践和“为了惩罚而解释”的刑法学研究，实质上都是漠视权利的表现，应当提出以权利来制衡刑罚权，如此才能去实践正义，而非标榜正义。^[41]由此而言，刑法介入网络空间信息治理不能以压制和剥夺人的基本权利和基本需要为代价。人类社会对于互联网的基本需求，是对于表达自由基本权利的追求和向往。为充分发挥互联网之于人类社会的积极价值，刑法介入不能悖逆“人心”所向，这个最大的“人心”就是广大网民寄托于网络空间的基本需求和基本权利。“人心”之基愈稳，网络空间发展动力愈足。

任何法律行为都是价值权衡的结果。恪守刑法介入网络信息治理的边界，重在对其关涉核心价值的考量与平衡。刑法介入网络信息治理关涉三大核心价值：网络秩序、信息安全与表达自由。我国《网络安全法》第十二条提出“保障网络信息依法有序自由流动”，这为刑法介入网络信息治理确立了基本原则，即在依法保障网络信息传播规范有序的基础上，刑法介入应以促进网络信息自由流动为旨归。既不能以失序为前提而追求过度的自由，又不能为了达到高度有序而以丧失自由为代价。刑法重在维护“基本底线”，对于批评、建议的网络言论，即使有部分内容失实、评论偏激，也应保持司法克制。^[42]如何认识和处理秩序（安全）与自由的关系，是刑法介入网络信息治理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在实践中如何做到两者之间的动态平衡，考验的是立法者和司法者的智慧与担当。

从法律结构层面而言，恪守刑法介入网络信息治理的边界需处理好刑法（秩序和安全）与宪法（言论自由）的关系问题，一大原则是刑法介入不能突破宪法界限。在网络信息传播和言论型犯罪案件中，行政权力是刑罚权启用的主要动力。在中国特殊国情下，确立刑法介入网络信息治理的边界，行政权力行使的规范程度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这包括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如何认识和调试行政权在网络空间权力结构中的角色功能，二是如何权衡和处理行政权与立法权、司法权及公民权（表达权、知情权、批评建议权）之间的关系。刑法介入网络空间信息治理应体现或凝聚最大化的公共利益，而不是为了实现特定“少数人”之“特定目的”。^[43]这要求刑法介入必须符合正当法律程序，更不能“公”权“私”用，演变为“管控不安全性”的器用工具。

在司法实践中要防止刑法过度介入网络空间信息治理，必须以现实危害性作为社会防卫的主要价值导向。刑事制裁的重点对象是现实世界中发生的实际行为，通常只有当网络世界中的虚拟“暴力”确实造成了现实社会中“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才能动用刑法手段，而要判断是否构成“严重混乱”，这种危害必须是清楚的或即刻发生

的,而不是基于办案人员的主观猜测、想象或恐惧。司法机关在指控公民网络言论构成“寻衅滋事罪”的时候,一定要提出能够证明有关言论确实造成现实公共场所发生混乱的具体证据,以免导致公权力滥用和腐败。^[43]

从法律制度层面而言,要从根本上遏制刑法介入网络信息治理的冲动,关键在于合理设置网络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使主体间权责平衡、边界清晰,做到相互依托和相互制约,从而避免单一主体权力过于膨胀而带来的为所欲为。作为制度安排的最优目标,“权责一致理论”以确定性和规范性成为国家治理的核心工具。当然现实具有高度复杂性,非人格化组织的理论预设难以简单适用于具体行政实践,当对效率的追求占据主要位置时,组织就会寻找替代性机制来实现利益最大化。^[44]刑法介入网络信息治理不时存在突破边界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权力溢出效应带来的对于“效率”价值和特定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而选择的“替代性机制”。

五、结语

我国网络信息治理采取的是“谁主办、谁负责”的层级治理模式,总体仍难以完全脱离传统媒体管理的思维和理路。抛开意识形态属性之争,网络治理模式本无所谓优劣之分,关键在于能否促进互联网更好地造福人类社会,最大程度提升广大网民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客观而论,我国传统观念中的重刑思想,对网络秩序价值的优先追求,网络治理的行政主导模式,都是推动刑法介入网络空间信息治理的文化制度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探究刑法介入网络信息治理的背景、路径与边界,无疑是个凸显中国视角的全球性问题。

为更好地将互联网发展由“最大变量”转化为“最大增量”,网络信息治理需要树立新理念,探索新模式。中国正致力于从互联网大国向互联网强国迈进。互联网强国之“强”,不能单用体量来指代,其更多体现于互联网制度和文化层面。为不断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中国政府在《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意见》中提出,

到2035年,基本形成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相适应,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基本形成全社会“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加快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内容,网络空间法治化的最终目标是在网络空间培育和促长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最终形成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相适应的网络法治环境。网络信息治理不仅要做到治而有“理”,更要做到治而成“理”。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本文正是旨在探寻和总结蕴含在网络空间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中的“理”,以此更好规范网络信息治理的刑法介入行为,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治理制度与文化。

参考文献

- [1]陈杭,袁秀月.北京警方已查处涉疫情谣言案件27起[EB/OL].(2020-02-27)[2021-04-28].中国新闻网,https://www.chinanews.com/sh/2020/02-27/9106732.shtml.
- [2]于志刚.全媒体时代与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制裁思路[J].法学论坛,2014,29(02):92-100.
- [3][25]孙煜华.网络诽谤罪司法解释的合宪性审视[J].中国法律评论,2015(04):126-136.
- [4]张卓,王瀚东.中国网络监管到网络治理的转变——从“网络暴力”谈起[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4(01):88-91.
- [5]郑智航.网络社会法律治理与技术治理的二元共治[J].中国法学,2018(02):108-130.
- [6]张文祥,周妍.对20年来我国互联网新闻信息管理制度的考察[J].新闻记者,2014(04):37-46.
- [7]于志刚,郭旨龙.网络恐怖活动犯罪与中国法律应对——基于100个随机案例的分析和思考[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5(01):11-20.
- [8]何荣功.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的法哲学批判[J].中外法学,2015,27(02):523-547.
- [9]刘艳红.象征性立法对刑法功能的损害——二十年来中国刑事立法总置评[J].政治与法律,2017(03):35-49.
- [10]周光权.积极刑法立法观在中国的确立[J].法学研究,2016,38(04):23-40.
- [11]卜思天·M.儒攀基奇.刑法:刑罚理念批判[M].何慧新,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2.
- [12]杨蓝.浅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网络信息的刑法规制[J].法治与社会,2016,17(06)(中):78-79.
- [13]尹培培.“转发500次入刑”的合宪性评析[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04):154-160.
- [14]李晓明.诽谤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不应由他人的行为来决定——评“网络诽谤”司法解释[J].政法论坛,2014,39(01).
- [15]杨柳.“诽谤信息转发500次入刑”的法教义学分析——对“网络诽谤”司法解释质疑者的回应[J].法学,2016(07):

137-143.

[16]刘期湘.人工智能时代网络诽谤“积量构罪”的教义学分析[J].东方法学,2019(05):127-132.

[17]冯建华.网络谣言入罪的尺度与限度——以风险刑法为分析视角[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27(02):5-24.

[18]侯健.诽谤罪、批评权与宪法的民主之约[J].法制与社会发展(双月刊),2011,17(04):148-160.

[19]樊崇义.诽谤罪之自诉转公诉程序衔接——评杭州郎某、何某涉嫌诽谤犯罪案[N].检察日报,2020-12-28(3).

[20]刘仁文.依法惩处网络诽谤强化公民私权和公共利益保护[N].检察日报,2020-12-28(3).

[21]孙道萃.民法典时代网络诽谤案件的刑法应对[N].检察日报,2020-12-28(3).

[22]郑文明.诽谤的法律规制——兼论媒体诽谤[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77.

[23]金鸿浩.论互联网时代诽谤罪的公诉范围[J].政治与法律,2021(03):149-161.

[24]张海梅.诽谤罪之检视[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36(05):131-134.

[26]张兆曙,段君.网络平台的治理困境与数据使用权创新——走向基于网络公民权的数据权益共享机制[J].浙江学刊,2020(06):38-47.

[27]劳拉·德拉迪斯.互联网治理全球博弈[M].覃庆玲,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178-179.

[28]敬力嘉.论拒不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以网络中介服务者的刑事责任为中心展开[J].政治与法律,2017(01).

[29]于冲.“二分法”视野下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作为的刑事责任划界[J].当代法学,2019,33(05):13-26.

[30]车浩.谁应为互联网时代的中立行为买单?——中国法律评论,2015(01):47-50.

[31]王肃之.论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的不作为性质[J].南大法学,2020(03):95-111.

[32]徐远太,陆银清.网络服务商中立行为犯罪化及其限度——兼议《刑法修正案(九)》第二十九条[J].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6(02):3-13.

[33]邱陵.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探析[J].法学杂志,2020,41(04):62-71.

[34]童德华,马嘉阳.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之“义务”的合理性论证及类型化分析[J].法律适用,2020(21):79-93.

[35]陈伟,石莹.网络平台安全管理义务的归责反思及其重塑[J].理论探索,2019(02):100-107.

[36]孙禹.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保护规则——以刑事责任的限制为视角[J].北方法学,2019,13(02):135-148.

[37]王华伟.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刑法责任比较研究[J].环球法律评论,2016,38(04):41-56.

[38]劳东燕.公共政策与风险社会的刑法[J].中国社会科学,2007(03):126-139.

[39]刘媛媛.刑法谦抑性及其边界[J].理论探索,2011(05):134-137.

[40]时延安.刑罚的正当性探究——从权利出发[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16(02):58-68.

[41]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三庭编著.网络犯罪司法实务研究及相关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4:154.

[42]冯建华.试论网络传播秩序治理的刑法界限[J].新闻大学,2020(11):37-49.

[43]张千帆.刑法适用应遵循宪法的基本精神——以“寻衅滋事”的司法解释为例[J].法学,2015(04):3-9.

[44]倪星,王锐.权责分立与基层避责:一种理论解释[J].中国社会科学,2018(5):116-135.

The Background, Path and Boundary of Criminal Law Intervening in Network Information Governance

Feng Jianhu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growth and spread of illegal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criminal law intervention in network information governance is not only necessary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but also an urgent need. It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evolution of the nature of cyber crimes and the rise of risk criminal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ep motivation, it responds to the huge pressure brought by the transformation of cyberspace communication. It is also related to the network governance model and the power mechanism behind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ance focus and development trend, the involvement of criminal law in network information governance will shift from content regulation to platform regulation. To prevent criminal law from overly intervening in network information governance, the key is to return to the traditional criminal law view. To this end, it is necessary to properly handle the propor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rights in cyberspace, and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a mutually dependent and restrictive cyberspace power structure.

Keywords: Network information governance; Risk Criminal Law; Network Defamation; Provocation and Provocation; Network Order

Author: Feng Jianhua,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Press.

早期中国互联网的技术隐喻与话语实践 (1987–2003)¹⁾

陈彦蓉 曹钺

摘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早期中国互联网超常规规模的创新扩散一直是西方学界津津乐道的议题。不同于传统上聚焦互联网接入与使用情况的测量,本文从认知语言学“隐喻”的视角切入,将技术的创新扩散视为一种意义整合的社会过程,并围绕特定事件与案例重访了1987–2003年间关于中国互联网的历史叙事。研究发现,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生成出诸如“盗火”“信息高速公路”“知识英雄”“第二人生”“广场”“江湖”“家园”等多种隐喻。其背后是国家政府、市场经济、网民群体、国际势力等多元行动者在具体历史语境下的复杂互动,并且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纽结点”缝合了诸隐喻之间的裂痕与间隙,使隐喻体系保持了整体的连贯。以上也揭示出早期中国互联网在全球与本土、国家与社会、集体与个体之间所形成的微妙平衡以及其历史意义。

关键词 互联网史;隐喻;话语实践;多元互动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陈彦蓉,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重庆401331;曹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学者,上海200433

一、中国互联网史研究与技术隐喻的视角

互联网历史学(Internet Historiography)是一项新兴的研究领域,它旨在考察互联网这一媒介自身的演变,以及互联网与社会互动的历史。就后一维度而言,其研究主题包括互联网在特定社会扩散的社会史、商业史、政治史以及文化观念史。^[1]2015年以来,互联网史研究的勃兴首先凸显了其反思性特质:一方面,过去的事件、结构、社会现象以及意义感受构成了阐释当代互联网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对早期互联网发展机制的批判性认识亦能反映出如今数字社会的差异。^[2]其次,从在地经验的层面发掘不同历史社会语境下多元、复数的互联网意涵,并超越美国主导的单一叙事的主张已被反复强调。^[3]

作为一个在二十余年里便成长为世界网民数量之最的国度,中国互联网超常规规模的创新扩散无疑构成了上述“在地经验”的重要例证。事实上,西方学者在研究该问题时因长期过分聚焦新技术与中国政治之间的张力,而忽视了更为宽广的社会文化领域。^[4]埃弗雷特·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曾指出,创新扩散的本质是人们对新事物主观评价的交互的社会历程。一项新技术纵然具备明显优势,想要让大众在观念层面认可它也绝非易事。^[5]传统上的创新扩散研究主要针对互

1)基金项目: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留金选[2020]101,编号:202006100067);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网络社群在维权事件中的话语实践与动员策略研究”(CYS19030)。

联网接入与使用的情况进行测量,但这种工具论导向的做法难以揭示意义建构的社会过程。

本文认为可以从认知语言学的“隐喻”(metaphor)概念出发,另辟蹊径来阐释中国互联网的创新扩散进程。从最一般的意义上,互联网是我们社会系统里的新生事物,除专业人员之外鲜有人理解其技术实质——掌管所有计算机之间通信的TCP/IP协议。而隐喻使人们能用一种具象化的事物来理解抽象、难懂的新事物,而不必把两者看作是客观上相同的。^①像“电子邮件”“桌面”“回收站”“网上邻居”“聊天室”这样的计算机术语都带有隐喻的性质,它们在向初学者普及计算机功能时非常有效。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认为,隐喻并不止步于描述,它构造了人类的概念系统,而概念系统则定义了人们所能看到的现实,因此我们须通过隐喻来理解现实。一个新隐喻有能力改变特定社会中人们的知觉、行为和实践,进而创造新的现实。^②例如,“时间就是金钱”便是新教伦理召唤出来驱动整个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发展的强大隐喻。另外,隐喻对概念的建构永远是片面的,当它凸显了某个部分的同时必然遮蔽了其他部分。^③例如,“争论是一场战争”的隐喻强化了非此即彼的输赢性,而忽视了争论亦可能带来相互理解。所以,不同社会群体会建构不同的隐喻以推动自己对于未来的兴趣与期望,隐喻的编织总是涉及场域内多元行动者的博弈。

总之,隐喻可以被视为社会意义建构与协商的过程,正是在一种模棱两可的情境中新的经验被命名和定义,由此塑造了它与我们之间的互动。而这又反过来推动新事物被社会系统所组织化、政策化,互联网也是这样从抽象陌生的事物变为我们现实生活中所熟悉之物,从而嵌入社会肌理

的。^④由此观之,中国互联网的创新扩散可以被看作不同社会行动者想象、建构互联网并生成话语实践的过程,其中往往包括国家政府、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国际力量等要素的互动。^⑤而对于隐喻的分析不仅能梳理不同语境下“互联网”的观念如何变动,即描述意义上的“是什么”;并且有助于揭示为何不同行动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互联网”想象成这样,即对规范意义上“应该是什么”的反思。

具体而言,本研究试图从早期中国互联网的历史叙事中寻找相关的技术隐喻并加以分析。之所以聚焦“早期”(early times),是因为这期间互联网隐喻的变化最为剧烈,它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悬而未决的社会经验与概念表达之间的张力,即威廉斯所谓的“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⑥“早期”在此尚是一个模糊的指涉,限于文章篇幅,我们仅对1978-2003年的中国互联网史进行爬梳^⑦,其时代背景可归纳如下:(1)技术上Web1.0的连接模式占据主导,并呈现出“内容网络”的组织逻辑^⑧,BBS、门户网站等是主要应用,网络内容以文字为主,人们普遍采用窄带上网的方式;(2)治理上政府总体对互联网的发展保持着宽松的态度,监管程度不高^⑨;(3)网民结构处于创新者向早期采纳者过渡阶段,上网人数尚不及总人口数的10%,其中经济收入尚可、学历在高中至大学的青年男性构成了主力军,且上网地点比较固定^⑩。

在研究方法与操作上,本文将以开放的态度采撷史料语篇,其中既包括学术专著、畅销书、党报、都市报,以及《互联网周刊》这一类专门记录互联网发展的刊物;还囊括了对不少业已消逝的旧网页的回溯,互联网时光机(wayback machine)为此提供了珍贵的数字档案备份^⑪。此外,口述

①若以多元互动模型来分析中国问题,这几个行动者是经常出现的要素,本研究在此借鉴了杨国斌在《连线力》第8-11页的描述。

②本文将历史分期视为一种使研究更具操作性的策略,而无意于辨明具体时间节点的选择。根据方兴东、彭兰、杨国斌等学者的相关研究,1978-2003这15年更趋向于是“早期互联网”阶段的一个子集,当然它也有其特殊性,并且能更清晰地展现所谓“早期”的特质。

③以上概括根据CNNIC第13次统计报告分析所得。

④互联网时光机是一个借助“爬虫索引”和志愿者工作捕获全球各类网站快照,并存档缓存网页的数字档案馆。它旨在通过保存已失效网页的存档副本以“普及所有知识”,其网址为:https://web.archive.org/。

史、回忆录之类的文章亦被视为补充性的材料。鉴于史料庞杂,在写法上本文将围绕特定的事件、案例展开分析,因为互联网事件、社会观念以及变化都是在现实社会和社会关系的框架中发生、发展并完成的,事件史与观念史本就存在同构、互塑、共变的关系。^[13]

二、“盗火”的史前史：冷战疑云下的科学共同体话语

许多学者都将1994年视为中国互联网起航的节点,因为这一年中国国家计算机与网络设施(NCFC)通过美国Sprint公司连入互联网,从此中国被正式承认为世界上第77个真正拥有全功能互联网的国家。^[14]不过在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编纂的“互联网大事记”栏目以及官方牵头建立的“中国互联网博物馆”页面上,以下事件被放到了开端的位置:1987年9月20日,王运丰和李澄炯在卡尔斯鲁厄大学维纳·措恩(Werner Zorn)教授的帮助下成功向德国发送第一封电子邮件,内容为“Across the Great Wall we can reach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 (越过长城,走向世界)”。如果说中国互联网的正式始于1994,那么可追溯至80年代的这段“史前史”同样不容忽视,因为它最鲜明地展现了中国如何突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阵营的技术封锁,冲向世界互联网的怀抱。

中国接入互联网的历程首先充满波折,它是一系列偶然因素叠加的后果,同时也彰显了关键行动者的重要贡献。回到20世纪80年代冷战的语境下,彼时中美仍因意识形态分歧充满嫌隙,计算机就在美国对华禁售的名单之列,西欧诸国也受巴黎统筹委员会的限制,拒绝将信息产业的器材、高端设备出口中国。不过德国并未有此限制,因此中国互联网的连接尝试始于与德国科学家的合作。卡尔斯鲁厄大学维纳·措恩教授是中-德计算机网络连接和电子邮件服务设想的发起者,他不仅凭私人邮件争取到了项目的经费,而且利用德国的可兼容系统软件解决了中方计算机与国际网络互联、发送电子邮件的技术性问题。^[15]不过第一封电子邮件的成功发送只是起步,它还需要获得美国方面的许可。而白宫的宣布是“中国开

放电子邮件连接”的许可无效,但时任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主任的Steven Wolff坚持了“政治归政治,学术归学术”的立场,从而使中国进入互联网成为一种既成事实。^[16]在中国寻求全面接入互联网的过程中,同样克服了许多困难:其一是科研经费上的不足由国务院破例为NCFC项目(中国国家计算机与网络设施)开放了信道租用;其二美国政府方面的阻挠也出现转机,1994年互联网正由国防部资助、国家科学基金会控制转向全面的商业化,时任NSF主任的尼尔·莱恩知道互联网已管不了多久,于是同意让中国科学院接入进来。^[17]

其次,以上偶然性之中又暗含着某种必然性,即科学共同体话语对冷战话语的突围。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成功发出的一周后,作为外宣渠道的ChinaDaily刊登了消息:“中国与世界10000个大学、研究所和计算机厂家建立了计算机连接。这个连接通过北京与卡尔斯鲁的两台西门子计算机实现。王运丰教授把这一成果描述为中国大学和研究所与世界计算机网络一体化的技术突破,在卡尔斯鲁大学教授维纳·措恩指导下完成,技术团体由来自北京计算机应用研究所、卡尔斯鲁大学、西门子公司和美国的科学家们组成。”^[18]这一叙事无疑迎合了全球互联网跨越意识形态边界的诞生语境。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曾谈到,互联网的两大起源——军事建制机构与个人电脑的反主流文化——其共通的基础正是大学世界。^[19]1994年在中国政府大力支持下,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加州斯坦福现行加速器中心、德国科研网、中国科研网、清华校园网、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等研究机构迅速建立起了科学互联的网络。^[20]Jay Hauben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也谈到,“大量证据表明互联网从伊始就是开放、国际性的科学合作工程,它以向人类社会提供新型通信系统为愿景……将其视为冷战时期美国军方副产品的说法只是美方编织的迷思”^[21]。

互联网在中国的降临常被后世以“盗火”隐喻,它象征着从禁忌中解放出来的知识和智慧,以及颠覆现状的技术精神、政治力量和艺术灵感。^[22]放置于上述互联网史前史的语境中,“盗火”既暗

示了新技术的接入充满艰辛，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又象征着崇高的事业，凸显了冷战末期自由、包容、开放的诉求已深入人心。值得注意的是，“盗火”也隐喻了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微妙关系，前者须突破封锁进而借得“火种”。在之后博客、字幕组等网络实践中，“盗火”的隐喻亦频频出现。^①而“越过长城，走向世界”亦兼具了世界主义理想与民族复兴的夙愿。“长城”作为闭关锁国、导致屈辱近代史的符号被新技术所逾越，而人们迈向的“世界”与80年代后改革开放的浪潮紧密相交。“火种”一旦播撒开去，就注定会生成无法预料的所指，它们将伴随中国社会的互联网实践一同演变、生长。

三、“信息高速公路”：国家现代化与市场经济的共谋

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提出“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 superhighway）计划以推动互联网的商业化进程。简言之，这是一项由国家牵头建设的信息基础设施，它通过光纤和电缆把政府机构、科研单位、图书馆、大学、企业以及家家户户的计算机连接起来，使所有电子终端能方便地传递和处理信息，以实现信息资源共享。^②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信息高速公路”是一种管道隐喻（conduit metaphor），互联网被设想为从A点向B点传输信息的工具，因此其“速度”是隐喻建构者关注的重点，而“高速公路”也正是针对90年代窄带上网的“羊肠小道”而提出的。其次，这一基础设施的隐喻也暗示了国家政府的管辖权、专家团队的规划与掌控，似乎一切都在项目蓝图之中。此外，“信息高速公路”调用了日常生活中关于交通行驶的意义系统，即使对互联网陌生的社会大众也容易形成共鸣。

中国政府很快接纳了“信息高速公路”的隐喻。在全面接入Internet仅仅两个月后，国务院办公厅便向各部委、省市明传发电开启“三金工程”^③建设的序幕，这便是中国版的“信息准高速国道”。同时，官方媒体也积极向民间普及“信息高速公路”的意涵。^④并且，这种接纳并不止步于挪用，它更具本土化的意义是引出了“弯道超车”这一隐喻。上世纪90年代，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第三次浪潮》一度畅销，在他看来，信息化是自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后第三次颠覆社会结构、国际局势的大革命。^⑤“浪潮”所隐喻的“断裂”恰被视为一次机遇——“如果把中国的传统产业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视为‘百步’的话，那么中国在信息产业特别是互联网的建设上与他们的差距可能仅有‘十步’之遥”^⑥。《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同样谈到：“信息技术和信息化手段是经济发展的倍增器。谁先掌握它，谁就会先获得经济发展的加速器……抓住信息产业这个社会进步过程中的先导产业，充分发挥其倍增作用，我们就能很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否则，我们将被越甩越远。”^⑦

而把握信息技术进而赶超西方诸国的关键在于发展“知识经济”。Markham认为，知识教育与信息传递共享了传者将内容通过某一渠道送到接受者的“管道隐喻”，因此互联网时代某种意义上就等同于知识时代，它可以极大地简化人们获取知识的过程。^⑧1998年中国科学院刊发了重要文章，指出信息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将是21世纪经济发展的主导形式，而国家在技术、知识上的创新能力与民族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⑨为此，经济体制改革被要求面向信息化社会调整管理结构，信息产业被允许横越部门分工的业务面，突破过去的条条框框。^⑩而政治监管也让位于科技商

①可参见方兴东、王俊秀的著作《博客：e时代的盗火者》以及南风窗的报道《“盗火”的字幕组》。这实际上预示了中国的不少互联网实践源于对西方互联网产品的借鉴、模仿与搬运。

②包括金桥、金关和金卡工程，其中金桥网与老百姓享受互联网的体验最为密切，通过金桥网，中央与地方政府、城市、大中型企业、重要企业集团以及国家重点工程相联结，最终形成电子信息高速公路大干线，并与全球信息高速公路互联。在建设初期，只有部分机关事业单位、行业企业内部人员能接入这种网络。

③1993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便刊载了新华社的电讯以简要介绍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1994年7月，《人民日报》又分四次刊登了新华社驻外记者姜岩漫谈信息高速公路的四篇文章，内容包括对建成后未来生活的畅想、世界各国建设措施的介绍、该工程对教育、医疗、传媒、就业等领域的重大影响，以及当前建设面临的难点，表明了“任重道远”之意。

业的发展。1994–1995 年间鲜有内容监管的政策出台, 由于对互联网的功能及未来效应尚缺乏了解, 政府基本采取了放任自由的态度。^[30]“这种结构性调整的结果是创造了一个非比寻常的商业环境, 以至于当年的创业者回忆起这段历史时, 有人把它比作伍德斯托克, 有人回忆起从未有过的自由、无限制的环境, 有人赞美财富的积累有了全新的方式。‘勇气’‘坚持’是最常被提到的词汇, 甚至超过了‘理想’。当然还有, ‘运气’。”^[31]

彼时发展知识经济的典型案例当属张树新创立的瀛海威公司, 其中文名取自“Information Highway”的谐音。瀛海威的性质是民营网络服务提供商 (ISP), 为社会各界用户提供包括 BBS、聊天室、电子报纸在内的网络服务; 他们还在北京开设第一家民营科教馆, 免费宣传互联网知识。1996 年 10 月, 瀛海威在中国科学院网络中心附近树立了一个巨大的广告牌, 上面写着“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 ——向前一千五百米”。这块广告牌不仅形成了广泛的宣传效应, 使瀛海威几乎成了“Internet”的代名词^①, 而且塑造了中国互联网史上的一个纪念性事件。可以说, 它激活了“信息高速公路”隐喻中的民族国家意识, 在促进启蒙网络知识的同时, 鞭策着每个中国人——发展互联网经济是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夙愿。总之, “信息高速公路”这一隐喻正是经由瀛海威的商业实践, 才使互联网从一个陌生的技术概念逐渐渗透到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的。

瀛海威之后, 互联网创业的“弄潮儿”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推动了中国第一波互联网经济热潮的到来。当时并称为“网络三剑客”的张朝阳、王志东和丁磊都从他们所创立公司——搜狐、新浪、网易的幕后走向台前, 推动了“知识英雄”话语的扩张。当代商业史的书写凸显了他们发迹历程的“去体制化”色彩, 如张朝阳的海归背景

与反叛色彩, 王志东技术极客的才华, 以及丁磊从“铁饭碗”的电信局辞职南下广州创业的故事。^[32]以上叙事揭示了时代的语境, 即个体有机会从集体、组织的笼罩中挣脱出来, 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而互联网正是这样一条没有约束、鼓励创新与试错的赛道。1998 年刘韧对 50 位影响颇大的互联网创业者进行盘点并出版了《知识英雄》一书, 它代表了以下思潮的盛行: 知识和技术可以驱动商业上的成功, 进而使创业者成为民族国家的骄傲。由此, “知识英雄”也为“信息高速公路”隐喻增添了主体性的意涵, 即互联网是国家修建的基础设施, 但这条赛道可以让有创新能力的人实现自我价值, 只不过它尚属于能在商业上开创成就的少数精英。

综上所述, “信息高速公路”隐喻在 90 年代的风靡得益于国家现代化与市场经济的共谋。在宏观层面, 它暗含了中国期望借助互联网“弯道超车”西方国家的民族复兴夙愿; 而在中观层面, “知识英雄”为代表的商业主义话语则起到了新教伦理式的驯化作用。这两者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 所以互联网创业的成功者会笼上“明星”的光环, 甚至被媒体包装为“民族英雄”。与此同时, 这一隐喻也折射出中国政府明晰的实用主义态度, 即把互联网视为无涉价值、仅用于发展国民经济的工具, 这也是国家现代化的必经之路。^[33]

四、“第二人生”体验：网络游戏与网络文学的兴起

好景不长, 2000 年春“互联网泡沫”的破灭^②重创了在美国上市的搜狐、网易和新浪等互联网公司, 失去外部投资的企业家们在艰难中寻找新的盈利模式, 互联网经济的整体受挫也使“知识英雄”话语与“信息高速公路”隐喻偃旗息鼓。^③不过, 互联网的发展也逐渐回归理性, 被“繁荣”

①原文为吴萍 2004 年在《计算机世界报》G73-G74 发表的文章《瀛海威: Internet 先烈》, 截取自互联网时光机的档案资料, 可见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81225134640/http://www.oihw.com/cgi-bin/article/article.cgi?achech=article&action=read&id=59>。

②指互联网与信息产业股价飙升、买家炒作所导致的虚假繁荣的终结。洪波回忆起这段往事时称, “当时泡沫不破也是不可能的, 你甚至什么都不用做, 就把公司改名叫 .com 就能拿到一大笔钱, 这肯定是不正常的……”, 可见《好奇心日报》的文章《20 年前的八卦、莽撞和自由, 制造 20 年后的中国 | 1999 回忆录①》, 链接: <http://www.qdaily.com/articles/60056.html?source=chouti>。

③其中一个例证是: 研究者以“信息高速公路”为主题词或关键词在 CNKI 数据库进行检索, 发现在 2000、2001 年之后, 其每年发表的相关文献数大幅下降并保持在了一个平稳的数值上。

所吸引的普通网民留了下来。根据 CNNIC 第 9 次报告, 2001 年中国互联网的普及率达到 2.7%, 超过了罗杰斯曲线中“创新先驱者”的比例而进入到“早期采纳者”阶段^[34], 并且自费上网人数达到 63%, 18-30 岁的网民超过了总体的六成。这预示着广大网民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并逐渐成为想象、建构“互联网”的中坚力量, 其中最典型的表征要属“第二人生”隐喻的出现, 它又鲜明地反映在网络游戏、网络文学两种实践中。

“第二人生”(second life)的说法出自美国一款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类游戏(简称MMORPG), 在这个世界中玩家被赋予了做任何人、行任何事的自由。他们可以创造多重虚拟化身(persona), 在网络世界里休闲、交友, 甚至结婚生子。这与 1996 年的畅销书《数字化生存》遥相呼应。在尼葛洛庞蒂看来, 互联网的革命性意义在于促使“比特取代原子”(move bits, not atoms), 个体之间的相互代替大众传播, 游戏与学习的边界趋于模糊, 精神超越躯体栖居于别处, 由此网络将极大地拓展人类生活的疆界。^[35]相较于“信息高速公路”, “第二人生”不再把互联网设想成工具(tool), 而是隐喻为一种生存方式(a way of being)。它重点关注自我的形成, 以及自我如何与世界互动并使之有意义。因此技术不再是外在于人类世界的对象, 而是与人们生活世界相融合。^[36]而这种匿名、虚拟的生存方式建立在与现实世界相区隔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 不同于“信息高速公路”凸显国家, “知识英雄”强调少数精英, “第二人生”把想象、言说互联网的权利交还给了普罗大众。

2000 年初期, MMORPG 游戏在中国的风靡使互联网成为自由、狂欢的快感体验之地。2001 年 3 月, 中国大陆第一款原创游戏《第四世界》上线, 这是一个以现代都市生活为题材, 鼓励玩家通过在线的交流、协作推进其生活进展的游戏。同年, 盛大网络将《传奇》引入中国并改名为《热血传奇》, 最热门时期其在线人数曾超过 65 万人, 这在当时是相当惊人的用户规模。陈天桥还在线下地推中邀请网吧加盟通过代卖点卡获取利润。到 2003 年, 盛大在全国大中城市已建立了数

千家网吧经销商。^[37]有研究者指出, 邓剑(2020)认为, 不同于 90 年代单机游戏关卡、打怪、升级的设定, MMORPG 游戏最大的特点在于构造了“游戏社会”的生存状态, 在此玩家们期望寻求一种与琐碎、压抑、沉闷的现实生活拉开距离的可能。^[38]当时一个广为流传的看法是: 网络空间本身无法被规制。人们在网络中可以活出完全不同于现实的自我, 许多在现实中不敢说、不敢做的事可以无节制地进行, 互联网因此成为大众肆意狂欢之地。^[39]

然而网络游戏的流行也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 这使官方机构很快参与到互联网隐喻建构的博弈中, 其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扭转了“第二人生”的道德内涵。2000 年《光明日报》刊登了报道《电脑游戏是瞄准孩子的“电子海洛因”》, 描述了一位母亲向有关单位控诉网络游戏对孩子的危害, 记者接到线索后暗访网吧、游戏厅, 最终揭露网游非法经营、引诱青少年堕落的事实。^[40]自此“电子海洛因”被建构为网络游戏的社会隐喻。以《人民日报》为例, 1996-2000 年间涉及网游的报道负面比例超过 92%, 1989-2001 年间甚至没有出现过一篇正面报道。“网吧-网游-网瘾”这组三位一体的新闻叙事凸显了网络游戏“危害青少年”的后果, 并为“治安管理”措施的出场制造合法性。^[41]2002 年北京蓝极速网吧发生的纵火案成为导火索, 一场全国范围内针对网吧网点, 以及违法网站内容的整治运动全面铺开, 伴随而来的是 BBS 实名制的推行、网络警察入驻, 以及文明办网行动。^[42]这些举措都昭示着“互联网并非法外之地”, 虚拟世界并不能成为逃逸现实管制的空间。

大众触网的“第二人生”体验还源于网络文学的兴起, 它营造了人们自由创作与表达的精神港湾, 使都市的陌生人能隔着电子屏幕感受彼此的情感、聆听对方的故事。榕树下、红袖添香、幻剑书盟、起点中文网、晋江文学城等知名网络文学站点都发轫于 1997-2003 年间。朱威廉在追忆创立“榕树下”的想法时, 谈到: “当时整个社会灯红酒绿、纸醉金迷, 但我们还是需要为精神的追求留一点空间……期望更多人把他的生活感

受、感受、经历记录下来,使更多人分享、传播以唤起共鸣。”^[43]在此,我们看到互联网创造出一种保护性的环境,它鼓励人们比现实生活中更自由地表达自己,对于那些受社会抑制的人来说尤其如此。^[44]个性化的私人倾诉、真挚的青春叙事是这种表达的一大特点,1998年问世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就是典型的例子。蔡智恒的文字充斥着插科打诨式的网络用语特色,但在这背后流淌出的是真情实感。由于其整个写作过程都是在BBS上完成的,读者的留言互动超过了1000页,从中可以窥见“天涯若比邻”般的个体经历分享以及强烈的情感共鸣^①,早期互联网就是如此“充满着活生生的个人”^[45]。另一知名作品《悟空传》也曾在榕树下留下了19,126次点击,诸如“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眼;要这地,再埋不了我心”的台词一度脍炙人口。有网友这样留言道:“好久不曾为一部小说而哭了……在城市中不知如何生活,终日茫茫不知所云……我们反抗过失败过无奈过像悟空一样,现实如此我们无法逃避,可悲而幸运的是我们还有希望。”^②如欧阳友权所述,网络文学最重要的特征恰在于其表达的高度自由,正因为摆脱了出版、发行、资金等束缚,加上署名的虚拟性,使写作者实现了真正的畅所欲言,而读者亦被这份真情而打动。^[46]

总之,“第二人生”的隐喻彰显了普罗大众的话语实践力量,它集中表现为对于前所未有的自由的渴望。这种自由既是网络游戏中人们通过饰演不同虚拟化身获得的快感;也是网络文学中人们在虚拟环境的庇护下以“无我”心态对“真我”情怀的表达。并且,它折射出社会隐喻的分化:在狂飙突进的国家现代化与市场经济话语之下,随着互联网向大众扩散,后者开始编织他们想象中的“互联网”。此外,“第二人生”背后隐含的反叛精神也触发了国家治理的入局,在当时网络游戏和网络文学都需要为其自身的合法化而努力。另一方面,互联网已悄然掀起一场当代中国私人领域的变革,包括情感的倾诉、自我意志的表现、

虚拟化身的认同思考,以及与陌生人的交往……它们都为人们迈向新的共同体而铺垫。

五、网络社区的三重隐喻:广场、家园与江湖

互联网在世纪之交的兴起不容商榷地把中国网民拉入了一个充满陌生人的空间中,彼此从未谋面的人们正在虚拟世界中缔结新的社会关系,这种冲击对于熟人社会传统悠久、城市化仅起步于80年代的中国社会来说是空前的。在互联网创新扩散的第一个十年里,最显著的结社形式当属网络社区,百万之众以各式各样的新闻组、邮件组、聊天室、BBS论坛为阵地集结起来。杨国斌基于长期的网络民族志调研发现,中国网民倾向于用“广场”“家园”和“江湖”来想象网络社区,并分别指向自由、团结与正义三种价值理念。^[47]

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网络社区”(network community)本身就是针对互联网的一种地方隐喻(place metaphor)。而无论“广场”“家园”还是“江湖”亦是对人们感知、存在或行动的此种空间的描述。如果说“第二人生”凸显的是个体的生活体验,那么这些地点导向的隐喻则暗示了我们须与他人产生联系、发生关系,它指向集体生活的可能性。^[48]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1999)曾将人类在群体生活中结合的两种理想类型定义为“共同体”(gemeinschaft)与“社会”(gesellschaft)。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的改造很大程度上是以后者取代前者,即用一种机械聚合与人工制品取代生机勃勃的共同生活。^[49]从这种意义上说,“网络社区”的隐喻反映了中国人在个体化社会中重新找寻“共同体”的渴望,新技术的引人注目之处不再是功利方面的用途,而在于特定道德情感的承载。^[50]下面我们将围绕一些公共性事件来分析这三重隐喻如何在话语实践中相互交织,并反映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

第一个案例是强国论坛的诞生,它展现了官方政府与社会公众在将互联网建构为“网络社区”过程中的合作实践。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

①研究者通过互联网时光机(wayback machine)回溯了痞子蔡当时写作的部落格,并阅读了围绕《第一次亲密接触》展开的留言与互动,可见<https://web.archive.org/web/20061109101105/http://www.jht.idv.tw/>。

②以上《悟空传》读者留言的出处可见:<http://www.58xs8.com/71250.html>。

斯拉夫联盟大使馆遭北约轰炸，线下青年学生的反美游行与线上 BBS 火爆的网络讨论交相辉映。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开设了“强烈抗议北约暴行 BBS 论坛”，在之后一个多月里网友共发表了 9 万条帖子。6 月 19 日，它正式改名为“强国论坛”。^[51]强国论坛首先表现为一个汇聚公众舆论的场所，它的价值在于疏通上下对话的渠道，使官方媒体与民间社区合二为一。^[52]2002 年网友“我为伊狂”在强国论坛上发表长文《深圳，你被谁抛弃》尖锐指出了深圳城市发展的诸多问题，并引发上百万网友参与讨论。文章的火爆使他获得了和深圳市长平等对话的机会，这在前互联网时代是难以想象的。^[53]同时，“广场”的隐喻也暗示了其开放性与参与群体的异质性，事实上左派与右派、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激进主义与犬儒主义等人士的观点交锋，是早期中国互联网时代一道鲜明的风景。你来我往的唇枪舌剑也引出了关于“江湖”的想象，周葆华在回忆起这段往事时称“BBS 充满了快意恩仇、家国情怀，也有观点的碰撞，刀剑交锋”^[54]。强国论坛也被想象为家园。一方面因为其诞生就与爱国主义的情感密不可分，国与家在该语境中是同形同构的。强国论坛的“人和”恰在于无论观点交锋者如何对立，他们都希望这一栖身之地能长久存在下去。陌生网友之间还在日常相处中形成一种浓厚的情谊，2001 年强国论坛上的一位网友身患绝症，论坛自发出现的募捐活动正说明了这一点。^[55]

第二个案例是以孙志刚案为代表的公民维权事件，它表明网络社区能够汇聚起抗争的力量，并以舆论监督的方式敦促官方政府履行职权、实现社会正义。2003 年 3 月 17 日，一名在广州打工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因未携带证件被当地派出所遣送至“三无”人员收容所，后被故意伤害致死。事件的爆料线索最先出现在西祠胡同 BBS 上，《南方都市报》随后刊发了深度报道《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并很快被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以及论坛转载。该事件不仅引起全国性的大讨论，还促使了一系列抗争实践的发生，包括纪念网站

“天堂不需要暂住证”的建立、网络签名请愿活动，以及由三位法学博士起草后经五名法学专家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这一系列实践最终促使国务院在 6 月 21 日废除《收容遣送制度》。^[56]同年爆发了不少质疑司法判决及公权力的网络公共事件，如黄静案、孙大午案、李思怡案，其主题均围绕个人权利的维护展开，因此 2003 年也被称为“公民维权元年”。

我们可以从这种隐喻中窥见网民群体与国家政府之间的抗衡关系。首先，网络社区充当了一种公共话语空间，它将渺小的个体表达汇聚成强大的集体声浪，并使之广为传播。^[57]如果说以往真理标准的讨论主要依赖于主流媒体的大声疾呼，那么如今许多牵动全国的舆情即使不以互联网为发端，至少也经过了互联网的推波助澜。^[58]可以说，舆论生成机制发生了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到权力倒转。其次，公民维权事件展现了网络社区对现实的批判与寻求替代性世界的抱负。^[59]这种替代性世界正是惩恶扬善的“江湖”，它亦与互联网高流动性（虚拟）、低可见性（匿名）、不可预知性（网民行踪难以锁定）以及容纳多样性（群体类型）的技术特质^[60]息息相关。最后，这些维权事件的推进离不开网络社区所凝结的兄弟（姐妹）情谊。《互联网周刊》上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网络不是一个简单的家……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以及他们所创造的世界担负起更大的责任。互联网最深层的意义在于弘扬人间的正义、友爱、互助、平等，只有靠我们自己团结起来才能实现。”^[61]“网络社区”的隐喻因而比“第二人生”多了一份道德责任的要求，它凸显出以下辩证关系——个体的自由需要通过集体行动来守护。

以上两种类型的话语实践折射出国家政府与网民公众之间的暧昧关系：网络社区既可以是由政府机构、主流媒体牵头建设，以充当上情下达的信息枢纽与社会解压阀。这种信息疏通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作用。^①而更大多数的网络社区则由网民自发组织形成，如天涯、

①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邓小平就将将信息资源的开发与整个四化建设联系起来。1985 年接见外宾时他直言：“中国社会过去闭塞，造成信息不通，是一个很大的弱点。”

猫扑、西祠胡同、猫扑以及各大高校 BBS 都充当了彼时中国的超级意见市场，并在汇聚舆论以监督公权力、组织抗争以谋求社会正义、团结广大陌生人以形成守望相助的力量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早期的网络社区的一大特点是并不注重商业化的运作^①，这使“知识英雄”话语让位于众声喧哗。而同样是“互联网江湖”的隐喻，如今的叙事焦点早已从昔日草莽转移到了各大掌门人身上^②，商业主义话语再度实现统合。

六、民族主义作为“缝合”隐喻的意识形态

以上分析揭示了中国早期互联网隐喻之间的复杂关系，不同话语主体在不同历史时刻的入场搅动着单一的能指，使互联网本身成为异质、多孔的象征结构。譬如，“知识英雄”暗示了当时创业成功往往需绕开现行的规制，从而抢占商业上的先机；“第二人生”在带给人们自由感、解放感的同时，也不时触犯到主流价值观并引发社会整治；而“广场”“江湖”“家园”的三重隐喻扭转了“信息高速公路”的设想，使普罗大众取代政府官僚与商业精英，成为早期互联网话语实践的中坚力量。莱考夫和约翰逊认为，混合隐喻（或称之为“复杂隐喻”）若要产生实在效力，势必需保证其内部不同隐喻之间的连贯性。如果不存在这种连贯性，整个隐喻体系就会瓦解。^③

在一个社会中，意识形态往往扮演了“粘合剂”的角色，从而将不同话语统一起来，建构出大多数人所需要的意义。意识形态隐藏在社会表象之下，而其出场总是与话语事件相缀连。^④当我们重返早期中国互联网（1987-2003）的历史叙事，会发现有一股似隐若现的话语力量贯穿于各隐喻之间，它便是民族主义。熊慧指出，民族主义是一种中空的意识形态，常常选择、吸收、利用和再诠释既有的社会文化资源，以提供对于民族和民族国家起源、发展、使命及未来走向等的

特定表述。^⑤并且，民族主义总是一种对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界定。对中国互联网而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就充当了这种需要去借鉴、对抗、竞争、赶超的“他者”，它也与世纪之交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息息相关。

在 1987 年第一封电子邮件中，“越过长城，走向世界”不仅是对科学共同体话语的拥抱，也暗含了对屈辱近代史的反思，并迫使中国人持续不断地思考“我们如何变得强大”。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正是彼时中国政府对于此命题的回应。瀛海威公司树立的广告牌亦是对这种集体记忆与话语资源的调用。在互联网经济的市场竞争中，由于微软、IBM 此类巨头在全球市场的垄断力让国内企业步履维艰，因此“民族软件”的口号成为了企业家期望从政策上获得倾斜、优待的筹码。^⑥即使在私人化的“第二人生”体验中，民族国家的想象也经常被召唤出来。例如，穿越类网络小说中的主角常常向封建王朝统治者灌输救亡图存意识，不仅避免了闭关锁国、落后挨打的命运，反而驱使中华民族向外拓展，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⑦而网络游戏产业同样是在 90 年代盗版横行，泛滥的山寨游戏带来认同危机与屈辱的情形下，开拓出了民族游戏产品，它们某种意义上成为了“抵抗的媒介”。^⑧胡泳在回望《数字化生存》的翻译经历时坦言：“我几乎是不由自主地将‘being digital’译成‘数字化生存’，可能中国从来都有大国情结和忧患意识，被奋发的念头所激励着……”^⑨而回顾早期网络社区的发展史，民族主义的驱动力亦贯穿其间。1998 年印度尼西亚排华事件引起的愤怒不仅激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网络舆论动员，也使华人的跨国性公共论坛初具雏形。1999 年“五八事件”促成“强国论坛”成立的事件已是鲜明的例证。2001 年中美撞机事件则创造了彼时中文论坛发帖数的最高纪录……以上这些往往和公民维权事件被一同归入互联彰显民意民声的

①当时人们并没有把网络社区当作一款商业产品来做，因此运营很大程度上是自由放任的，这才给予了网民“江湖”的体验。天涯论坛在创立 16 年后才上市新三板就是一例证。可参见《知乎上市背后，中国互联网社区 25 年血泪史》，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ycFW4TAPzCmjrfGL8LBaBNQ>。

②以“江湖”隐喻互联网各巨头公司创始人的发迹史已成为如今自媒体文章的一种流行风格，典型作品便可见《再无风清扬，再有少年郎》，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NG1tbz6N-yC9RgGCEISdpg>。

③可参见胡泳在《数字化生存：20 周年纪念版》中所作的译者序言《承认并庆祝人的境况》一文。

职能中。^[68]

斯拉沃热·齐泽克 (Slavoj Zizek) 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谈到, 意识形态空间是由非绑定、未捆死的各种因素, 即“漂浮的能指”所构成的。要想创造并维持既定意识形态领域的同一性, 使它超越实证内容所有可能的变种, 关键就在于通过某一“纽结点”(nodal point) 的干预将它们“缝合”起来, 阻止其滑动。由此, “缝合”发挥着集聚的功能, 使各种自由、漂浮、对抗的能指成为意义的结构化网络的一部分。^[69]我们认为, 民族主义就起到了缝合各种隐喻的作用, 将政府致力于“四个现代化”建设、企业家谋求经济创新与自我价值实现, 以及公民对自由、团结、正义的追求统合为民族复兴的夙愿。随着中国在世纪之交更多地卷入了全球政治经济文化体系, 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利益冲突亦开始加剧, 而综合国力的上升与彼时国际地位的不匹配则深刻刺激了国人的自尊心与民族主义情绪, 《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等书籍的畅销便是例证。^[70]这实际上构成了一个理解普罗大众社会心理的重要语境。

七、结语

本文关注早期中国互联网的创新扩散历程, 并将其视为不同社会行动者想象、建构这一新生事物的话语实践。通过打捞 1987-2003 年间的历史叙事, 并围绕特定事件、案例进行分析, 我们发现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生成出诸如“盗火”“信息高速公路”“知识英雄”“第二人生”“广场”“家园”“江湖”等互联网的隐喻, 并大致呈现出从国家基础设施向公民行动场域的转变, 当然这种转变只是刚刚开始。其中, 国家政府与市场经济的合谋促成了“信息高速公路”隐喻在 90 年代的盛行, 在此互联网被设想为一种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渠道和工具。千禧年前后, 广大网民的“第二人生”体验弥漫在网络游戏、网络文学的实践中, 它指涉了一种迥异于现实世界且空前自由的生存方式, 但因此引发的社会问题激起了“互联网是否应为法外之地”的争论与治理实践。而网络社区的繁荣则使互联网成为舆论聚集、社会交往、惩恶扬善的道德空间, “广场”“江湖”“家

园”这三重隐喻展现了公权力与网民群体之间富有张力的关系。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纽结点”缝合了诸隐喻之间的裂痕与间隙, 使隐喻体系保持了整体的连贯。这一定程度上揭示出早期互联网特殊的历史意义, 它象征着中国在寻求本土化现代性与回应全球化浪潮之间的左右为难。^[71]与此同时, 早期中国互联网这种微妙的平衡也嵌入了更为宏大、复杂的改革开放进程中, 它注定充满不确定性, 并受益于政府、企业、社会共同的探索、试验与博弈。^[72]

参考文献

- [1] 吴世文. 互联网历史学的理路及其中国进路[J]. 新闻记者, 2020(6): 47-60.
- [2] Brügger, N., Goggin, G., Milligan, I. & Schafer, V. Introduction: Internet histories[J]. Internet Histories, 2017(1): 1-2, 1-7.
- [3] Abbate, J. What and where is the Internet? (Re) defining Internet histories[J]. Internet Histories, 2017(1): 8-14.
- [4] Balbi G, Chen C, Wu J. Plea for a (new) Chinese media history[J]. Interactions: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 Culture, 2016(3): 239-246.
- [5][34] E.M. 罗杰斯. 创新的扩散 (第五版) [M]. 唐兴通, 郑常青, 张廷臣, 译.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6: 3-15; 297.
- [6] Sweetser E. 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 metaphor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semantic structur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8.
- [7][8][62] 乔治·莱考夫, 马克·约翰逊.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 何文忠, 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134; 7; 83-91.
- [9][27][36][48] Markham, A. N. Metaphors reflecting and shaping the reality of the Internet: Tool, place, way of being [C]//Paper presentation at the 4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ternet Researchers (AoIR), Toronto, Canada. 2003.
- [10] 杨击, 叶柳. 情感结构: 雷蒙·威廉斯文化研究的方法论遗产[J]. 新闻大学, 2009(1): 137-141.
- [11] 彭兰. “连接”的演进——互联网进化的基本逻辑[J]. 国际新闻界, 2013(12): 6-19.
- [12][30][42][58] 李永刚. 我们的防火墙: 网络时代的表达与监管[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120; 119; 90-97; 55.
- [13] 郑智斌. 事件、观念、共变: 中国互联网事件二十年研究[J]. 中国新闻传播研究, 2017(1): 167-179.
- [14] 方兴东, 潘可武, 李志敏, 张静. 中国互联网 20 年: 三次浪潮和三大创新[J]. 新闻记者, 2014(4): 3-14.
- [15][20] 李南君, 维纳·措恩. 中国接入互联网的早期工作回顾[J]. 中国网络传播研究, 2007(1): 237-252.
- [16] 王东宾. 突破美国的封锁——中国接入互联网简史 [EB/OL]. 检索于: https://www.guancha.cn/WangDongBin/2019_02_16_490322.shtml.
- [17] 胡启恒, 方兴东, 薛芳. 中国互联网口述历史 1994-4-20: 中国接入互联网[J].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6):40-145.

[18]转引自:新浪科技.中国日报当日报道第一封电子邮件发出[EB/OL].检索于: <http://tech.sina.com.cn/i/2008-10-31/19022549460.shtml>.

[19]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54.

[21]Hauben, J. The Story of China's First Email Link and How it Got Corrected [EB/OL]. Retrieved from: <https://www.informatik.kit.edu/downloads/HaubenJay-ChongqingSpeech-12Jan2010.pdf>.

[22]胡泳.中国互联网二十年:自由的向往,信任的呼唤[N].新京报,2018-10-25(B04-05).

[23][51][57][68]彭兰.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15;70;282;287.

[24]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M].朱志焱,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

[25]汪尚言.互联网在中国[J].企业改革与管理,1998(2):31-33.

[26][29]顾朝曦.国民经济信息化的呼唤[N].人民日报,1994-1-12(05).

[28]何传启,李宁,张凤等.迎接知识经济时代 建设国家创新体系[J].中国科学院院刊,1998(3):165-169.

[31]孙今泾.20年前的八卦、莽撞和自由,制造20年后的中国|1999回忆录①[EB/OL].检索于: <http://www.qdaily.com/articles/60056.html?source=chouti>.

[32][37]林军.沸腾十五年:中国互联网1995-2009[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3-47;230-231.

[33][72]王梦瑶,胡泳.中国互联网治理的历史演变[J].现代传播,2016(4):127-133.

[35]尼古拉·尼葛洛庞蒂.数字化生存[M].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

[38]邓剑.MMORPG网络游戏批判——关于游戏币以及游戏乌托邦的历史考察[J].新闻记者,2020(7):16-26.

[39]何明升.技术与治理:中国70年社会转型之网络化逻辑[J].探索与争鸣,2019(12):41-52.

[40]夏斐.电脑游戏瞄准孩子的“电子海洛因”[N].光明日报,2000-05-09(Z02).

[41]何威,曹书乐.从“电子海洛因”到“中国创造”:《人民日报》游戏报道(1981-2017)的话语变迁[J].国际新闻界,2018(5):57-81.

[43]韩方航.“榕树下”如何开启一个网文时代,又如何走向没落?|网络文学20年①[EB/OL].检索于: <http://www.qdaily.com/articles/44533.html>.

[44]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35.

[45]吴世文.互联网历史学的前沿问题、理论面向与研究路径——宾夕法尼亚大学杨国斌教授访谈[J].国际新闻界,2018(8):59-75.

[46]欧阳友权.数字媒介与中国文学的转型[J].中国社会科学,2007(1):143-156.

[47][50][59]杨国斌.连线力:中国网民在行动[M].邓燕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79;168;193.

[49]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52][55]彭兰.强国论坛给了我们什么启示[J].信息安全,2008(6):14-16.

[53]南方都市报.深圳市长与《深圳,你被谁抛弃?》作者对话[EB/OL].检索于: <http://news.sina.com.cn/c/2003-01-20/1312881028.shtml>.

[54]转引自:澎湃新闻.街角社会|BBS二十年,站在互联网的广场上[EB/OL].检索于: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229342.

[56]付晓燕,朱灿辉.网络媒体:民意表达的新窗口——网络媒体在孙志刚案件中的作用[EB/OL].检索于: http://211.71.215.185/XinMeiTt/content/2008-06/19/content_847_7.htm.

[60]Yu H. Social Imaginaries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J]. AoIR Selected Papers of Internet Research, 2014.

[61]陆群.创造比特文明的新家园[J].互联网周刊,1998(16):57.

[63]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M].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82.

[64]熊慧.新民族主义媒体话语的社会历史分析:1990-2008[J].传播与社会学刊,2014(28):121-149.

[65]何佳艳,黄燕.谁决定国产软件的未来?[J].互联网周刊,2003(30):29-35.

[66]康桥.网络小说中的民族国家想象[J].文艺争鸣,2011(16):79-88.

[67]邓剑.游戏论?历史的维度|游戏四十年:中国游戏思想史刍议.[EB/OL].检索于: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912091?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69]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M].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22.

[70]曾梦龙.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和更大的民族主义浪潮|畅销书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样的中国④[EB/OL].检索于: <http://www.qdaily.com/articles/40262.html>.

[71]Yang, G. A Chinese Internet? History, practice, and globalization[J].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2(1): 49-54.

The Technological Metaphors and Discourse Practice of Chinese Internet at Early Times (1987-2003)

Chen Yanrong, Cao Yue

Abstract: The remarkable innovation diffusion of the Chinese Internet at early times has attracted western scholars' attention since the 1990s. In contrast to the traditional researches which focus on measuring Internet access and usage,

(下转第96页)

从“世纪专访”到世纪丑闻

——BBC 骗访戴妃事件的组织文化与制度分析

刘亚娟 展江

摘要 本文聚焦 BBC 的深度新闻节目《全景》始于 1995 年 11 月，终于在 2021 年 5 月被一项独立调查全面曝光的一桩丑闻，在揭示记者马丁·巴希尔如何通过欺骗手法获得专访戴安娜王妃机会的基础上，以组织文化学和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分析了全球最知名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 BBC 出现如此严重的职业道德失范行为的原因。

关键词 BBC；记者巴希尔；戴安娜王妃；媒体伦理；组织行为；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 G212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刘亚娟，浙大宁波理工学院传媒与法学院讲师，浙江宁波 314100；展江，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北京 100089

作为全球最知名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BBC 的新闻节目具有世界性影响力。进入电视时代以后，画面的特殊表现力和冲击力令 BBC 的影响更甚于广播时代。问题随之而来，世纪之交 BBC 被曝出三大丑闻，令这家以公共服务为傲的媒体一再蒙羞。其中对 BBC 公信力打击最大、至今仍在延烧的就是本文剖析的记者巴希尔以欺骗手段获得专访“人民心中的女王”戴安娜王妃（下简称：戴妃）的事件。这桩丑闻何以发生？何以在历经 20 多年后才被公开曝光？本文从 BBC 的制度规限和组织文化的角度予以解读。

一、《戴森报告》让 BBC 再上风口浪尖

1995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一，英国广播公司 1 台(BBC One)《全景》(Panorama) 栏目播出了“威尔士王妃殿下访谈录”，由时年 32 岁的 BBC 出镜记者马丁·巴希尔 (Martin Bashir) 专访戴安娜王妃（下简称：戴妃）。在长达 52 分钟 15 秒的面访中，双方对谈了 301 个回合。^[1]戴妃披露了卡米拉女士是她和查尔斯王子婚姻中的“第三者”，承认了她与马术教练詹姆斯·休伊特 (James Hewitt) 少校的婚外情，还谈及与暴食症、产后抑郁和自残行为的抗争。观看这期节目的英国观众有 2300 万，占当时英国总人口 5800 万的近 40%。专访被英国王室写进了戴妃生平，^[2]被称为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社会文献之一”，德国《明镜日报》(Tagesspiegel) 称之为堪与丘吉尔二战期间 BBC 广播演讲相媲美的“高光时刻”。^[3]

至于这次“世纪专访”的负面效应，明眼人不难看出对王室前所未有的冲击，有人甚至怀疑它会动摇英国的君主立宪制。^[4]专访播出一个月后，女王“劝告”查尔斯与戴妃离婚。21 个月后，36 岁的戴妃因车祸去世，其香消玉殒令世

人唏嘘不已。

时隔 25 年，那次专访再次激起汹涌波涛——“世纪专访”竟成了跨世纪丑闻。记者巴希尔被调查坐实，他先是骗取了戴妃弟弟斯潘塞伯爵的信任，继而获得专访戴妃的机会。这是 BBC 在其历史上继 2004 年《赫顿报告》^①发表和 2012 年知名音乐主持人吉米·萨维尔（Jimmy Savile）^②变童丑闻曝光后的第三次重大公信力危机，而这一次由于牵涉到在国民心目中地位崇高但近年来变故多多的王室，其冲击力远大于前两次。

（一）一位影视制作人的不懈追踪

为揭露巴希尔的行径立下头功者，当属自由影视制作人安迪·韦布（Andy Webb）。巴希尔凭借戴妃专访扬名不久，《星期日邮报》就发表了他使用伪造银行账单获得戴妃信任的证据。BBC 的一次内部调查排除了巴希尔行为不当的指称，《星期日邮报》随之被人遗忘。2007 年，韦布依据《信息自由法》要求查看 BBC 的调查档案，他得知巴希尔的同事和高层对其如何获得独家都有怀疑。BBC 的回复竟然是：没有任何档案留存。有多年记者生涯的韦布对此全然不信，他认为 BBC 事无巨细均有记录，其档案中不可能缺失这么重大的事项。2020 年疫情封禁期间，韦布再次援引《信息自由法》致信 BBC 索取相关文件，说明他正在为第四频道（Channel 4）制作关于戴妃专访的专题片。这一次 BBC 的回复截然不同：对 13 年前的不当做法正式道歉，并称那次的回复是不准确的，因为调查的结论“建基于推测而不是得到确认的事实”。韦布后来写到，这几乎就等于说 2007 年告诉他的是一个谎言。

韦布制作的专题片定于 2020 年 10 月播出，就在播出的 48 小时前，BBC 通过电子邮件发给韦布一个文件包，内有 67 份文件，它们记录了戴妃专访的策划和操作过程。他认为 BBC 明知他来不及在 48 小时内将这些内容临时加入专题片，而这种

貌似精明的算计是可耻的。机智的韦布决定将文件转交给始终相信存在猫腻却无法证明的斯潘塞伯爵。伯爵随即与《每日邮报》的理查德·凯（Richard Kay）研读这些文件，以揭开巴希尔的骗局。令伯爵特别愤怒的是，淹没在文件包第 43 页的文字中有一段虚假陈述称，伯爵向巴希尔提供了负有罪责的种种细节，而做出虚假陈述的居然是 2013–2020 年任 BBC 台长的托尼·霍尔（Tony Hall）。^③

（二）《戴森报告》激起滔天巨浪

韦布与斯潘塞伯爵都相信，巴希尔用伪造账单向戴妃施压，进而得以实现专访，而他全然不顾戴妃的精神状况，利用了她的易受伤情绪。韦布认为巴希尔犯了伪造罪，而巴希尔在专访中玩弄种种伎俩的受害者不限于戴妃一人。戴妃的私人秘书帕特里克·杰夫森在专访播出后即离职，巴希尔暗示他受军情五处之命监视查尔斯王子。杰夫森眼含泪水告诉韦布，戴妃从此对他不再信任。巴希尔撺掇戴妃相信查尔斯王子与蒂吉·莱格-伯克有染并发生堕胎，这位威廉和哈里王子的保姆因此名誉扫地。^④

在斯潘塞伯爵的要求下，迫于各界压力，BBC 于 2020 年 11 月委托前资深法官约翰·戴森（John Dyson）牵头进行独立调查。2021 年 5 月 20 日《戴森报告》发布，确认巴希尔采用欺骗手段接近戴妃从而达成专访，对巴希尔的描述是“不可靠”“狡猾”和“不诚实”。报告核心事实包括：^⑤

1. 巴希尔让人伪造银行账单，显示媒体大亨鲁珀特·默多克旗下的《世界新闻报》和英国情报部门定期向斯潘塞伯爵的前安全主管支付报酬，暗示其受到监视。
2. BBC 掩盖了对伪造上述文件有所了解这一事实。
3. 时任 BBC 新闻总监托尼·霍尔在 1996 年主导的内部调查“非常无效”。其处理方式“没有达到 BBC 标志性的诚信度和透明度的高标准”。
4. 戴妃手写便笺显示，她对此次专访没有

①《赫顿报告》是 2004 年 1 月公布的法官赫顿勋爵主持的国防部生化武器顾问戴维·凯利博士死亡事件调查报告，它批评 BBC 未能对记者安德鲁·吉利根的不实报道加以核实，排除了首相托尼·布莱尔蓄意渲染伊拉克情报的罪责。BBC 董事长加维因·戴维斯、台长格雷格·戴克和记者吉利根引咎辞职，BBC 因此陷入成立 82 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

②吉米·萨维尔（1926–2011），BBC 电视台音乐节目王牌主持人。生前是国民偶像，乐善好施，并受封爵士。然而他甫一亡故，铺天盖地般的指控揭开了他极其肮脏的另一面。调查发现，这位超级伪君子在长达 60 年中性侵数百名成年女性和未成年少女。

任何遗憾，巴希尔没有向她展示伪造文件，因此BBC认为伪造文件并没有影响戴妃接受专访的决定，但由于记者向斯潘塞伯爵出示了该文件，间接影响了戴妃。

报告揭露的事实引发了各界对BBC的普遍谴责，即将迎来百年华诞的BBC一时间被推上风口浪尖。戴妃长子威廉王子发表视频声明，对BBC当年没有妥善处理投诉调查表示“由衷愤怒和心碎”，认为专访“助长了她的恐惧、偏执和孤立”，进而导致父母婚姻破裂，还“伤害了无数人”，“母亲直到去世都不知受到了欺骗”。威廉王子还罕见地斥责巴希尔为“无赖记者”（“rogue reporter”），并称BBC的管理者毁掉了他母亲，他甚至说《全景》节目应该立即停止播出。^[8]从王室出走异国的戴妃次子哈里王子认为，BBC的失德行为最终夺走了母亲的生命，他控诉道：“我们的母亲因此失去了生命，而一切都没有改变。”^[9]6月9日还有报道显示，哈里王子可能会因BBC报道他刚出生的女儿取名Lilibet（王室对女王的昵称）未经女王同意这一不实消息而起诉BBC。^[10]

2021年5月19日，斯潘塞伯爵在推特上写道：“我要感谢电视新闻工作者安迪·韦布在曝光巴希尔—《全景》—BBC丑闻中的不知疲倦的专业精神。如果不是他十多年来一直追踪这个事件并在去年10月与我分享他的发现，就不会有今天的结果。”^[11]

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呼吁BBC采取一切措施，确保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大法官兼司法大臣罗伯特·巴克兰宣布，政府决定审查BBC的管理方式。^[12]文化大臣约翰·惠廷代尔称，这次丑闻破坏了BBC在英国和全世界的名誉，因此可以解散BBC或取消对它的资助了。^[13]内政大臣普里蒂·帕特尔拒绝排除提起刑事诉讼的可能性，并称BBC要在“制度、结构、治理和问责”方面做出改变。^[14]

二、组织制度与文化视野下的BBC骗访事件

在制度经济学视野中，制度被定义为由人制定的规则，为一个共同体所共有，抑制着人际交往中可能出现的任意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并总是依靠某种惩罚而得以贯彻，它是引导人们行动

的一种手段，利用报酬结构、激励因素和阻碍因素，制度有效地限制了某些行动，并缩小了可能的反应范围。^[15]

1953年问世的《全景》是目前世界上最长寿的时事电视节目，作为BBC新闻的王牌，它长期为公众提供包括调查性报道在内的优质深度报道，并成为世界性的标杆。^[16]即便是在BBC这样享誉世界的公共媒体，只有事关工作常规的制度获得广泛认可和遵守，且违规行为会受到有效惩罚时，才能约束出采编人员合乎道德的专业行为。

对于骗访事件所表露的巴希尔个人道德水平低下已有定论，但是在组织制度和文化层面，BBC组织制度松懈，对失范行为惩罚不力，组织文化隐含的自由派偏向和过度的“政治正确”，不仅助长了巴希尔的失德行为，也以反规范的形式做出了错误示范，破坏了组织的公正性，最终导致了内部道德堡垒的沦陷。

（一）1996年调查与“正派处理”原则

与《赫顿报告》和“萨维尔调查”中BBC的自辩立场稍有不同，巴希尔的严重失德行为是无法否认的。《戴森报告》发表后，时任BBC台长约翰·伯特（John Birt）发表声明向斯潘塞伯爵道歉：“我们现在知道《全景》聘用了一个骗子，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污点，遗憾的是花了25年时间真相才全部浮现。”^[17]被指当年主导了一场无效调查的霍尔勋爵宣布辞去国立美术馆馆长一职。现任台长蒂姆·戴维（Tim Davie）表示完全接受调查结果，承认巴希尔获得专访的手段与公众对BBC的期待不符，为此做出“全面和无条件”的道歉，并承诺退回因那次专访获得的所有奖项。^[18]

问题首先在于，巴希尔违反的是一条基础性准则。当年BBC将巴希尔的行为定性为有违“正派处理”（straight dealing）原则，BBC新版编辑手册中对“正派处理”有如下解释：记者在与被专访者交往过程中要致力于诚实对待每个人，同时综合考量被专访者的隐私和知情同意原则。在准确报道的基础上，应该注意被专访者和消息来源可能会受到的伤害和痛苦，必须考虑到编辑内容、被采访者的公共职位及其参与的性质和程度，甚至是对方的心理状况（如是否脆弱）来具体判断。^[19]

这条原则贯穿于采访的台前台后，虽然不会被电视观众感知，但应表现在记者与被访对象的每一次交流中。

其次，对巴希尔违反原则的内部惩戒是无效的。《全景》记者约翰·瓦尔（John Ware）的调查显示，1996年4月4日，前BBC高管蒂姆·苏特（Tim Suter）在致巴希尔的谴责函中写道：“你伪造文件的行为违反了‘正派处理’原则，你还在接受调查时隐瞒了文件使用情况，对此事件我们的态度无疑是严肃的。”霍尔勋爵在接受采访时也称，当年调查后巴希尔受到了“严厉谴责”，并接受了“严密监督”。但是这种谴责和监督毫无作用，苏特的谴责函甚至没有送到巴希尔手中，不仅BBC董事会从未接到霍尔有关此事的报告，巴希尔的从业档案中也没有关于因此受到谴责的任何记录。^[20]

《戴森报告》发布后，苏特也辞去了通讯管理局（Ofcom）这一监管职能广泛的政府部门的董事职务。

（二）反规范破坏组织正式制度

所谓反规范（counter norms，又译“反道德准则”）是指某些与社会普遍接受的道德规范相悖的行为获得组织内部接受。^[21]由于BBC的特殊体制，外部对BBC的规制和监督渠道有限，其内部在巴希尔做出与BBC宣称的组织价值观相悖的反道德行为后，没有对其进行任何正式或非正式惩罚，这反而助长或强化了巴希尔的反规范行为。

BBC 内部调查显示：^[22]

1. 当初斯潘塞伯爵并不信任发行量巨大但声名狼藉的各家伦敦小报，他特地打电话给时任《全景》主编史蒂夫·休利特（Steve Hewlett）了解巴希尔是否可信。休利特向伯爵保证：巴希尔是“我最好的采编人员之一”。

2. 休利特在接到巴希尔的同事马克·基利克（Mark Killick）对该事件的内部举报后，质问对方：“我 xxx（脏话）就不明白，这关你们什么事？你为什么关心这事？”后来休利特不但对假账单的制作者——图表美术师马特·威斯勒（Matt Wiessler）——的二次举报视若无睹，还对他的上司苏特保证，专访绝没有使用什么花招。

3. BBC 高管蒂姆·加德姆（Tim Gardam）、苏

特和休利特主导了对巴希尔的最初调查问询。巴希尔向三人保证从未给任何人看过账单，并称《世界新闻报》和情报部门监视戴妃和斯潘塞伯爵的细节来自戴妃，让高管们难于进行核查。加德姆对此虽存有疑虑，但没进一步核查，反而要求巴希尔请戴妃写一个证明，保证自己从未看过这些伪造文件。巴希尔也确实做到了，一张戴妃手写便签不仅在当时打消了BBC的疑虑，如今仍然是BBC为当年调查辩解的唯一理由。

4. 1996年4月，《星期日邮报》刊登了巴希尔的伪造文件，进而质疑他取得专访机会手段的正当性。BBC则发表声明说，这些文件“与专访没有任何关系”。《星期日邮报》总编所不知道的是，当年巴希尔在内部调查中承认曾将文件交给斯潘塞伯爵过目，因而未能继续追踪此事。

可见，BBC在接到内部举报和外部质疑后，根据其监管规则开展自查，但是鞭子高高举起，最后轻轻放下，反映了组织内问责制度的漏洞。高管们显然缺乏调查研究，而陷入了偏听偏信；对巴希尔欺骗撒谎的处置显得绵软无力。凡此种鼓励了巴希尔的失德行为。专访戴妃既不是巴希尔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忽悠”被专访者。在其职业生涯中，他不仅一再向被专访者撒谎，也对上司撒谎。同样在BBC任职期间，1991年，巴希尔说服了一起婴儿谋杀案中的家长，以DNA比对去揭露警方调查报告不实为由，他拿走了孩子的外套至今未还，且拒不认错。^[23]巴希尔面对媒体询问回应称，外套“可能是丢了，不记得了”。^[24]他在此事上不但缺乏责任心和同情心，还明显违背了“正派处理”原则，但也并未受到组织的追究。

更严重的是，这种组织对违反道德规范的默许体现出一种不公正倾向：替巴希尔执行伪造文件任务的图表美术师威斯勒离职，巴希尔非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凭借那次专访斩获职业大奖，此后扶摇直上；来自同事的内部监督被直接上司拦截，内部谏言通道被堵塞；BBC并未搁置与报界的恩怨，而是屡屡公开回击报界的质疑。无形中，BBC长期建立的崇高声望反而被用来破坏自身的道德规范。

（三）反规范渗入内部非正式制度

巴希尔曾两度供职 BBC，但他并非典型的 BBC 人。从学历背景看，巴希尔并不算过硬；从事件之前的职业经历看，也并非出类拔萃，但他能在 1996 年的内部调查中逃过惩罚，又在 2016 年被重新聘用，不得不提及外界批评 BBC 的自由派“偏向”和过度的“政治正确”。其间，巴希尔的第三世界移民身份似乎给他染上了一种天然保护色。

巴希尔 1963 年出生于伦敦西南部的旺兹沃思，父母来自巴基斯坦。他在艾尔弗雷德国王学院获得英语和历史学学士学位，但在 BBC 中济济一堂的牛津和剑桥高材生面前就天生矮了三分。自 BBC 创立起，它招纳的采编人员几乎都是海派精英，许多人来自外交部或殖民地服务部，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在 BBC 工作仍被认为是绅士的工作，其职位类似于市政部门的高层管理人员。^[25] 1986 年，巴希尔进入 BBC，辗转多个节目，直到 1995 年才在《全景》中凭借戴妃专访崭露头角。1999 年，巴希尔高薪跳槽到独立电视公司 (ITV)，其间他采访了美国巨星迈克尔·杰克逊，这次专访也是争议重重。2004 年，受美国广播公司 (ABC) 100 万美元（当时约合 53 万英镑）年薪聘请，巴希尔移居美国，随后就职于微软—全国广播公司 (MSNBC) 和全国广播公司 (NBC)，2013 年因对美国共和党前副总统候选人萨拉·佩林发表有争议言论而辞职。空窗三年后，2016 年巴希尔才谋得了 BBC 宗教新闻主编 (religion correspondent) 一职。其后，巴希尔在一档总结节目中讲述了自己宗教信仰方面的心路历程，“在十几岁的时候改信基督教”，并在伦敦国王学院获得神学硕士学位。^[26] 不过，巴希尔前同事乔纳森·梅特兰 (Jonathan Maitland) 揶揄道：可能正是因为巴希尔信奉上帝，因此他心中唯一能审判自己的就是神，其他人的评价都不重要。^[27]

巴希尔出身穆斯林家庭，他作为少数族裔后代，教育背景一般，职业发展争议较多，而他两次进入 BBC 这件事情本身就反映了一种自由派偏向。BBC 前政治主编安德鲁·马尔也承认：BBC 雇员中年轻人、少数族群，同性恋比例偏高，这就

在内部营造了一种内在的自由派偏向。^[28] 2010 年，时任 BBC 台长马克·汤普森 (Mark Thompson) 在《新政治家》杂志上写道，BBC 过去的确存在自由派偏向。这一表述被报界解读为 BBC 高层承认存在自由派偏向。《每日邮报》总编保罗·戴克 (Paul Dacre) 指称：“在不偏不倚的旗帜下，BBC 所做的正好是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人。BBC 对工党、欧洲联邦主义、国家公共支出大量移民、少数族裔的权益、多元文化主义、另类生活方式、流产以及教育和司法改革都持同情态度。”^[29] 此外，BBC 还经常被批评为在自由派推动的“政治正确”道路上走得太远。^[30]

笔者无法断言 BBC 是否完全出于“政治正确”的考量，基于巴希尔的穆斯林家庭出身、少数族裔身份、个人信仰转变等因素而在道德层面降低要求，以致于非但未予处罚，甚至重开绿灯。他的行为曾经受到过内部人的多次严厉指责，其重新受聘尤其遭人诟病。英国数字化、文化、媒体与体育委员会主席朱利安·奈特 (Julian Knight) 质疑巴希尔的重新雇用并未通过招聘程序，几乎就是直接任命。事发后，2016 年负责招聘巴希尔的前 BBC 新闻总监詹姆斯·哈丁 (James Harding) 表示对做出聘用决定负全责，称对当年的欺骗行为不知情。^[31] 但公众舆论仍然不依不饶，认为哈丁作为 BBC 重要部门的负责人，对 20 多年来新闻界同行的质疑毫无了解是不可思议的。

英国媒体披露，巴希尔在 BBC 的年薪是 10 万英镑，他在《戴森报告》发布后随即因“健康”理由向 BBC 请辞，但理论上此后三个月他还能每周从 BBC 领取 2000 英镑薪水。^[32] 其母校伦敦国王学院将他的照片从名人墙上移除，MSNBC 的主持人介绍页面上也找不到巴希尔的名字了。

三、制度变迁视角下的 BBC 组织文化

为何 BBC 这个身居“高尚的道德领地”的组织其道德堡垒多次陷落，屡屡引发重大的公信力危机？巴希尔骗访事件昭示，除了记者个人道德水准低下，当下组织制度漏洞和组织文化缺陷不可忽视。从更为宏观的历史维度考察，百年 BBC 的制度变迁如何影响其专业表现则更值得探究。

所谓制度变迁，是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打破的方式。结构变迁的参数包括技术、人口、产权和对资源的控制等，是对构成制度框架的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三方面的组合所做的边际调整，而且制度变迁也包括有效的和无效的两种。^[33]就 BBC 面临的冲击而言，技术方面，近 30 年来媒介技术的变革不在话下；受众方面，关键公众群体构成日益复杂。最关键的是，BBC 作为公共广播组织在产权和资源保有方面遇到了诸多挑战。BBC 不仅是世界媒介史的书写者，也是媒介管理改革的积极行动者，只不过很多时候这种变迁并非出于主动，而往往是为了应对合法性和财务危机的改革。这种诱致性制度变迁意味着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因此必然会出现阻力与反复，从而形成改革阻力与摩擦成本。^[34]在这一过程中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制度安排问题，就会产生道德风险从而影响信用。虽然交易规则和监督机制完善有重要作用，但信用的确立似乎更本质地体现出内在的一种演化机制。^[35]虽然 BBC 在从里思主义向伯特主义过渡的过程中更加强调治理、问责与审计，但其制度演化机制造成的改变才是影响信用的根本原因。

（一）公营机构、里思主义与王室“喉舌”

BBC 在英国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地位正是由于其坚决捍卫创立之初就形成的文化理念。1921 年私营广播机构 British Broadcasting Company 成立，1922 年出身于苏格兰长老会牧师家庭的约翰·里思 (John Reith, 1889–1971) 被任命为总经理。1927 年，他出任当年根据“皇家宪章”对 British Broadcasting Company 进行改制而成立的世界上第一家公营广播组织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BC) 首任台长，并成为其公共服务体制的设计者，他的理念被称为里思主义，即与里思和他的原则相关的特性，或者单指里思和他的原则的特性，尤其是广播教育大众和提升大众品味的责任。他希望广播成为一个具有垄断性的强制性力量、致力于高水准的内容播出的公共服务机构，以保证广播既不受政府控制也不受商业干扰。^[36]在公众眼里，里思笃信宗教，俨然是一个道德楷模（据说他曾经坚持让一位同事因为离婚而辞职），^[37]里思

将其个人道德观运用于组织之中，在他的领导下，BBC 一直以来都占领着“高尚的道德领地”。^[38]历史学家 A. J. P. 泰勒称里思“运用垄断的残暴力量使基督教道德观在英国深入人心”^[39]。

作为 BBC 遗产的里思主义浸透于采编人员的日常制度中，并通过支持这些制度的价值得以强化。里思遗产主要理念包括：对英国忠诚；BBC 是特别的、与众不同和重要的，因为它提供的是公共服务；BBC 在业务品质上最好的；BBC 的采编人员是里思广播遗产的监护人，有职责去捍卫这份遗产。^[40]不难看出，BBC 组织文化的一些核心理念，都与其资金模式紧密相关：首先，公共资金使得 BBC 与众不同，它不仅仅是一个广播机构，而且是英国人生活的一部分。其次，BBC 一直强调，电视执照费（即收视费）使得 BBC 可以摆脱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压力，从而使其在业务上做得更好。^[41]这造成了 BBC 模式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具有独特性：一是广播行业的特殊性使历届政府对其控制力度有所不同。二是长期受强烈的里思文化思维支配，在遇到合法性和资金危机时，雇员抗拒改革和商业主义。^[42]因此要想变革阻力重重。

另一方面，BBC 在坚持公共服务理念的同时，也竭力维护王室在生性保守的英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形象。自里思时代起，BBC 就与王室密切互动。1935 年在里思的鼓动下英王乔治五世进行了第一次圣诞广播；1936 年当爱德华八世通过广播发表退位诏书时，里思就在这位逊王的隔壁；二战期间，里思领导的 BBC 被历史学家本·皮姆洛特 (Ben Pimlott) 称为王室“喉舌”。1953 年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加冕典礼轰动一时的电视报道是通过 BBC 向欧洲播出的；1969 年 BBC 播出纪录片《王室》，表示 BBC 对国家元首的特别恭敬。^[43]时至今日，BBC 仍设有一名王室联络人。BBC 规定：对于王室成员的专访或独家露面，必须与 BBC 王室联络人讨论；除王室成员履行公共职责的内容之外，任何引述、改写或提供王室成员内容的计划都必须提交王室联络人。BBC 曾因戴妃专访失去了王室圣诞报道的独家播出权。^[44]进入 21 世纪，BBC 曾因在报道中回避可能让王室尴尬的信息而

遭到公众抗议。BBC的戴妃专访，被外界看做是对王室的罕有冒犯，甚至有评论称，戴妃专访会把约翰·里思“气得从坟墓里蹦出来”。^[45]

（二）BBC对合法性和财务危机的应对

在特许状和收视费加持下形成的垄断，是BBC维持高水准公共服务的一个基础条件。但BBC也因此持续受到政治的和竞争对手的压力，政府通过审查和设定BBC的牌照费、对特许状进行10年一次的审查、对台长和董事会主席的任命三个方面来对BBC施加着影响。自20世纪50年代起，为了应对政治、同行竞争和收视费压力，BBC进行了制度调整，其调整结果是管理人员和行政人员的地位逐步提高，文化上逐渐由里思主义向下文阐释的伯特主义转变，BBC由一个“有道德的组织”演变为一个“负责任的组织”，以应对执照费争议和合法性危机。

1953年英国《电视法》允许建立私营商业电视台，这意味着新的广播电视结构即将形成，它混合了英国的公营体制和美国的私营商业体制。^[46]到1955年，ITV打破了BBC的垄断，形成了电视界的双头垄断。BBC第一次面对激烈竞争，失去了不少受众，在最初两年中处于劣势。而在ITV问世前，BBC的收视份额是100%，第四频道和第五频道出现后，2000年BBC的收视率滑落至37%。^[47]为扭转局面，BBC一方面维持原有的严肃节目，一方面大力拓展文娱节目。^[48]

作为对合法性和财务危机的回应，1968年到1970年，BBC聘请了美国咨询公司麦肯锡进行调研，《麦肯锡报告》成为BBC制度变迁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报告从企业管理角度建议BBC管理层应该给下级放权，重新安排组织结构，由节目经理人直接负责资源管理；需要改进管理层的信息系统，应对财务状况应有持续的监控措施，应提前编列项目开支预算，并接受内部审查。这种复杂结构造成了多交叉领域的紧张局势，削弱了行政决策的执行力，阻力却远大于执行力。实际执行中财务预算权并没有下放给节目负责人，制片人还因为更高要求的财务透明度而感受到了威胁，但行政管理者对编辑决策有了合法的发言权。^[49]这次改革成为BBC组织结构变迁的一个有缺陷版本。

1979年保守党政府上台后，试图改变BBC的公共广播体制，但没有成功。^[50]此后，撒切尔政府转而以执照费和政治任命对BBC施压。撒切尔任命经济学家艾伦·T.皮科克担任BBC融资委员会主席，希望通过开放BBC广告以取代执照费。虽然没有成功，但此举直接导致BBC财务状况恶化并受制于政府。^[51]BBC董事会成员的任命也越来越富于政治色彩，1986年马默杜克·赫西（Marmaduke Hussey）接任主席，他以提高效率为名对BBC进行改革，在未经公开选拔或考虑他人的情况下，任命约翰·伯特为台长。伯特是BBC历史上继里思之后另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他在工作流程、组织结构和节目制作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激进变革，延续了BBC作为“英国首要广电组织”的地位，并确保BBC继续以执照费作为资金来源。^[52]

（三）问责、审计与模糊的规范空间

伯特主义主要包括五项战略计划：制作有创意的高质量节目（后改为：赢得观众的注意力）、提高效率、拓展商业活动、全球化发展、建立联盟和伙伴关系。

伯特时期，BBC开始建立问责和审计制度，开展观众满意度、收视/收视率和影响力、欣赏指数调查，在新闻专业编辑和制作规范两方面推进改革，并且通过控制成本、财务透明度、绩效考量和物有所值这些术语组成一个“模糊的规范空间”。但是，BBC史上三次公信力危机都出现在此之后。^[53]

自1994年开始，BBC多次发布有关问责的文件，内部也会通过研讨会和文件传送加以扩散。在经理、会计、战略制定者以及顾问的实践中，外部规制（external regulation）、外部取向自律（externally-oriented self-regulation）、内部取向自律（internally-oriented self-regulation）构成了BBC的问责制度。外部规制包括：BBC需要提供年度报告和年度责任报告，回应相关机构的审查，对相关投诉进行处理，聘请外部审计公司对BBC进行年度审计，等等。外部取向自律包括：设立投诉处理部门，调查观众举报投诉，定期发表结论，以确保台长“了解公众的意见和忧虑”。^[54]面向执照费付费用户发表一年一度的责任声明。内部取

向自律主要是自我约束，20 世纪 90 年代末，BBC 各层级都有了密集、连续、重叠、周期性的审计过程，从公司层面到具体部门，从持续数月 to 覆盖全年，每年要花费数百万英镑购买外部的咨询管理服务，后来直接为麦肯锡设立了办公室，还聘请了专职企业战略咨询人员、会计师、财务管理人员等。

此外，由于管理费用增加，伯特主持下的 BBC 财务压力转移或强加到了日常节目制作中。^[55] 管理人员和行政人员在的地位提高了，甚至超越了节目制作人员。英国公共广电开始朝向受到严格控制的产业化方向发展。^[56]

这种治理结构是难以简单评价的，它产生了多重复杂的、甚至相反的效果。它一方面成功地缓解了政府的敌意，使 BBC 免于私有化的威胁。继任的台长们基本维持了伯特治下的 BBC 自律结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直接地对公众负责”。另一方面，这种合法化尝试催生了管理层新的等级制度，成为制作部门的沉重负担，并削弱了创新能力。^[57]

（四）全球商业化大潮和媒体竞争压力

如前所述，BBC 自创立起就与王室过从甚密，而王室要员婚姻这个选题本身就显得非常特别。但是戴妃专访对整个英国的冲击太大了——直视镜头的戴妃仿佛受惊的小鹿，认真地诉说婚后的每一次痛苦感受，这些口头和身体语言都通过电视被直观，正符合皮埃尔·布尔迪厄对电视具有强大煽动性和情绪感染效果的论断。^[58] 由 BBC 播出这样的专访，让王室成员的个性被大众知晓，大众对王室要员的关注已经从其作为公共机构的一员转变为王室中的个体私人身份。^[59] 这似乎也能解释为何戴妃在那段时间“热衷于电视专访”^[60]。此外，戴妃还接触了其他媒体。《每日电讯报》前总编马克斯·黑斯廷斯（Max Hastings）披露，他在《全景》专访播出三个月前曾与戴妃交谈两小时。他问对方“有没有快乐的时候”，戴妃说：“没有，婚姻从第一天起就是地狱。”但是黑斯廷斯决定不发表这些内容，因为他发现戴妃脆弱而心神不宁。^[61]

在全球商业化和媒体激烈竞争的大趋势下，

电视新闻节目难免朝向娱乐化和小报化发展。巴希尔在《戴森报告》公布后终于道歉，承认伪造银行账单是“愚蠢的做法”“深感遗憾”，但他仍然坚称“（伪造账单）与戴妃接受专访的个人选择没有任何关系”。他也不承认威廉王子对他助长了戴妃的恐惧、偏执和孤立的指责：“对戴妃和英国王室的媒体追逐甚至电话窃听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就开始了，我并非这一切的源头。”^[62] 换句话说，巴希尔认为当年行为是媒体环境使然：媒体狂热地追踪王室和权势人物，查尔斯王子和卡米拉之间的电话窃听被泄露，狗仔队紧盯戴妃，小报大曝保守党议员的性丑闻，记者经常非法侵入名人和政客的语音信箱信息，使用肮脏伎俩来追求独家新闻。^[63] 著有《< 全景 >：骄傲与偏执的五十年》（Panorama: Fifty Years of Pride and Paranoia）一书的已故记者理查德·林德利（Richard Lindley）写道：前 BBC 时事新闻制作人、后来的 BBC 首席政策顾问安妮·斯洛曼（Anne Sloman）告诉他，“（巴希尔的）调查结论是，伪造文件是一种普遍做法，我们的业务制造了怪物……”^[64] 这个理由显然不能为巴希尔的欺骗行为和 BBC 内部调查失效开脱，但是在高度竞争压力下《全景》节目和 BBC 高层能够放弃专访戴妃这一天赐良机吗？

四、简短的讨论

BBC 管理层对巴希尔事件的调查处理过程暴露出其组织制度方面的两个问题：违反组织规范和专业规范的行为之所以不止一次地出现在 BBC，既与领导层的孤傲有关，也与对“吹哨人”的忽略甚至打压有关。这种非正式制度的缺陷导致雇员通常不会因失德和越轨行为受到惩罚有关，反而形成了某种反规范。此外，在战后 BBC 组织文化中的自由派传统下，追求“政治正确”意味着对少数族裔雇员的照顾以及出现问题后“网开一面”。巴希尔不仅当年逃过惩处，还在 20 年后“回锅”，摇身一变做起了地位特殊的 BBC 宗教新闻主编。

BBC 自里思主政以来的制度变迁昭示，随着外部政治、经济、媒体技术环境发生变化，BBC 面临的挑战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在为了保有执照费和续新特许状开展的政治博弈过程中，BBC

通过强化管理、问责和审计的制度方式来追求效率，在竞争方面并没有落下风。但这是一种渐进式的不完全改革，摩擦和阻力形成了难以突破的闭环：BBC 组织文化赖以存在或曰引以为傲的“公共服务”理念需要执照费保底，来规避市场竞争和政治压力，但政治压力和与私营同行的竞争时常威胁着执照费乃至公共广电的合法性，因此 BBC 不得不以改革来回应危机，而这种改革又加大了摩擦成本，并多次导致 BBC 内部传统道德堡垒的坍塌；但新建立的问责和规范制度又未能有效贯彻实施，并造成管理成本高企，制作部门压力增大，让曾经引以为傲的文化遗产在一定程度上蜕变为傲慢无知和冥顽不化，这又反过来破坏了 BBC 的合法性和公信力，加大了它一再遭遇的政治压力。

毫无疑问，巴希尔的所作所为是相当恶劣的。但是，为何 BBC 董事会、BBC 信托等传统监管部门以及后来着力推动的问责和审计制，在巴希尔事件、戴维·凯利博士之死、萨维尔性侵丑闻等案例中均告失效？这种制度失灵问题如果无法根治，必然反复产生道德风险并进一步毁损组织声誉，而巴希尔骗访戴妃事件只是迄今对 BBC 杀伤力最大的一个。每次丑闻都会引发外界呼吁取消或削减 BBC 执照费的声浪，甚至发出政府介入 BBC 管理的威胁，让人担心 BBC 能否保持其独立性。前两次 BBC 都涉险过关，分别获得皇家特许状延长 10 年的“保票”，执照费还有所提高。目前距离下次特许状续新谈判只剩下 5 年，而 BBC 面临的数字时代的竞争压力与日俱增，如果巴希尔事件继续发酵，执照费特权被剥夺这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并非没有可能。

诚如哈耶克所言：我们不可能在人类事物上获得确定性，由于这个原因，要想最佳地利用我们所拥有的知识，我们必须依靠规则。^[65]目前来看，BBC 虽然有所作为，但是其约束雇员失德行为的自律规则远远未能完善，这不啻为 BBC 的一个心头大患。

参考文献

[1][3]Kowal, S., O'Connell DC., Theoretical ideals and their

- violation: Princess Diana and Martin Bashir in the BBC interview[Z]. Pragmatics. 1997 Jan 1;7(3):309-23.
- [2]Diana, Princess of Wales [EB/OL]. (2021-06-09)[2021-06-09].<https://www.royal.uk/diana-princess-wales>.
- [4]Campbell, B., Diana, Princess of Wales: How sexual politics shook the monarchy[M]. Women's Press; 1998,202.
- [5][6][11]Webb, A., A modern Watergate – and every bit as shameful: ANDY WEBB spent years trying to get to the truth of Martin Bashir's lies. Here he tells his dramatic story... and how Frost/Nixon inspired him [EB/OL]. (2021-05-20)[2021-08-14].<https://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9602489/ANDY-WEBB-BBC-cover-modern-day-Watergate-bit-shameful.html>.
- [7]Turner, L., BBC's reputation highly damaged by Diana interview report, says Patel[EB/OL]. BBC news, (2021-05-23) [2021-06-09].<https://www.bbc.com/news/uk-57217853>.
- [8]BBC news, BBC failures contributed to 'paranoia and isolation'[EB/OL]. (2021-05-20)[2021-07-15].<https://www.bbc.com/news/av/uk-57192909>.
- [9][12]央视新闻客户端. BBC 因骗访戴妃面临审查, 哈里王子: 骗访某种程度导致戴妃死亡 [N/OL].(2021-5-23). [2021-07-15].<http://m.news.cctv.com/2021/05/23/AR-TIsqtDnPyOUHDrSUAcL4y2210523.shtml>.
- [10]Danyal, H., Emer S. Harry Meghan NEVER asked Queen naming daughter Lilibet source says[EB/OL]. (2021-06-09)[2021-06-09].<https://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9667207/Harry-Meghan-NEVER-asked-Queen-naming-daughter-Lilibet-source-says.html>.
- [13][31]Harrison, E., BBC to review editorial policies and Martin Bashir hiring[EB/OL]. (2021-05-24)[2021-06-14]. <https://www.bbc.co.uk/news/uk-57229049>.
- [14]Culbertson, A., Princess Diana was 'scared half to death' by Martin Bashir into doing interview, biographer Andrew Morton says[EB/OL]. (2021-05-23).[2021-06-13]. <https://news.sky.com/story/princess-diana-was-scared-half-to-death-by-martin-bashir-into-doing-interview-biographer-andrew-morton-says-12314461>.
- [15]柯武刚, 史漫飞. 制度经济学: 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32.
- [16]吴乐珺, 唐泽. 解构深度——中外电视调查性报道研究 [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7: 61; 121
- [17]HUI, S., Report: BBC reporter used deceit to get 1995 Diana interview [EB/OL]. (2021-05-21).[2021-06-13]. <https://abcnews.go.com/Entertainment/wireStory/report-bbc-reporter-deceit-1995-diana-interview-77801787>.
- [18]BBC news, Martin Bashir Diana interview: BBC boss Tim Davie accepts 'multiple serious failures' [EB/OL]. (2021-5-20)[2021-06-11]. <https://www.bbc.com/news/av/uk-57192908>.
- [19]BBC GUIDELINES, Section 6: Fairness to Contributors and Consent – Introduction, Editorial Guidelines[EB/OL]. [2021-06-11]. <https://www.bbc.co.uk/editorialguidelines/guidelines/fairness>.
- [20][22][60][64]Ware, J., Martin Bashir inquiry: Diana, the

- reporter and the BBC [EB/OL]. (2021-05-21)[2021-06-11].<https://www.bbc.com/news/uk-56680229>.
- [21]格林伯格, J.巴伦. R. A.组织行为学:第9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61.
- [23]Fairweather, E., Bashir misled me and dented my faith in BBC [EB/OL]. (2020-11-28)[2021-06-09].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2020/11/28/bashir-misled-dented-faith-bbc/>.
- [24]BBC news, Babes in the Wood victim's mum wants Martin Bashir inquiry[EB/OL]. (2021-5-23).[2021-06-09]. <https://www.bbc.com/news/uk-england-sussex-57242995>.
- [25]Holland, John L., Making vocational choices: A theory of vocational personalities and work environments.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Resources, 1997. 转引自[38]: 73.
- [26]Ling, T., BBC's religion editor Martin Bashir: Why Christianity is still relevant this Easter[EB/OL]. (2018-04-01)[2021-06-11]. <https://www.radiotimes.com/tv/bbcs-religion-editor-martin-bashir-why-christianity-is-still-relevant-this-easter/>.
- [27]Maitland, J., How did the Martin Bashir I knew become TV's anti-hero? [EB/OL]. (2021-04-25) [2021-06-11]. <https://www.theguardian.com/tv-and-radio/2021/apr/25/how-did-the-martin-bashir-i-knew-become-tvs-anti-hero>.
- [28]艾肯特, R.我们能相信 BBC 吗[M].北京:新星出版社, 2012: 5.
- [29]The guardian, the bbc's cultural Marxism will trigger an American-style backlash, 转引自[28]: 192.
- [30]王菊芳. BBC之道: BBC 的价值观与全球化战略[M].北京:三联书店, 2013: 198.
- [32]Waddell, L., Martin Bashir still being 'paid 2k-a-week during his 3 months notice with BBC' [EB/OL]. (2021-05-26) [2021-06-07]. <https://www.mirror.co.uk/3am/celebrity-news/martin-bashir-paid-2k-week-24186082>.
- [33]卢现祥, 朱巧玲. 新制度经济学: 第三版[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322.
- [34][35]史晋川, 金祥荣, 等. 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 第三版[M].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9: 31; 180-181.
- [36][46][48]刘嘉. BBC 的制度变迁研究[D].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2006: 6-7; 14; 15.
- [37]McIntyre, I., The Expense of Glory: A Life of John Reith. HarperCollins; 1993. 转引自[38]: 75-76.
- [38]Blumler, J.G., editor, Televisio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Vulnerable values in West European broadcasting. London: Sage; 1992.
- [39][50]卡瑞 J, 辛顿 J. 英国新闻史: 第六版[M]. 栾轶玫, 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90; 174.
- [40][41][42][52]金-尚克尔曼 L. 透视 BBC 与 CNN[M]. 彭泰权, 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163; 145; 163; 106.
- [43]Lawson, M., Why the BBC would never broadcast Prince Philip: the Plot to Make a King[EB/OL]. (2015-07-30). [2021-07-12]. <https://www.theguardian.com/tv-and-radio/tvandradioblog/2015/jul/30/why-the-bbc-would-never-broadcast-prince-philip-the-plot-to-make-a-king>.
- [44]BBC GUIDELINES, Section 13: Re-use, Reversioning and Permanent Availability - Mandatory Referrals[EB/OL]. [2021-07-12]. <https://www.bbc.co.uk/editorialguidelines/guidelines/reuse-reversioning-permanent-availability-mandatory-referrals>.
- [45]Hunt, P., Prince William's extraordinary attack on the BBC[EB/OL]. (2021-05-21). [2021-07-13]. <https://www.spectator.co.uk/article/prince-william-s-extraordinary-attack-on-the-bbc>.
- [47][51][56] 郑从金, 英国公共广播电视兴衰的原因分析——一种公共领域的视角 [D]. 上海: 上海大学, 2007: 114; 82; 83-85.
- [49][55]McKinlay, A., Carter C. Cultures of strategy: Re-making the BBC, 1985-2003[J]. Business History, 2012.
- [51]郑从金, 英国公共广播电视兴衰的原因分析——一种公共领域的视角[D]. 上海: 上海大学, 2007: 82.
- [53]For an analysis of these developments see Power 1997. especially Chapter 3. quoted in Born G. From Reithian ethic to managerial discourse accountability and audit at the BBC Georgina Born[J]. Javnost-The Public, 2003, 10(3): 63-80.
- [54][57]Born, G., From Reithian ethic to managerial discourse accountability and audit at the BBC Georgina Born[J]. Javnost-The Public, 2003, 10(3): 63-80.
- [57]Born G. From Reithian ethic to managerial discourse accountability and audit at the BBC Georgina Born [J]. Javnost-The Public, 2003, 10(3): 63-80.
- [58]布尔迪厄. 关于电视[M]. 许钧,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10.
- [59]Abell, J., Stokoe E.H., Broadcasting the royal role: Constructing culturally situated identities in the Princess Diana Panorama interview.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J]. 2001; 40(3): 417-435.
- [61]Seward, I., Diana didn't regret the Bashir interview - but it changed her [EB/OL]. (2020-10-20). [2021-06-10]. <https://www.telegraph.co.uk/women/life/diana-didnt-regret-bashir-interview-changed/>.
- [62]Lee, D., Martin Bashir: I never wanted to harm Diana and don't believe we did [EB/OL]. (2021-5-23). [2021-06-09]. <https://www.bbc.com/news/uk-57215498>.
- [63]Hollingsworth, M., The inside story of Princess Diana's Panorama interview[EB/OL]. [2021-06-20]. <https://www.tatler.com/article/princess-diana-panorama-interview-deception-mark-hollingsworth-account>.
- [65]Hayek FA.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Routledge and Keegan Paul Ltd. 1960. 转引自柯武刚, 史漫飞. 制度经济学: 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121.

How Bashir's Diana interview became century scandal:

An analysis based on perspective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organizational culture

Liu Yajuan, Zhan Jiang

Abstract: With the perspective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organizational culture, this paper focuses on Martin Bashir's face-to-face interview with Princess Diana for the BBC program Panorama in November, 1995, a scoop with a rating of 28,000,000, explains how the so-called century interview became a century scandal after an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was published in May, 2021, and explores the reasons why such a kind of malpractice and misconduct happened repeatedly within BBC, the oldest and best-known public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 in the world.

Keywords: BBC; Martin Bashir; Princess Diana; Media Ethics; Institutional Change;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uthors: Liu Yajuan, School of Media and Law, Zhejiang University Ningb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an Jia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上接第 85 页)

this paper regards the diffusion of new technologies as a social process of meaning integration through the approach of “metaphor” from cognitive linguistics. Specifically, the researchers analysed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s of the Chinese Internet from 1987 to 2003. It is found that the metaphors like “stealing fire”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 “knowledge hero” “second life” “square” “jianghu” “homeland” emerged during this period. Behind it is the complex interaction of multiple actors such as the state government, market economy, netizens and western force in the specific and historical context. In addition, nationalism played a role of ideological “nodal point” to suture the cracks and gaps among metaphors, so that it guarantees the consistency of the whole metaphorical system. The above also reveals the delicate balance of the Chinese Internet at early times between the global and local, the country and society, the collective and individual as well as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Keywords: Internet history; metaphor; discourse practice; multiple interaction

Authors: Chen Yanrong, School of Journalism, Chongqing University; Cao Yue, School of Journalism, Fudan University.

四川云2.0

数据驱动 AI 赋能

12月28日上线发布

数据共享

智能融媒

社会治理

2021
善治新力量

第二届媒体融合与社会治理天府论坛

指导单位

中共四川省委网信办 中共四川省委城乡基层治理委员会办公室

主办单位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承办单位

川观新闻 川观智库

四川第一政经客户端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出品



川观新闻

看四川，观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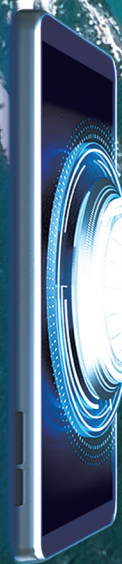
智能+智慧+智库的智媒体

川观新闻全网用户 **8500万**

客户端下载量 **4000万**

川观号入驻单位 **1700家**

看四川 新闻 观天下



知乎



全媒矩阵 融合传播

四川日报

川观新闻

看四川，观天下

SCOL 四川在线